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 99 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gdsy_xbbjb@gd.gov.cn
2001xb@126.com
出版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5.00 元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 任 方赛妹

副 主 任 杨应棉 邓爱霞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赛妹 邓爱霞 冯颖红

刘伟炬 刘盛奕 刘明禄

杜国辉 张 山 陈童敏

杨应棉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主 编 邓爱霞

副 主 编 张 山 陈童敏

编辑部

主 任 张 山

副 主 任 余 伟 陈童敏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第二个结合”视野下的新理念新概念——以“初心论”“知行合一论”“自信论”为例 方绪银, 姚大斌, 葛翠茹 (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道理学理哲理 高朝虎 (11)
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李本松 (18)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精神文化建设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付雪芹 (23)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大数据治理视角的网络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朱 玲, 侯睿夫 (29)
延安“窑洞对”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刘超伟 (3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参政党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路探究 齐春雷 (40)
试论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协商能力建设的价值与途径——基于政治和谐的视角 张韶华, 王伯然 (46)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蕴涵和构筑路径 刘 丽 (52)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制定香港国安法与落实“爱国者治港”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的影响 曹琬茜, 覃辉银 (58)

“两个大局”视域下海外统战工作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刘雨辰 (64)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叶慧坚 (70)

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人民政协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制度安排 张海霞, 张 山 (75)

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问题研究——以凝聚共识为中心 刘大鹏 (80)

中华文化研究

“一带一路”: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挑战与对策 王小萍 (85)

“道”之所向——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 雷东亚 (90)

三山国王文化的渊源与流播研究 林腾华 (96)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红色文化教育创新路径探析 林细莲, 蔡泽填, 郭卫琳 (102)

实现潮州礼俗“双创”的现实条件与路径初探 陈驰欣 (108)

Main Contents

New Concepts and Conce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Combination" —— Based on "Initial Mind Theory",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and "Confidence Theory" take for example	Fang Xuyin, Yao Dabin, Ge Cuiru (05)
The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ism with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Gao Chaohu (11)
The logic and path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new productive forces.....	Li Bensong (18)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u Xueqin (23)
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Network United Front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Governance.....	Zhu Ling, Hou Ruifu (29)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Era Inspiration of Yan'an's "Cave Dwelling".....	Liu Chaowei (35)
A Probe into the Approach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ory Parti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Qi Chunlei (40)
On the Value and Approach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ultative Capacity Building of Democratic Part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armony.....	Zhang Shaohua, Wang Boran (46)
Firmly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Liu Li (52)
The impact of the formul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o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Cao Wanqian, Qin Huiyin (58)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Major Situations".....	Liu Yuchen (64)
On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Full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Ye Huijian (70)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s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rrangement that combines Marxist Lenin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Zhang Haixia, Zhang Shan (75)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unicipal and County CPPCC Consultation and Grassroots Consultation: Centered on Consolidating Consensus.....	Liu Dapeng (80)
"The Belt and Road":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Xiaoping (85)
The Direction of "Dao" – O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Lei Dongya (90)
A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ing of the Culture of the Three Mountains Kings.....	Lin Tenghua (96)
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Path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n Xilian, Cai Zetian, Guo Weilin (102)
Exploring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and Paths for Realizing Chaozhou's "Double Creation" of Rites and Customs.....	Chen Chixin (108)

“第二个结合”视野下的新理念新概念 ——以“初心论”“知行合一论”“自信论”为例

方绪银, 姚大斌, 葛翠茹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第二个结合”必然体现在理念之间的“结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然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核心理念就必然已经血肉相连般地融合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新理念新概念之中。从学理上充分揭示这个问题并非易事, 只有同时将“中华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提升到系统性的层次, 使之互相呼应、互相发明, 才能把二者融汇贯通的理论内涵和内在逻辑讲明白。本文以此为方法, 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初心论”“知行合一论”“自信论”为例证, 阐明这些新理念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深度融合的结晶, 是在“第二个结合”中凝聚而成的时代精华。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阳明心学; 创新理论; 学理阐释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05-06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标识, 是其“深厚之传统性”和“精辟之创造性”的集中体现。目前学术理论界从宏观上对此的宣传解读和系统概括很多, 但以“第二个结合”的视野对这一思想体系中的新理念新概念进行具体的研究阐释还远未成为热点。本文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阳明心学的系列论述为依据, 以他所提出的“初心论”“知行合一论”“自信论”^[1]为例证, 揭示这些新理念新概念“结合”了阳明心学的哪些思想精华? 具体是怎么“结合”的? 通过进行这种“还原性”的学理阐释, 不仅可以更好地印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确实已经血肉相连般地融汇贯通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 而且对于“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也具有重大意义。

一、“良知论”与“初心论”: 追寻精神动力的大本大源

驱使人们践行“人间正道”的精神动力从何而来? 如何永葆这一动力? 这是王阳明的“良知论”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论”共同的精神原点、逻辑起点和价值支点。同样的问题意识, 虽然时代不同决定了答案的不同, 但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是神韵相通的, 在理论和方法中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易传·系辞》中, 孔子描述过一幅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颇相契合的“天演”图景, 认为宇宙(物质)具有“生生不息”的本性, 亦即具有演化出天地万物、进而演化出人类及其社会秩序和

收稿日期: 2024-03-04

基金项目: 2023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共产党人‘心学’研究”(2023WTSCX28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方绪银(1962-), 男,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中共广东茂名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二级巡视员, 研究方向: 党史党建, 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与方法; 姚大斌(1975-), 男,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研究方向: 党史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葛翠茹(1969-), 女,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 教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精神文化的“大德”。这个“生生不息”的“大德”必然体现在万物的禀赋之中，是支撑所有生灵生存延续和进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王阳明的“良知”概念首先就是指万物都具有这种“生生不息”的禀赋，所以他认为“万物皆有良知”；同时又是指人对这个禀赋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这个自我意识必然也必须是“善其生存发达”的“良好的‘知’”、“正确的‘知’”、“合规律合目的的‘知’”^[2]，故称之为“良知”。在阳明心学的意蕴里，动物的“生生不息”体现为其“求生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其“身之主宰”，如果这个本能丧失了，动物肯定就会灭绝，但动物的这种本能是不可能丧失的；人的“身之主宰便是心”，这个“心”（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力量，因而也是绝不会泯灭的，但在“天下为家”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里往往会被私心物欲所遮蔽或扭曲，造成各种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和社会的衰败混乱，因而必须通过“致良知”，充分地唤醒、激发这种本质力量，才能使人们在“良知的驱迫”^[3]之下矢志不渝地寻求和践行“善其生存发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这就是阳明心学对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永葆这一动力的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概念，在逻辑内涵上是由一般意义的“初心”和特殊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两部分构成的，是对共产党人的“身之主宰”及其作用的深刻把握。从“着眼于古代德治思想的当代阐释”^[4]而言，前者的内涵显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初心”理念的继承和创新。在佛家经典中，“不改初心”“不退初心”“不负初心”“不昧初心”“不捐初心”“不失初心”等等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和反复高扬的主旋律；作为“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中华传统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所倡导的“常知得”“常记得”“常存得”“常提不放”“常惺惺”“时时提念，时时猛省”、戒除“困忘之病”等“良知”存养功夫，已涵涉了佛家“初心”理念的全部精华，并以世俗理性剔除了其中的宗教元素，凸显了儒家的“入世”“担当”与佛家的“出世”“放下”之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论”更直接的理论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之后加上“牢记使命”，

既批判地继承了佛家强调“初心”重要性的丰富思想遗产，又升华了王阳明的“良知论”所彰显的“视天下如一家，中国犹一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的心路历程的高度概括，又与儒家心学所推崇的“求其放心”“发明本心”“复其本心”“不失本心”“不失赤子之心”“明明德”“致良知”等理念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更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的梦想和追求血脉相通，因而是一个既具有“大本大源”又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伟大创新理念。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深刻的人性根源、民族性根源、文化根源、时代根源、理论根源，是来自于对“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的弘扬光大、来自于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无比向往和不懈追求“小康”和“大同”的复兴情结的忠实传承、来自于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来自于对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的使命担当、来自于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念。^[5]其中前四个“根源”显然与“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和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与王阳明的“良知论”的内涵和外延相契合的；第五个“根源”与前四个“根源”则是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近代仁人志士的“初心”在内涵上的本质区别所在，更是两者高下优劣、成败得失的根本标识所在——面对着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个同样的历史主题和崇高使命，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试尽了各种“主义”、穷尽了各种办法、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都无力回天、终归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结合起来，通过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斗，不仅把中华民族从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危机中成功拯救了出来，而且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造了中华文明新辉煌。这充分说明，“第二个结合”是“初心论”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或者说，“初心论”是在“第二个结合”中凝结而成的中华现代文化精华。

二、“知行合一论”：践行“良知”和“初心”的本然、应然和实然状态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立言之大旨”，是中国古典形态的“实践论”，也是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精华。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王阳明的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他先后40余次使用“知行合一”概念，并且“将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有机结合，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重大创新与发展”^[6]。无论是从理论和方法的“同中之异”还是“异中之同”看，王阳明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知行合一论”所要阐明的，都是践行“良知”或“初心”的本然、应然和实然状态。

毛泽东指出：“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是“完全两样”的；“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7]社会生产的结果”^[8]。为了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我们可以把“人的本能”称为“类本能”。以“类本能”这个现代视野来解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其主要逻辑节点有三个：其一，动物靠生生不息的本能的驱动而生存繁衍，人则靠生生不息的“类本能”的“发用流行”而兴盛；动物的本能是“即‘知’（感知）即行”的，人的“类本能”（良知）原本也是“感应神速，无有等待”的，所以“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明儒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就是“良知”的“本然”状态。在王阳明看来，在“天下为公”的原始大同时代，人的“良知”的“发用流行”就是处于这种“精神流贯，志气通达”的“本然”状态，因此“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传习录·卷中》）。其二，到了“天下为家”的时代，人的“良知良能”虽然是不可泯灭的，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往会因为“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而丧失其“即知即行”的“类本能”特征，故须“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传习录·卷中》），否则就会有悖于人类社会的兴盛之道，堕落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率兽食人”的地步。这就使得“知行合一”处于一种“应然”状态。其三，“致良知”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使“知

行合一”由“应然”状态回复到类似于“本然”的“实然”状态：“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卷上》），要达到这种“好德如好色”的“知行合一”境界，就必须通过“致良知”的功夫“去其昏蔽”、“复其心体”，使人的“良知”与“行为”之间重新“流贯通达”起来。只要人人都做好了这个“知行合一”的“复性功夫”，那么就会“满街都是圣人”，整个社会也就能重新回归到“大同圣域”。这套中国古典版本的“哲学共产主义”理论，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却醍醐灌顶地昭示了人的道德情结和“大同情结”起源和形成于漫长的原始公社时代这一真知灼见，深刻地揭示了如何解决道德良知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始终是人类在“复活”“大同”社会之前都必须面对的巨大难题。

综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的系列论述可以看出，其中的“知”首先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理性之“知”亦即“初心”，同时又包括践行“初心使命”所必需的知识理性之“知”。如果与上述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相比较，其理论逻辑也具有三个层次：其一，这个“初心”不仅是百年来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人皆有之”的，而且是贯穿于其全部实践活动之中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知行合一地）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这是建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所有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奥秘所在。其二，随着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的根本消除，依靠这种生存危机意识直接激发使命感、责任感的社会氛围也已日渐淡薄；特别是面对新时期的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虽然全党从整体上、主流主线上从未偏离自己的“初心使命”，但也有不少党员干部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弱化甚至丧失了践行“初心使命”的强烈责任感，导致“知而不行”的现象一度相当严重，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知行相悖”的“两面人”。这就是与“知行合一”有差距的一种“应然”状态。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党员干部就会失去“身之主宰”，党就会失去“生机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会被中断。其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必须“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使其“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具有“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强大的“心动力”、精神动力，使“知行合一”成为新时代每一个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实然”状态。这是新时代的党性教育、党性修养——“共产党人的心学”的根本主题和永恒课题。可见，“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传习录·卷上》），“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明儒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正是王阳明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知行合一论”在理论特质上的神韵相通之处。两者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契合点就在于都是以实现“大同”为终极目标的，只不过王阳明“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两者在体系特征上也有着根本区别：前者主要只是一个指向“内圣”的心性哲学范畴，后者则既是聚焦于“明大德、立大德”的，又是作为精神原点、逻辑起点、价值支点融入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是心性修养（党性修养）之学与治平实践（治国理政）之学的有机统一，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圣外王之道”。

三、“自信论”：在“实有诸己”中体悟“真理的味道”和“信仰的感觉”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特定理论、学说、主义、道德、精神等发自内心的信服、敬仰和尊崇，并以为行动的准绳和内驱力。人类的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欧美、中东和印度为代表的宗教信仰，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世俗理性信仰。宗教信仰的支撑是《圣经》等宗教典籍，中华民族的世俗理性信仰的支撑则是以儒家心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心学。显然，没有传统心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难以赓续作为中华民族特质禀赋的世俗理性信仰，重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大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引用阳明心学名言的语境下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新理念的深层意蕴所在。植根于“自信”还是“他信”，是世俗理性信仰与

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在“实有诸己”的“自信”中品出“真理的味道”和“信仰的感觉”，是阳明心学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自信论”的共同特征。

阳明心学是中国古代最典型、最系统的基于“自信”的理性信仰之学，是中华民族特质禀赋的重要标识之一。王阳明的“自信论”的根本内涵是他对自己所悟出的“人皆有之”的“良知”的“自信”、对自己“致良知”理念的“自信”。这种“自信”是源于他发自内心地体验到了“良知论”的“真理的味道”和“信仰的感觉”，其理论内涵至少有四个层面：第一，“良知”是人不可泯灭的本性，是人能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在根源。王阳明认为，万物皆有“良知”，所以天地才能演化出能够“自觉”其“良知”的人类，“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传习录·卷下》），既然人人都有尧舜一样的“良知”，那么人人就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这是王阳明“自信其良知”的“事理”依据。第二，“良知论”是尧舜以来的千经万典的唯一主题和复兴“大同境域”的希望所在。这是王阳明“自信其良知”的“学理”依据。在他看来，对“良知”的感悟和践行，是尧舜以来的“圣人之学”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是成就圣人功德的秘诀，更是每个人应对人生风浪的法宝：“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王阳明集·年谱》）；“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传习录·卷下》）他认为，既然人人“依良知而行”是成就远古“大同盛世”的大本大源，那么唤醒天下人的“良知”、使人人都“自信其良知”，就必然是当下“挽回三代之治”、复兴“大同境域”的不二法门！第三，“明明德亲其民”是“止于至善”的“极则”，“致良知之学”就是“亲民之学”。在孟子的“四端论”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心理直觉体验：人不仅“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怵惕惻隐之心”，而且面对受到摧折的鸟兽、草木、瓦石时也必有“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他认为，这种“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就是人皆有之的“圣人心”，而“明其明德”的功夫就是要涵养这种直觉体验。一个人只要始终保持着这种感觉，他就

必然会“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就必然会“亲其民”，为民之“饥溺”“恻然而悲，戚然而痛，忿然而起”，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为民纾难解困。这种亲民爱民为民的鲜明情感、立场和观念，无疑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价值。第四，“有诸己之谓信”，“自信其良知”的根本途径在于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通过“反求诸己”、“实有诸己”，把“圣人之学”与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明德）贯通起来，使其“灵灵明明，触而应，感而通，无所不照，无所不觉，无所不达”，是“千圣同途，万贤合辙”的德性修养方法。他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传习录·卷上》）“他信”纵然到了“笃信”的程度，也与“反求诸己”得来的“自信”不可同日而语，“孔门之学”的真谛就在于“反求诸己”。他强调，“良知自信”只有在战胜各种磨难的“身体力行”中才能得到“实有诸己”的真切体认：“吾斯既已自信矣，则当益致其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谦。”（《传习录·卷中》）可见，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真知真信”良知必然会“真行”以求“自谦”，也唯有“真行”才能证悟和升华“实有诸己”的“真知真信”。

通过这四个层面对王阳明“自信其良知”的传统理性信仰体系的概述，我们不难领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阳明心学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有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他所说的“自信”，既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之情，更是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信而仰之的感觉”；他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视角对“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和“成人之道”的把握，对中华民族特质禀赋的揭示^[9]，对“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的发掘和提炼，对阳明心学的“良知论”“知行合一论”“亲民论”“立志论”等等理念的传承和弘扬，对“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和“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的强调，都蕴含着通过赓续中华民族的理性信仰传统来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鲜明导向。他在“梦想论”、“初心论”基础上提出的“自信论”，则完整构成了基于“自信”的新时代理性信仰体系。如上所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实际上有着“知行合一”的内涵，其题中之义是，一个人只要真正“自信其良知”，就必然会在“知行合一”中去找、也一定能找到“致吾良知之天理于事物”的好办法。近代仁人志士也确实都是“真信真行”“救国保种”、复兴中华这个“良知”的，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共同奋斗目标，但要找到践行这个“良知”的正确方法之“知”并非易事，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之说，即是此意。所以，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都把“知行合一”之“知”理解为道德理性之“知”与知识理性之“知”的统一体，而最早把这个统一体明确纳入信仰范畴的则是青年毛泽东，他在其《〈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10]显然，只有“实有诸己”的“知识”才可能成为“信之弥坚”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除了在近现代意义上使用“知行合一”概念，而且还在“心学”与信仰信念相关联的语境中明确提出了“知行行统一”的理念。他指出：“我常说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行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坚持学思用贯通、知行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他把中华民族追求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主题）表达为“发乎于情”、梦寐以求的“梦想”——“中国梦”，把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表达为充满激情、万死不辞的“使命感”——“初心”，把党和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创造、积累所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表达为发自内心地‘信而仰之’的‘四个自信’”^[11]，这实际上是在“知识理性”之“知”已解决的新时代背景下突出强调了将其“建为一种之信仰”的至关重要性，以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能在“反求诸己”和“身体力行”的“自信”中体悟出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的味道”（真理的魅力）和“信仰的感觉”（信仰的力量），切实做到“真知真信真行”。换言之，

如果当代中国人失落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当代党员干部失落了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无论多么来之不易、无论多么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无论多么须臾不可或缺，也绝不可能内化为人们信而仰之、遵而从之的“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强大历史合力也就会荡然无存，从而就极有可能在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目标的历史关头半途而废！^[12]因此，“共产党人的心学”的主旨就是要唤醒和强化这个“梦想”和“初心”，激发和坚定“四个自信”，使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始终保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的信仰激情。显然，我们如果对王阳明的传统理性信仰之学缺乏了解，就难以从学理上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信论”等新理念新概念的深刻内涵，也就无法构建起当代化的理性信仰之学——共产党人的心学。不过必须注意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强调“德治”和“信仰”的，贯穿着“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的鲜明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他所说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就集中体现了“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的治党理念。

“第二个结合”必然体现在理念之间的“结合”，所以只有同时将“中华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提升到系统性的层次，使之互相呼应、互相发明，才能把二者融汇贯通的理论内容和内在逻辑讲明白。^[13]我们以上所论，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虽然远远未能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理论内容，但通过实例确证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已充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认为，学术理论界要在“第二个结合”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构建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首先就要以“第二个结合”的视野，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

系列新理念新概念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阐释和逻辑化的展开，也就是用已实现“第二个结合”的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我们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学术创新实践，不断开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之新境界，造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生命体。本文就是对这种研究路径的一个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参考文献：

- [1] “初心论”是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系列论述的概称。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和“四个自信”的系列论述分别概称为“知行合一论”和“自信论”。
- [2] 方绪银，姚大斌，吴玉梅，葛翠茹.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中)——以《毛泽东早期文稿》为中心的考察[J].南方论刊,2023(08).
- [3]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39.
- [4] 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
- [5] 方绪银，方灵子，胡娜.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J].特区实践与理论,2020(03).
- [6] 王杰.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N].学习时报,2023-08-02.
- [7]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 [8] 毛泽东文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6:83-84.
- [9] 方绪银，林业强，姚大斌，梁秀秀.“第二个结合”与“日用而不觉”理念的方法论意义[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04).
- [10] 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239、201-202.
- [11] 方绪银，张蓝青，叶慧坚.大历史观与新时代的信仰信念体系[J].南方,2021(19).
- [12] 方绪银，张蓝青，叶慧坚.大历史观与新时代的信仰信念体系[J].南方,2021(19).
- [13] 陈其泰.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治史心路回眸[J].史学集刊,2023(2)，笔者引用时对其原意有所拓展。

【责任编辑：陈童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道理学理哲理

高朝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强调了“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 并将“立场观点方法”提炼为“六个必须坚持”。这就不但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又要整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哲学上把握其精髓要义。本文对“六个必须坚持”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进行阐释。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世界观方法论; 道理; 学理; 哲理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11-07

一、“六个必须坚持”是党内的“共同语言”

“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如果说,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是从主要内容层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括, 那么, “六个必须坚持”则是从哲学层面对其精髓要义进行提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学习领会“六个必须坚持”提出明确要求。党的二十大期间, 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他指出: “对这 6 条, 要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 从而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 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2]。不仅要“知其言”, 更要“知其义”; 不仅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在党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 他又强调,

“只有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 才能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3]。2023 年 3 月, 他再一次指出, 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立场观点方法, 才能更好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认识问题才站得高, 分析问题才看得深, 开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习近平总书记用“只有”“才能”“才”这样的必要条件语气, 强调领会“六个必须坚持”的不可或缺。

2023 年 4 月, 蔡奇同志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称为党内‘共同语言’”。蔡奇同志进而强调“‘六个必须坚持’是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 这就是党内的‘共同语言’”。可以说, “六个必须坚持”的提出, 把我们党对创新理论的认识上升到哲理层面。

收稿日期: 2024-02-05

作者简介: 高朝虎 (1986-), 男, 云南丘北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援疆干部, 新疆大学党委组织 (人事) 部副部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立场观点方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及人与世界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方法论是人们改变世界的根本方法。世界观侧重于解释世界，方法论侧重于改变世界。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但也有不一致甚至相违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运用。中央政治局4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板块。比如2013年12月3日专题学习历史唯物主义，2015年1月23日专题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另2次集体学习分别专题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2010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立场观点方法”时，先提出“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方面表明，“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本根^[4]，“立场观点方法”在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过程中发挥了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将“立场观点方法”主要凝练为“六个必须坚持”，构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六个必须坚持”相较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是相对具体层面的表述，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六个必须坚持”的道理学理哲理

“六个必须坚持”中，立场、观点、方法分别是哪些？“坚持人民至上”侧重于“立场”，“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胸怀天下”

侧重于“观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侧重于“方法”。这是拆分层面的个体理解，但全面理解“六个必须坚持”，必须要把其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把握，立场决定观点方法，观点方法体现立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论述意蕴深刻，每一个“必须坚持”用一个段落阐述，基本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层次展开。其中，“是什么”，揭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道理学理哲理；“为什么”，阐明“必须坚持”的原因；“怎么办”，则指出如何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深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核心要义，需要在论述每一个“必须坚持”中，对应分三个段落，第一段解释所体现的道理学理哲理，第二段从党史的角度梳理我们党如何一以贯之坚持，第三段论述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应如何坚持。

（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5]，指出了坚持人民至上的道理学理哲理。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6]。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同时，党的理论又要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不能脱离人民，必须为人民造福，“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7]。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践行和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要求“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问“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20年5月，他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到2021年2月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他又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就将“人民”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新征程上，如何“坚持人民至上”？“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8]。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0]。

（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特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1]，指出了坚持自信自立的道理学理哲理。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发展道路，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国情的四个“独一无二”^[12]，多人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适合我国实际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长期执政。基于这些特殊性，他强调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13]。体现事物内外因辩证关系

的原理，认为事物的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动力和源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14]“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5]这就进一步强调，任凭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不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回头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16]。

新征程上，如何“坚持自信自立”？“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7]。也就是既不能封闭搞教条主义，也不能在改革开放中鹦鹉学舌。“坚持自信自立”，目的在于“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8]。

（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9]，指出了坚持守正创新的道理学理哲理。主要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通过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经过否定之否定，事物运动在更高

阶段重复旧阶段的某些特征，“既被克服又被保存”。“守正”是前提基础，是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0]；“创新”即与时俱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要求《共产党宣言》对一百七十年后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都提供现成答案”^[21]，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守正创新”作出创造性的概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都是将“守正创新”思想理念与不同历史时期紧密结合的高度概括。进入新时代，在坚持和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的思想观点，深刻地提出了“守正创新”。

新征程上，如何“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是要做到“三个坚持”，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22]。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创新，是要做到“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23]。“坚持守正创新”，目的在于“坚持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24]。

（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25]，指出了坚持问题导向的道理学理哲理。主要体现矛盾客观性普遍性原理，认为矛盾是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时时事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客观性普遍性，把发现和认识矛盾、化解矛盾作

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6]。

问题意识非常重要，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党的创新理论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何种道路”的时代课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邓小平理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所回答的时代课题，侧重于深化对三大规律中一个或两个方面的认识，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则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整体认识，且重大时代课题与规律之间基本存在对应关系。

新征程上，如何“坚持问题导向”？要聚焦五类现实问题，“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比如互联网意识形态管理等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等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比如生育成本等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比如脱钩断链等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比如“大党独有难题”等问题，要坚持将这些问题作为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引导。“坚持问题导向”，目的在于“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27]。

（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28]，指出了坚持系统观念的道理学理哲理。主要体现普遍联系的原理，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及事物之间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所遇到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体制改革，又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很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29]。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系统观念的认识和坚持逐渐深化，大体经历重点突破、全面发展、系统谋划的过程^[30]。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注重重点突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设立经济特区等。到党的十二大，增加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两个文明。党的十六大，增加政治文明建设，形成“三位一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增加和谐社会建设，形成“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强调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整体推进。党的十九大以来，更加注重在两个大局中进行战略谋划、系统谋划。

新征程上，如何“坚持系统观念”？“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31]。这就要着眼大局思考问题，敢于打破自身思维局限，增强七种思维能力。“坚持系统观念”，目的在于“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32]。

（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胸怀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33]，指出了坚持胸怀天下的道理学理哲理。主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体现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的观点，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交通工具改进，交往普遍发展，历史已由民族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以上“也是”一词，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提升至全人类高度，既关注“中国”，更关注“世界”。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化”之后补充“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提升至人类社会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毛泽东同志注重团结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江泽民同志积极倡导和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新征程上，如何“坚持胸怀天下”？“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34]，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坚持胸怀天下”，目的在于“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35]。

以上是关于“六个必须坚持”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的阐释。“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的顺序不是随机的，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坚持人民至上，是第一位的，一切理论创新都必须服务人民的需求。坚持自信自立，立场确定之后要解决的是道路方向问题，强调理论创新必须深深扎根中国实际，自信才能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在立场、道路方向确定后，要解决如何前进，要“坚持老祖宗”与“说新话”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只有解决矛盾、破解问题才能推进理论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强调根据整体性关联性系统推进理论创新。坚持胸怀天下，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能够始终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6]。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注重将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用于指导实践,努力推动工作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5.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60.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61.
- [4] 参见: 黄显中, 杨紫薇. “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方位 [J]. 毛泽东研究. 2023(4):20.
- [5]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7.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63.
- [7]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05.
- [8]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7.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11.
- [10]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7.
- [11]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7-18.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82.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82.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78.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79.
-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89.
- [17]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18]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19]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2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90.
- [2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23:31.
- [22]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23]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24]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25]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100.
- [27]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8.
- [28]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9.
- [2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107.
- [30] 参见韩庆祥.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总体内容及其逻辑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11):29.
- [31]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9.
- [32]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9.
- [33]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9.
- [34]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9.
- [35]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9.
- [3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691.

【责任编辑：张山】

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李本松

(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由此跃迁生成的新生产力,其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追求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要以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实现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达到,只有新质生产力才能提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动能。为此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大力创新,以追求协调发展和改革开放,以追求绿色共享高品质生活,以人才与科技力量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 产业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18-05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来自于生产力的推动,人类生产力具有革命性,不断在发展变迁着并且有自身发展规律,新质生产力表现为人类生产力在当前生成的最新形式。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新质生产力创新理论被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构成了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表达范式。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具有新本质、新内容、新形式等新特点,高质量发展是追求高效益、高质量、高品质的新发展,需要新要素、新动力、新动能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新质生产力推动才能达到。

一、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新质生产力必将推动新时代科技加快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并为之提供新动力。论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问题首先从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开始。

(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内涵,“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的起点于“新”,关键在“质”,内容是“新质生产”,本质依旧为“力”即:“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中,“新”的含义为:以创新、

收稿日期: 2024-02-22

基金项目: 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研究”(HAVT2X202204)、2023 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研究”(2023XWH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本松, (1969-), 男,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人,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堪萨斯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访问学者, 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科技创新为先导与主导，以科技创新成果激发生成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质”的含义为：新质生产力生成于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变革中催生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条件下生成新产业；这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而生成的先进生产力，实现生产力质态的新飞跃。“新质生产”的含义为：追求实现高效益、高质量、高品质的生产与生活，从本质上以区别于通过能源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与污染为代价实现发展的传统，以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的生产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方式，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新模式，激发生成增长与发展的新动力、新动能、新优势。“生产力”的含义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进行生产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客观现实能力，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人类生产力跃迁的新生产力形式、先进生产力，表现为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先导、关键作用并新产业化而生成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新力量。

（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4]为此，“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5]，由此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打破依靠传统的物的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与增长方式，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高效率、高效能、高质量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强度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的传统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与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在于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创新与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不仅可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而且可以大大增强发展自主权、主动性和可靠性，使得国际循环的质量、水平和效率得以有效提升，追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6]。

二、新质生产力生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动能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转变增长路径和发展方式，以创新为根本增长路径和发展驱动方式，新质生产力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内在要求、新动能和重要着力点，两者存在必然的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生成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生成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由此成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7]，生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高质量发展的特点在于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特征以协调为内生特点，这首先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实现了发展路径的转变，即：由以前依靠生产要素在量上的投入来提高发展速度和发展量上的增加，这同时伴随着不断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出现，转向依靠创新、科技创新驱动实现生产要素高效益使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促进发展的动力转变，主要由物的投入驱动转变成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了效益转变，由以前传统生产力下的低效益、低效率的发展转变为高效益、高效率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本质在于通过路径变革、动力变革、要素变革、效益变革、体制机制变革最终实现质量转换，即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只能依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产生的新动力来实现。

（二）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化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主导和关键，以新产业化为核心内容，只有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也包括渗透转化）才能变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力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个过程也必然为高质量发展过程。以科技创新新产业化形成新生产、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实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

的升级换代,大大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实现效率提升、效益提升、质量提升,由此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8]。产业结构构成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产业结构的生产效率与效益决定着经济结构效率与效益,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代替传统生产力必然伴随新产业大幅提升发展质量,例如:人工智能产业、大数据与数字化产业、信息与物联网产业、航天与导航产业、新能源与清洁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无人机和低空经济产业、海洋产业、生物与医药生命科学产业等,这些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而成,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发展新引擎,彰显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和主导的新动能。

(三) 新质生产力以整体性力量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生成于创新,而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形成新产业,新产业既有科技创新成果直接产业化生成的新产业,也有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由此形成新产业,所有这些呈现全面性和整体性,因此新质生产力具有整体性。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也在改变着原有的生产关系,而且也在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社会变革呈现整体性和全面性,这成为新时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力量。与之相对应,高质量发展同样表现为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变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9]。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时一事一域的生产力,表现为新时代全时域、全场域、全方面、整体性的生产力,整体性改变人类社会,只有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生产力才能赋予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四) 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高品质生活在于人民群众在生活上、工作上、自我发展上、交往与休闲娱乐上等物质与精神多方

面的需要得到高质量、高品质和充分的满足,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生产、产品与服务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展变得更加舒适、便捷、高品质、高品位,这与高质量发展在内容上高度契合、在实践上完全一致与重合。高质量发展追求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和共享成为根本目的。追求绿色低碳高效、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这样会形成高质量、高品质、高品位生活。而且,通过共建共享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建共享实质在于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10]。新质生产力以高品质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和高品质生活,由此生成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持久动力和新动能。

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大力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高质量发展表现为质量和效益整体全面提升的新发展,需要动能和动力的创新与转换,即只有新动力才能产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个新动力为新质生产力。只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大力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1],新时代只有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要从如下方面来做。

(一) 新质生产力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需要通过高效率生产、高效益经济运行来达到,与此对应的必然为高效率、高效益的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这必须要建立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2]。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由此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大幅度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全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整个社会全要素效益,由此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始终把发展着力点和基础建立在实体经济上,防止经济脱实向

虚、经济发展基础不稳，这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以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优做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通过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改造升级变得根基更加坚固牢实，对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培育新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新产业，以此加速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 and 竞争新优势。

（二）新质生产力以大力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而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因此新质生产力以大力创新推动实现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13]。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的特点贯穿着创新，产生与发展始终以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为主导与先导，创新成为其中的关键。新质生产力坚持创新驱动，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生成经济增长新动力、赢得发展的主动权，由此激生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与新动能。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创新实现增长与发展方式变革、发展动力变革、发展效益与发展质量变革，由此实现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的新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动能。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表现为全面创新，不仅新质生产本身为生产力创新变革跃升，而且也会引起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创新。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推动下能够加快形成以创新为第一推动力的高质量发展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新变革，创新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创新并完善完备适应高质量发展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由此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以追求协调发展和改革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内含为协调发展和改革开放发展，这只有通过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力和赋予新动能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生成于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这既包括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也包括科技创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表现为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以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兴产业为主要内容和发展新增长点，因此，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不仅表现为自身发展结果，而且需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并且还需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变革上层建筑。这要以改革开放为手段，推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变革、机制与体制、甚至是某些固化制度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这也表现为协调发展，这个过程必然促进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表现开放生产力，不仅对内开放，而且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来生成的，这极大扩展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培育和发展的时空场域，这使得新质生产力具有比传统生产力更大动力。在当前时代，只有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深入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数字化经济、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为制约大力发展低碳高效经济和清洁能源，促进经济创新驱动、低碳、高效益、高科技转型发展，才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只有靠新质生产力推动才能实现。

（四）新质生产力以追求绿色共享高品质生活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追求实现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4]。因此，新质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当然推动力。新质生产力走保护生态环境、资源高效率利用、增长依靠创新驱动和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新发展之路，实现这样的发展则必然表现为高质量

发展。高质量发展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与万物和谐,追求“天人合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低碳循环发展,走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新路,由此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走共享之路,努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追求走共同富裕之路,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新质生产力为之提供条件。高质量发展按照人人参与、人民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做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由此有力促进人的平等、个性自由、能力体系发展,极大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成了其中的充分基础。

(五) 新质生产力以人才与科技力量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关键,以人才为第一资源,也是最重要资源,这直接推动着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摆脱了传统依靠物的量的生产投入的增长路径、而依靠创新为第一动力,追求效益好、质量高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这只能通过高素质人才队伍来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塑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和高素质人才队伍来实现。因此,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创新成果转化新产业化才能转变为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科技创新升级转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成新产业,以新一代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产业体系发展动能,这本身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和实现途径。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开辟未来发展新赛道,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和主动力,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5],当前我们要大力弘

扬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速新产业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3-09-09(1).
-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22-10-26(3).
-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N]. 人民日报, 2021-11-17(6).
- [6]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N]. 人民日报, 2021-03-08(1).
-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8]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3-09-10(1).
- [9]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N]. 人民日报, 2021-03-08(1).
- [10]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N]. 人民日报, 2021-03-08(1).
- [1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N]. 人民日报, 2023-12-13(1).
- [13] 本报记者王政, 刘温馨.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政策问答·2024 年中国经济这么干) [N]. 人民日报, 2024-01-15(1).
- [1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1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责任编辑: 张山】

精神文化建设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付雪芹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河源 517000)

摘要: 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推动精神文化建设,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以精神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文化建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 文化; 精神文化;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23-06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1]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景目标,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并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意义,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如何以推动精神文化建设为着力点,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便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 “从孔子时代以来, 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 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而依然生存”^[2]。一个民族的生存、独立与强大无一例外都同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回顾历史, 四大文明中的三个均已断裂, 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 究其根源, 乃是因为中华文化强大的内聚力、绵延力和生命力, 因为中华文明拥有其他文明所不具有的强大而独特的民族凝聚

力。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凝聚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风云流变中, 中华民族才能由从“多元”凝成“一体”^[3], 始终保持国家整体的统一。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屹然挺立和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 是维系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坚强基石与精神支柱。

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离不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尽沧桑而不衰, 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成辉, 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创造和发展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与动力源泉^[5]。因此,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如果没有文化, 民族凝聚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6]。

收稿日期: 2024-01-03

项目基金: 2023 年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规划项目“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与路径选择”(2023GDDXX04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付雪芹(1978-), 女, 山东青岛人,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管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领导学、管理学。

一、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关联

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及其宽泛。古今中外,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亦有不同的定义。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文化结构思想对文化的构成要素的厘定,广义的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基本要素构成的。而狭义的文化是专指精神层面的文化,即人文文化或观念形态的文化^[7]。精神文化是构筑在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形而上的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化中最深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特色的体现,是一个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8]。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自身精神文化的滋养,就不可能对自己民族的发展具备强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更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凝聚力。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它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提升、增强的内核性的文化因素^[9]。

(一) 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

中华民族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各成员以其地缘血缘关系和共同经历构筑起来的性格、感情和习俗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来自其独特的民族精神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民族意识等,它通过国家和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的积淀,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成为中华民族感情的粘结剂,历经岁月变迁,政权与制度毁灭与更迭,乃至肉体的消亡,都难以改变。这种能贯穿古今、与时俱进、具有持久深远的精神性的文化向心力和影响力,构成了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促成了其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不仅把不同的民族区别开来,也铸造了各具特殊本质的民族凝聚力。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多次大融合,这种深层的精神文化通过民族文化的传递,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深处,使大一统的理性自觉积淀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奠定了中华民族

统一的坚实心理基础。

(二) 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无数思想精华,为如今中华民族的融凝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不竭的智慧源泉。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以其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协和万邦、兼容并包的治理方式,国泰民安、惠民利民的爱民情怀,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报国之志,在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如中华民族“和”的精神文化,中华文化认为“和实生物”^[10],即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处于“和”的状态,是对宇宙万物本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根本认识^[11]。《吕氏春秋》曰:“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蕴含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天地间万事万物视作统一和谐的整体。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从哲学的角度,讲述人应当遵循自然法则,根据万物的不同特点,努力使万物物尽其性,物尽其用,天地万物乃至人自身能够达到和谐自在的理想境界。在国家民族治理上,《尚书》又提出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指上古圣贤尧十分贤明,能够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倾听百姓的心声,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团结无间,友好和睦。

在寻求不同民族之间和谐融洽的同时,中华文化还注重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同民族之间生活环境造就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汉民族能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通,乃是因为中华民族秉持着“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不是指个体之间没有差异,没有争端,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和”是不同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不同民族间能够包容不同的见解和创造,为了群体的利益能够彼此之间互相搭配融合,生成共性的内聚力,最终达到和谐圆融的状态。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便由是不同部落图腾融合而成,龙就是以蛇身为主体,同时接受了兽类的蹄、马的毛、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等。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中“和”的精神特质,便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数千年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其他氏族部落的过程,从上古时期炎黄部族

与东夷部族的融合，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融合，再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最终形成如今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三）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与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价值取向为基本内容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精神动力^[12]。“周秦伟业”“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13]，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深为自豪。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与羞辱，民族精神促使中国各族人民迅速觉醒，奋起抗争，捍卫民族尊严。再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厄运，民族成员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与自觉意识被激发出来，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救亡图存。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汲取智慧与力量，进一步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传统民族精神，形成了富含时代特色的“伟大建党精神”谱系。这些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硕果累累到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大国担当，这些都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凝心聚力、艰苦奋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竭动力，不论过去还是将来，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都是凝聚国家人民，激励我们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巨大力量。

二、推动精神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代价值

精神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文明底蕴，引领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进、攻坚克难，凝聚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不

断深化中华各族儿女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文明认同。推进精神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促进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它为强国建设厚植精神沃土，凝聚人民力量，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精神文化中汲取养料，把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凝为一体，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文化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就不会产生民族凝聚力，文化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源泉。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14]。也就是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源泉和重要途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民力、凝聚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15]。这就是说，基于中华文化而产生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泉沃土；基于中华文化而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彰显中国特色、塑造中国形象的精神动力^[16]。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对外彰显的中华文化吸引力、影响力和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对内实现以文化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17]。从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百年征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取得了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书写了新时代辉煌的历史篇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凝聚了万众一心的伟力，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艰险，都能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8]。中国现代

化发展不仅要厚植富足的物质基础,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建设。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9],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对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进而增强其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作用,将精神文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才能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与强大精神力量。

(三)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仅是一部浴血奋斗的伟大奋斗史,也是一部砥砺磨炼的精神锻造史。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持续繁荣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根基和底气。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深情阐述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强调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又一次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1]。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全国上下各族人民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奋斗不息。实践告诉我们,在这个重要的转折期,中国能否有效应对挑战,关键在于能否将亿万人民凝心聚力在一起释放巨大的民族力量。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团结统一,崇尚众志成城。我们要弘扬好、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与智慧,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坚定意志、集体智慧和磅礴伟力,为民族复兴伟业培根铸魂。

三、以精神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践路径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民族的精神文化。民族精神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要素更容易将民族成员团结起来,体现一个民族的共同精神向往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因此,要增强民族凝聚力,最有效的一个突破口就是通过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力培育凝结着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是旗帜问题,是道路问题^[22]。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文化工作,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才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23]。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姿多态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发展^[24]。要管好用好各种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凝聚共识,以文化阵地为堡垒引领文化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把文化自信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气质品格与文化传承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26]。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启迪智慧、明晰路径，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优势，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凝聚起全民族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文化建设

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价值观是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文化认同的本质就是要求民族成员要对该民族的文化内核也就是价值观具有高度的认同，否则就无法树立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民族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

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不断吸收异国他邦的文化，丰富多样，各具特色，多元文化交融互动，彼此相互契合，且拥有共通的文化价值内核，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与统一的文化整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只有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2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也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短短二十四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明确了基本的评价标准，既为当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追求，提高了民族成员之间在价值理念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是提升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全社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文化建设，用精神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确保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的方向前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三进”工程；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精神文明创建的全过程，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文明创建活动，让人们在实践中加深感知与领悟，推动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要以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为载体，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坚守优良传统又保持民族特色。要更好构筑面向世界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28]，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成为全体人民自觉践行的日常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出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提升民族凝聚力，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好文化建设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是文化建设成效的最终评判者。要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9]，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提升精神文化的大众性和适应性，凸显时代特色。要善于运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面向大众的媒体平台，充分利用多平台传播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发挥新媒体即时、互动、大众化的显著优势，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精神文化的建设中来。要鼓励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文化产品，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不竭动力，是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30]。向世界推广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传承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产品,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聆听中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搭建海外社交传播平台,通过对“中国梦”“一带一路”等的有效真实报道,将中国建国以来的辉煌成就展示给世界人民,增强中华民族影响力;要打造以我国传统节日为特色的海外精品文化品牌,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亲和力,增强中华民族对外吸引力。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推动人类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新华社,2022-10-16.
- [2] 田旭明.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思想为视角[J].理论导刊,2013(12):80.
- [3] 田旭明.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思想为视角[J].理论导刊,2013(12):80.
- [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56.
- [5] 张永伟,房小军.习近平历史思维的三个维度[J].党的文献,2017(05):40.
- [6] 饶品良.论岭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及其精神价值[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4):82.
- [7] 戚福康,李清华.论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内核之儒学特征[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02):15.
- [8] 赵世林.论民族文化的传承[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2-15.
- [9] 戚福康,李清华.论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内核之儒学特征[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02):16.
- [10] 钱逊.中华文化精神[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1):7.
- [11] 林少红.中华文化精神与民族凝聚力[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01):12.
- [12] 李宗桂.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C].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程更富有时代气息和活力,2015:69.
- [13] 苏泽宇.国家凝聚力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J].青海社会科学,2021(06):26.
- [1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01.
- [15]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01.
- [16] 郝时远.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发展阶段[J].民族研究,2020(06):4.
- [17] 郝时远.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发展阶段[J].民族研究,2020(06):3.
- [18] 岑朝阳,袁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价值逻辑、实践主张与世界意义[J].社会科学动态,2023(01):35.
- [19]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
- [20]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
- [21] 陶芷婷.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话语建构研究[D].江西:江西理工大学,2023:42.
- [22] 陈先达.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06):23.
- [23] 张晶晶.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21:43.
- [24] 姜建成.双选·双认·双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效应[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01):51.
- [25] 詹小美.中华精神标识的要义凝练与国际传播[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17):23.
- [26] 陈斯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社会多元治理主体意识的提升[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6):31.
- [27] 蒋佃勤.《管子》“四维”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来、契合与践行[J].实事求是,2019(04):67.
- [2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 [29] 王均伟.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J].百年潮,2023(06):2.
- [30] 申晓玲.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对策研究[J].唐都学刊,2017,33(05):126.

【责任编辑:张山】

基于大数据治理视角的网络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朱 玲, 侯睿夫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41)

摘 要: 互联网的普及导致信息总量和信息形态的变化, 带来了深层次社会变革。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主体、对象和工作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网络统战是把统战工作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统战工作模式, 其工作路径创新的关键是体系和机制的构建。通过配套的体系、机制保障和促进数字技术嵌入统战工作平台载体, 从大数据治理的数据源、数据汇集、数据分析到网络统战工作能力的提升等方面构建大数据治理的应用框架, 实现网络数字技术与统战工作高度融合, 提升统战工作质效。探索构建和完善网络统战工作的体系和机制, 利用数字化再造助力基层统战工作, 对于提升新时代我国网络统战工作的创新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网络统战; 体系构建; 系统;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29-06

互联网的普及导致信息总量的变化和信息形态的变化, 海量数据通过全域式、泛在化的场景应用, 在驱动经济社会智能化发展的同时, 带来深层次社会变革。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深度融合共同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体系中, 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主体、对象和工作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网络统战拓展了统战工作的外延, 是一个涵盖虚拟空间的新领域。针对这一新空间新领域, 探索网络统战工作创新势在必行。

一、网络统战工作理论研究综述

2005 年,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宣传调研工作会”首次提出网络统战的概念。通过对网络统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可以看到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网络统战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一般性宏观分析, 如陈喜庆(2022)提出要从加强思想引导、推进队伍建设、打造平台载体、加

强组织领导 4 个方面来深入做好网络统战工作。阎世钦(2022)从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凸显的价值入手, 着重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另一些学者针对网络统战的具体对象或工作开展的具体领域进行研究。如刘腾飞(2020)、刘志礼和李佳隆(2022)聚焦网络人士, 分析其群体特征、行为模式, 并提出新时代网络人士的统战策略。吴慧心(2020)以南宁市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实践为例, 探讨二三线城市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有效途径。此外, 还有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 如吉强(2022)从传播生态的视角、史亚博(2021)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赵焱和许烨(2021)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许春玲和刘东等(2018)从网络大统战的角度等, 对网络统战工作进行研究。

综上, 基于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对网络统战所作的定义, 网络统战是指以网络为载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 传统与现代结合, 虚拟与现实结合, 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超时空性和立体交叉性

收稿日期: 2024-02-15

项目基金: 2022-2023 年度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路径创新探析——基于大数据治理视角”(2022-GDSYKT-35)

作者简介: 朱玲(1973-), 女, 汉族,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管理学教研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学、区域发展; 侯睿夫(1983-), 男, 汉族,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管理学教研室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行为与公共管理。

等特点的统战工作,可见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如何围绕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特点,发挥网络载体和技术支撑作用的研究成果甚少,由此为本文在理论方面的有益探索提供了空间。

二、广东省网络统战工作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广东省及各地市统战部门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矩阵情况进行持续跟踪,结合“网络统战工作创新研究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以及到各地相关部门和组织进行调研,本文以广东省网络统战工作的情况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

(一) 广东省网络统战工作概况

1. 广东省各级统战部门由上至下的统战工作网络体系框架初步建成

目前,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已有广州、深圳、汕头、佛山等 14 个城市先后建成了统战部官方网站,并且由广东省委统战部网站可以直接链接此 14 个地级市的统战部官方网站,大幅提升了掌握广东省网络统战信息动态的便捷性。此外,广东省统战工作的微信矩阵框架也已基本建成,较有效适应了受众通过手机客户端了解统战信息的操作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统战信息的网络传播速度,提升了网络统战的效率。但是,整体而言,广东省及各地市统战部门的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仍未能全省覆盖,整体推进力度和速度仍需提升。

2. 统战部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在内容呈现上以传统统战工作为主

广东省及各地市统战部门官方网站在版块机构设置以及内容呈现上以传统统战工作为主,即由多党合作、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非公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侨务工作等内容构成。而且,多数地市统战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存在内容薄弱乏新,缺乏吸引力的问题。微信官方公众号版面内容类别较少,多以中央、省委和市委的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统战工作的新闻动态等为主,发布的文章原创性不足,缺乏接地气、贴近受众、具有深度思考和启发性的文案,而且交互功能弱,没能较好发挥微信平台与统战对象实现实时交流互动的功能优势。

3. 统战工作互联网应用发展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

特大城市和一线城市统战工作互联网应用能力与发展远超二、三线城市。比如,深圳“同心鹏城”微信公众号,仅 2022 年一年,粉丝的数量就从 8000 激增到 16 万,微信传播指数在同年的 8 月、9 月更是蝉联全国统战系统第 1 名。而汕头“鮀城和音”微信公众号与之对比就逊色很多,同年共发布 825 条推文,粉丝数量 2014 人,粉丝数量及地域分布均显示该官方微信公众号缺乏影响力。

从调研了解到,城市经济、文化和网络产业发展水平制约着网络统战工作的开展。二、三线城市普遍在财政收入上同一线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虽然地方党委和政府秉承着支持统战工作的态度,但在实际资金支持上还是稍显不足。此外,二、三线城市文化和网络产业发展的层次以及城市化水平稍显落后的情况,也制约着互联网企业的落户以及互联网人才的集聚,由此导致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的最新成果难以在这些城市推广和应用。因此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分析,也注定了一线城市会成为网络统战率先兴起的主力军,利用网络统战方面技术和理念的扩散,更快寻求出合适的发展路径。

(二) 广东网络统战工作的调查结果分析与启示

1. 调查结果分析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第一,网络统战在思想政治引领和提高统战对象参政议政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题 2,“您认为您所在部门(组织)或地区的网络统战工作发挥了什么作用?”选题的占比中,“思想政治引领”是 84.64%,提高统战成员参政议政能力是 86.52%;同时,可以看到统战成员期望统战工作能更好发挥网络的综合功能,包括拓展链接功能、与统战对象和网民的互动沟通功能和服务功能等,如题 3“网络统战工作应该在哪些方面更好发挥作用?”选题中,选“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拓展多地多方合作”是 80.32%;题 4“网络统战的工作重点”选题中,选“为国家建言献策”是 83.29%，“关注人民生活”是 78.17%，“监督公共权力”是 72.24%。

第二,目前广东统战工作的方式朝着“线上

+ 线下”相结合稳步推进,但以传统方式为主,网络平台的利用有待提升。如题5,“您所在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形式”选题中,统战形式的占比分布为,座谈会83.29%,专题活动72.51%,宣讲报告会62.26%,联谊活动59.84%,社会服务58.49%,网络平台活动43.13%。

第三,广东统战宣传工作方式呈现多样化,传统方式和网络新媒体能实现有效结合。如题6,“受众获取统战方面信息的主要渠道”选题中,得到的结果依次是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介以及统战及相关部门的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和官方组织的网络论坛、网络教育培训等。但同时也暴露出网络新媒体在利用力度和吸引力方面存在不足,如题7,“所在(或加入)的部门(或组织)是否通过新媒体推送统战工作信息和政策”选题中,“经常”占61.42%，“偶尔”占25.34%，“较少”占9.7%；题8,“您浏览关注所在组织或地区网络统战工作平台信息的频率”选题的占比,“经常”是54.99%，“偶尔”是38.27%。

第四,引导网络人士参与统战工作的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在课题组与汕头市新阶联的网络人士座谈中,网络人士的代表表示,他们对于如何更好参与网络统战工作,以及网络统战工作具体应如何开展是不大清楚的,统战部门没有就网络统战工作给予具体指导,也没有出台工作的实施细则。同时,相关部门也无法为他们在网络统战工作上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各地区的网络人士更是鲜有机会共同探讨网络统战工作相关问题。因此,网络人士参与统战工作的引导机制、培训机制、联谊机制等有待完善。

2. 调查结果分析的启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可以看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不断丰富和创新统战工作。而网络统战不可能从统战工作中单独切割出来,其实质是服务于统战工作。网络统战工作创新的关键点应是体系和机制的构建,通过配套的体系、机制保障和促进数字技术嵌入统战工作平台载体,实现网络数字技术与统战工作高度融合,以更好地服务统战工作,提升统战工作质效。为此,本文将网络统战工作创新研究聚焦于网络统战工作体系和机制的构建。

(三) 网络统战工作体系和机制构建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通过对广东省尤其是深圳和汕头等地网络统战工作的调查分析,结合我省各地在网络统战和网络监管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网络统战工作体系和机制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统战工作平台的建设与运行缺乏系统思维

一方面,当前统战工作数字化所需系统平台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待提升完善。虽然各地都在纷纷建设和完善官方网站和构建微信公众号矩阵,但多数仅是将线下传统统战工作版块搬到线上,平台建设缺乏精细化和精准化。目前,统战部门的政务内网系统、统战业务服务系统、统战对象信息管理系统、舆情监管系统等子系统还有待开发完善。另一方面,缺乏以系统思维搭建促进统战工作的信息平台。例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新阶联等与统战工作密切相联的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进数字化建设,但各自在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更高层级的统一规划管理,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和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导致各系统在开发标准、数据的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不统一的情况,这也为后续系统的集成增添了难度。

2. 组织协作亟需加强

统战工作涉及面较广,面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趋势,亟需加强横向和纵向的组织协作。从横向来说,在实际工作中,例如宣传、公安、网信办、文化等部门均涉及网络行业发展和网络舆论监管等问题,而统战部门工作的重点更多是集中在“人”上面,与统战对象做朋友,表现在网络统战的层面,则是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强与统战对象的沟通、对网络人士进行沟通、管理、引导、培训,并且掌握网络人士的动向,及时回应和引导网络舆论,因此单纯依靠统战部门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要求,统战部门需与各部门通力配合,构建一个能够整合各方力量的工作平台。从纵向来说,部分地区统战部门由于上下脱节而出现各种问题,如部分地区各级网络平台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无法实现上下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等问题。因此,如何加强组织协作治理,打破壁垒,形成推动新时代

统战工作的合力是亟待破解的重要难题。

3. 地方统战部门网络平台建设缺乏有力支持

目前,除一线城市外,二三线城市的统战部门在网络平台数字化建设方面普遍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的难题,特别是熟悉网络统战业务的专业人才缺乏。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统战的扁平化,网络平台的平等性、开放性和参与性,需要统战工作人员熟悉网络语言的表达和沟通方式,而不仅仅是单向传递与接受。目前,不少统战工作人员仍习惯于说教式的官方语言,无法与工作对象在线进行有效互动,更难以和工作对象产生共情和共鸣。此外,新阶联中的网络人士由于没有系统的引导和培训,缺乏对统战工作的全面认识,无法有效地在网络空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 网络统战的数据利用和监管体系的构建有待探索和实践

各地统战部门都在思考和推进网络统战的领导机制、宣传和教育体系等体系机制的构建,但较少涉及网络统战的数据利用和监管体系的构建,而这恰恰是网络统战工作有效、安全开展的基础保障。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利用数据资源为统战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运用数据监测、疏导和管控网络舆情等功能的开发和体系的构建都有待各地统战部门的探索和实践。

三、网络统战工作体系构建及实现路径

通过对当前广东网络统战工作状况的实证分析,本文尝试以大数据治理的视角,探索网络统战工作的创新路径。

(一) 思维方式的突破

1. 网络统战思维方式的创新关键在于引入大数据治理思维模式

大数据中的“大”不仅单纯是数据节点的绝对数量,更重要的是采用全数据模式。统战工作的核心是围绕“人”来展开,即以微系统为基础,囊括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长期系统的数据生成全过程,全数据模式使得统战及相关部门可以更好地预测统战对象的行为模式以及与之发生关系的社会关系,由此更具针对性地来开展工作。

在大数据治理思维模式下,网络统战工作过程始终伴随着公众、社会组织或企业的参与,其既是网络统战工作数据服务的对象,也是数据传递和收集的参与者,以及网络统战工作数据服务效果的评价方。以线性方式单向进行数据管理的传统做法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需要利用技术提供数据服务的集成和定制,实现跨组织边界的治理工具与服务对象的协同。

2. 充分发挥网络作为治理工具的属性

网络是统战对象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产生社会影响的工具,同时也是统战部门实施治理的有效工具。网络统战工作创新的具体内容应是思考如何充分发挥网络的工具属性,以此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让网络发挥其最大作用,助力统战及相关部门实现有效治理。以大数据治理模式的视角,网络统战工作中网络的功能主要有拓展工作信息交流渠道和信息管理与使用的规范化和可追溯化两方面,逐步形成社会化、去中心化的工作机制,增强网络统战工作能力。

(二) 体系与平台的统筹规划

1. 统筹衔接政府数据治理平台

网络统战不仅是建设统战信息化项目以实现物理归集和数字化,更应从政府业务顶层架构与数据管理的层面重塑统战部门与政府相关单位的作业单元。目前,我国一些城市在积极探索“大统战+”模式,提出了诸如“大统战+招商”“大统战+吸引人才”等实施理念,这些实施理念最大的特点就是跨部门协作。根据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具有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责。统战部门可以此为契机,加强部门协作,构建以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为核心的统战业务发展顶层设计框架,优化“大统战+”模式体系,促进多部门协同开展项目建设、运营与管理,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数据生态系统,实现统战平台与政府数据治理平台有效衔接。

2. 构建完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

统战数据资源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支撑,统战部门可以着手推动开发建立数据信息资源库,由上至下,逐级推进建立包括侨情资源库、民主党派

信息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信息库等基础信息库,并在此基础上细分类别,如专门针对新生代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的侨情资源库、网络统战人士信息库等各类别信息库。以数据库的建设,带动实现由上至下纵向的和地方部门间横向的数据共享,以大数据推动“大统战”。针对相关统战对象出于隐私和安全性等原因不愿提供完整信息的情况。可尝试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协同以推进数据信息采集,从服务统战对象的视角出发,对接统战对象的自身发展需要和应用需求,在提升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实现数据精确和精准。

此外,还要统筹数据资源管理规则和服务规则。数据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都涉及相应的规则,针对目前数据管理与服务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亟须建立一套适合与大数据资源体系相适合的与共享、开放、利用、安全等因素相互关联的数据管理机制和互相连接、灵活共享、彼此信任的融合机制。

(三) 组织运作的协同治理

数据联结的虚拟性使网络统战数据治理链呈现多元、扁平的结构特征,因此将社区工作网络构建为网络统战工作体系的基础,以数据源(个人)为出发点,通过数据利用,最终实现对数据源(个人)的服务价值和数据平台终端(统战部门)的良好决策价值。

1. 强化统筹,完善层级协同治理

社区网格数据协同治理,应该是自上而下各层级的联动,具有层级归属特征。在实际的社区工作中,要避免上下相互脱节或重复建设的浪费,就需要省、市级和区县各级相关部门统筹业务系统,可考虑在原来按统战对象分类的工作版块的基础上,增加信息业务科室的建设,统筹信息网络工作,以此为社区统战工作网络业务系统的整合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2. 厘清权责关系,优化数据协同治理机制

社区网格横向协同的顺畅需以确定各方主体的参与内容和各自责任为根本条件。一方面,优化地方政府数据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多元主体合作行为。政府作为数据治理主导机构,要更加注重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协同供给,以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另一方面,梳理多元主体的责任和分工,明晰各自的

权责。以社区为单元基础,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形成良性互动的联动创新。

(四) 数据流通的监督管控

网络统战监管体系构建应该与地方电子政务建设结合,仅依靠统战部门无法支撑监管体系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需要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将网络统战监管体系融入地方电子政务建设,统筹规划基础设施、统战业务和网络安全。

1. 构建完善网络统战协调联动机制

由单一主体防控转向多主体协同防控,使统战部门和统战对象(包括组织和个人)都承担数据安全方面的责任。为此,要建立数据防范的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构建包括数据流通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流通追溯、数据防控自查自纠和公众监督等在内的制度。还要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与通报协作联动机制,各层级建立信息监管体系的安全监测系统,实时采集统战系统运行数据和互联网出口安全设备日志等信息,形成从数据采集分析、威胁感知研判、风险评估到应急处置的安全监管闭环。安全监测系统与统战系统业务外网运维系统对接,向统战平台推送告警信息,实现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与通报互联互通。

2. 完善网络舆情处置机制

各统战部门要依托各自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平台构建完善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反馈—通报”机制,收集汇总和分析处理网络舆情信息,为统战部门及时处置舆情矛盾提供信息支持,快速回应疏导舆情问题提供载体的保障。同时,推动各类统战成员积极有序地参与网络发声,并畅通渠道及时将其意见建议纳入统战工作部门的视野。针对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涉及面广的特点,要建立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网络舆情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加强各部门单位的协同配合,监测、过滤、审查、筛选统战信息资源,适时介入重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信息生成和舆论传播过程,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和话语权,化解网络舆情。

3. 探索构建数据反馈监管体系

各统战部门要依托各自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实时采集监测业务云平台全流量及核心关键基础设施日志信息,对访问量较大的业务系统进行重点关

注,深入研究,开展前瞻性分析预判,为网络统战工作提供决策分析。另外,要建立完善“收集—分析—评价—督导”的数据利用流程,通过对统战部门和相关单位网站后台数据汇总统计,实时了解各部门业务运行情况的动态数据,及时把握统战对象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倾向和评价反馈,为高效合理地规范和监管统战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

- [1] 陈喜庆.关于加强网络统战工作的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16-20.
- [2] 阎世钦.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问题与对策探究[J].网络统战工作研究,2022(5):57-64.
- [3] 吴慧心.二三线城市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有效途径探析—以南宁市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5):39-43.
- [4]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使用工作方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 [5] 晁艳锋.新型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研究[J].信息系统工程,2020(12):83-87.
- [6] 郭振雪.新时代中国网络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和构建机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190-194.
- [7] 赵国华.论网络统战工作中的官微建设—以山东统一战线微信公众号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2):44-49.
- [8] [美]桑尼尔·索雷斯.大数据治理[M].匡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 [9] 洪伟达,马海群.我国政府数据治理协同机制的对策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9(19):49-55.

【责任编辑:余伟】

延安“窑洞对”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刘超伟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窑洞对”发生在 1945 年 7 月的陕北延安, 对话发生在黄炎培等 6 位民主人士赴延安考察期间, 对话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讨论, 引出关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无法回避的朝代周期更迭问题, 对该问题的解决是确保政权稳固的根本前提。延安“窑洞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表明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认可, 提出了“隆中对”后又一历史佳话——“窑洞对”, 提醒中共要正视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延安“窑洞对”也具有重大的时代启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需要继续发扬; 持续加强党的自我革命, 不断提升执政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关键词:延安考察; “窑洞对”; 历史周期率; 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35-06

2021 年 11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 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 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 这就是自我革命。”^[1]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提起延安“窑洞对”以及“窑洞对”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话题, 以此警示全党。延安“窑洞对”发生在 1945 年 7 月初, 黄炎培等 6 位民主人士从重庆到延安考察, 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进行的一次重要对话。在此次对话中, 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一、延安“窑洞对”的对话内容

关于延安“窑洞对”的对话内容,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具体如下: 在几天与黄炎培等的交谈中, 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 黄炎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 耳闻的不说, 所亲眼看到的, 真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一人, 一家, 一团体, 一地方, 乃至一国, 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 我略略了解的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 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

收稿日期: 2023-12-01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参政党民主监督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18BZZ05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超伟(1985-), 男, 河南永城人,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教研部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广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现代化与多党合作研究。

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窑洞对”的主要内容就是一问、一答。问答中提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历史周期率。所谓历史周期率，是指古今中外无数个王朝政权反复出现的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从兴到衰、从衰到亡的生命周期现象。在政权刚建立的时候，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无不精诚团结、顺应民意，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逐渐成长并获取国家政权，但随着政权的巩固，统治集团内部便开始出现分化和腐败，逐渐脱离并剥削人民群众，导致统治集团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引发人民群众反抗并推翻原有政权，形成了一个王朝的兴衰灭亡周期。这个周期在中国历代王朝政权中反复出现、持续轮回，于是形成了一定的频率，黄炎培将此叫作历史周期率。

二、延安“窑洞对”的重大历史意义

延安“窑洞对”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史上的经典故事，无论对多党关系的发展，还是对中共红色政权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表明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认可

黄炎培出于善意提醒的目的，告诫中共要以历史上的王朝周期率为戒，找出一条新路来打破周期率。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就着手撰写并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并在重庆的书店进行公开发售，这本书以纪实的手法描写了延安考察的整个经过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其中多处表达了对中共和延安的充分肯定，比如：“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延安的人民都气色红润，没有看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看见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中共的高级将领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朱德厚重温文自不必说；延安的土地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中共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是进步的。”^[3]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大震动，让国统区的民众看到了一个崭新而光明的延安，这和国民党刻意丑化共产党的宣传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在国统区的黄炎培写

出这本小册子并出版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之所以还这样写并出版，这就说明黄炎培对中共是真正的从内心认可了，不惜冒着得罪国民政府的风险把中共的真实情况展现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

（二）提出了“隆中对”后的又一历史佳话——“窑洞对”

不少历史学家喜欢拿“窑洞对”与历史上的“隆中对”作比较。所谓“隆中对”，就是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与诸葛亮在古隆中的茅庐里的对话。诸葛亮在对话中给刘备提出了一个匡扶汉业的宏伟蓝图。从对话内容上看，“隆中对”讲的是如何夺取天下，对内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对外联合谁、攻打谁，然后时机成熟后夺取天下。也就是说，“隆中对”回答的是如何夺取天下、获得政权的问题。“窑洞对”回答的是在夺取天下后如何守住天下、巩固政权的问题。所以，两者正好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分别回答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两个政权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只讲夺取政权，不讲巩固政权，政权则不能长期稳固，最终建立的政权也会掉入到王朝周期更替的怪圈。因此“窑洞对”是“隆中对”关于政权建设话题的重要补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提醒中共要正视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从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几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少的类似之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黄炎培提到的周期率问题。一个王朝的建立往往是从军事斗争夺取地盘开始的，当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往往能够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鼓励开荒种地，快速恢复生产；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加。这一系列的政策帮助国家走出战争创伤，逐渐走向强盛。但随着政策推进几十至一百多年以后，建立王朝的这代人已经逝世殆尽，继承王朝政权的子孙们大多是锦衣玉食的皇子，他们对打天下的艰苦并没有其先辈们感受那样强烈，反而是逐渐安于享乐，不惜去加重税负，与民争利。各地的大地主阶级也开始疯狂兼并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不断激化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最后在农民起义领袖或者原有

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下发动武装叛乱，直接推翻王朝，然后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周期循环。我们党必须要警惕这种现象，千万不能忽视这一“历史周期率”带给后人的启示。

三、延安“窑洞对”的现代启示

“窑洞对”中提到的巩固政权的话题，特别是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回答，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党长期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4]在2021年7月1日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5]江山一词本指自然界的大江大河大山大岭，也就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自然疆土，在封建王朝时期，江山被引申为国家政权。打江山是开疆扩土占领地盘，而坐江山是执掌政权管理地盘的意思。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把政权的根基看成是自然的疆域，认为只要是王朝的军队占领着王朝的疆土，那么生活在疆土上的人民也就自然成为王朝政权治理下的臣民。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这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皇家有权、人民无权。

真正将人民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等党的先驱们深深地认识到人民所拥有的强大力量，认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必然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的新政权也必然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型政权。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指出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论断。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建设的政权必然是人民政权，也就是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执掌国家政权。所以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直接想到的就是人民，要靠人民来监督政府，要广泛推行民主，真正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政权。人民是政权的主人，自然就不愿意再去推翻政权，从而达到政权的长期稳固。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人民和政权的关系也有了新认识。“江山就是人民”，说明国家政权的主人是人民，政权是为人民而存在。共产党人为人民而生，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是带领人民前进的领航员。在中共十八大上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十八大以来，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这都是党执政为人民的直接体现。“人民就是江山”，说明人民是国家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政权合法性的本质要义。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服务对象，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也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坚强后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7]没有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就无法取得从革命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也就失去了执政的根基。

这是“窑洞对”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启示：共产党必须时刻坚持执政依靠人民，执政为了人民，做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永远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这既是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保持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

（二）多党合作优良传统需要继续发扬

中共与民主人士之间有许多密切合作的佳话。如1941年11月6日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共度难关。李鼎铭递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出兵不在多但要精，行政机构要简化的建议。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精兵简政”的政策很快得以通过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实施，这条政策也成为中共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以及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

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被毛泽东称为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又如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报告一经公布，民盟的费孝通提出应去掉了其中的“下”字，随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并采纳了这一建议。

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主监督，主要表现为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对中共这个执政党的监督。民主监督不是质疑中共的领导，也不是专门为了给执政党找麻烦，而是从站在执政党之外的角度帮助执政党发现执政过程中的失误或不足，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避免中共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更加注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发挥，创新了不少民主监督的形式。2016年7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所对口地方一线调查研究，通过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对脱贫攻坚落实情况进行监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8]这标志着中共中央赋予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的重大职责，也创新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全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分别结对中西部八个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省份开展专项监督活动，为我国在2020年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定目标的顺利实现作出了突出贡献。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取得重大成绩后，党中央继续发挥这一民主监督形式的作用，再次提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相信这种新的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将会成为一个惯例并长期坚持下去。

这是“窑洞对”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启示：要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积极构建新时代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畅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各级党委政府提意见提批评的渠道和形式，允许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提出自身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要积极听取、及时回复，适合采纳的要积极采纳，并对意见的提出者给予适当的表彰，以此来推进多党合作的持续深入发展。

（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升执

政能力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产党要想长期执政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大变局。从国内看，我们完成了精准扶贫，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步伐坚定地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从国际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从与中国合作反恐到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使中国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外部发展环境。再加俄乌、巴以等地区冲突的加剧，给全球政治交往、经贸往来、文化交流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更加剧了我国发展面临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力，保持中共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十八大报告指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9]越是复杂的形势，越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把握全局引领全局的执政能力。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无论是党的整体，还是党员个人，在自身素质、思想觉悟、政治行为等方面，都应该具有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走在人民前列，充分发挥其先导、先锋、模范和榜样的作用。党的纯洁性，是指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党员队伍纯洁，要把队伍中存在的以权谋私、腐败变质，不能继续领导人民前进的害群之马及时清除出党的队伍，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坚持反腐倡廉，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之气力，开展一场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无禁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极大地净化了党的干部队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执政根基也因此更加巩固。

这是“窑洞对”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一个政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执政党自身是关键。执政党能够根据国情、世情、党情的变化进行学习进步，提升把握时局、引领前进的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能够敢于坚持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并且做

到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统一，才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政权的长期稳固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就是要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民主指人民充分享有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以及对其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宣称自己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因为与民主相对应的是专制，比如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维护少数人利益而忽视多数人利益的制度，所以早已被时代所抛弃。民主制度可以使各个阶层和地区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也使决策的结果更能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更加有利于决策的顺利执行。

我国于1954年9月出台第一部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前三条都在说明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机关的设置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国有14亿多人口，不可能做到什么公共决策都要全体人民一人一票来投票决定，不能实行直接民主，就得实行间接民主，就是说每人投一票选出一个代表，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替人民行使公共权力，投票决定公共事务。由人大投票产生其他的国家机关，比如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民法院院长都由人大选举产生，都要定期向人大报告工作。所以人大就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国家选举民主的组织形式。

作为选举民主之后的有益补充，国家又积极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两者相结合是中国民主制度的一大特点。协商民主重在“协商”二字，通过引导不同利益代表的公民或公民代表平等对话、讨论、协商、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避免选举民主只代表多数人利益容易忽视少数人利益的不足。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六种协商类型。通过选举民主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协商民主中的平等协商来倾听不同意见和凝聚广泛共识，从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两种民主形式的充分结合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实质内核。在充分结合两种民主优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突出民主的主体涵盖全体人民，民主参与的内容涵盖所有公共事务，民主的覆盖范围涵盖中央、地方和基层，民主的流程要涵盖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成为我国探索民主制度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是“窑洞对”给我们带来的第四个启示：从选举民主到协商民主再到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着力打造涵盖全体人民和整个民主过程的最广泛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最充分的彰显和表达。

参考文献：

- [1]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 [N]. 人民日报, 2022-06-30 (0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888-1889.
- [3] 黄炎培. 延安归来 [M]. 国讯书店, 1945: 28、29、31、39、41、48.
- [4][7]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1(07): 11.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1(14): 9.
- [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N]. 光明日报, 2012-11-16 (04).
- [8]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N]. 光明日报, 2016-07-27 (01).
- [9]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光明日报, 2012-11-18 (04).

【责任编辑：陈童敏】

参政党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路探究

齐春雷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民主党派作为“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必须加强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参政党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聚焦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战略任务, 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 不断优化政党功能, 夯实组织基础, 提升履职能力。

关键词: 参政党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 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 政党协商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4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2]。参政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和执政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要与中国共产党协同共进, 必须加强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参政党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聚焦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战略任务, 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 不断优化政党功能, 夯实组织基础, 提升履职能力。

一、聚焦凝聚共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思想政治建设不仅是参政党建设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也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基础和保证。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聚焦凝聚共识, 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行动自觉, 汇聚政党智慧力量, 引领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群体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推动形成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一)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探索找到的强国之路、复兴之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作为具有高度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的伟大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政党主导、使命驱动”^[3]的鲜明特征决定了必须由党的坚强领导统筹协调、掌舵领航才能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 参政党作为多党合作的重要主体, 其功能作用固然取决于自身发展和内部因素, 同时也极大地取决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条件的供给。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政党建设才能融入国家政治体系, 进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发挥政党功能, 实现政治理想, 这是必须遵循的中国政党政治规律, 不仅为多党合作的历史所证明, 而且为各民主党派发展历史所证明。新时代参政党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要不断巩固和执政党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 以坚持

收稿日期: 2024-03-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立项号 22ZDA034)

作者简介: 齐春雷(1970.11-), 女, 安徽界首市人,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主要为政党政治、统战理论、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参政党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和首要政治前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帮助执政党加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念原则等的宣传阐释，引领所联系阶层民众统一认识，增强信心，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二）不断加强政党政治性建设

政治性是参政党作为政党的根本属性，中国政党不同于西方政党的争权夺位、相互攻讦，而以团结合作为目的，政党关系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关系。民主党派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其政治性建设事关主体功能发挥，事关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特色优势的彰显。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参政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者、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要将政治性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之下，清晰认准自身定位，明确政党主体责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4]。从而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的理解认同、对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一个政党有自己的政党建设理论，就树立了政党发展的主动性，要以执政党为师，通过理论创新引领建设实践的新发展，在政党理论建设中突出政治性，增强参政党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担当意识，加强对参政党的政治实践、政党实践的思想政治引领，将各级党派组织和成员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在思想政治建设上做到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才能干在一起。

（三）持续跟进理论政策学习

参政党建设要与时俱进，就要时刻关注“国之大者”，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任务要求。当前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问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

持续扩散，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参政党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心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部署，加强对国家和地方发展形势和发展趋势的了解把握。加强时事政治理论和相关政策的学习，尤其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全面学习，并将其融入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之中。要引导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深刻认识新时代新阶段参政党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势、新任务，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念和核心问题，用更宏观的视野、更发展的眼光、更开放的思维，自觉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大势，找准自身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着力点、发挥自身特长优势的切入点，将自身建设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坚定维护执政党在重大决策中所持的立场，共同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风险挑战。

二、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履职能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5]，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6]。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层出不穷的治理难题，不仅考验着政党参与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能力，而且为政党发挥功能、挖掘潜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参政党应通过广泛深入的政党实践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基本职能履行中锻炼队伍、提升能力。

（一）坚持问题导向参政议政

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效能的发挥不仅需要执政党的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参政党的全力支持与参与。作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诸如“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供给体系质量还不高、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7]等卡点瓶颈，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坚持问题导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切入点，找准政党特色优势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锚定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短板以

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进行前瞻性的谋划研究。比如,我国面临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和西方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限制打压,作为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汇集大量专家学者、科技人才的民主党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要助推国家科技战略,在国家急需的高端芯片、新一代的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科技领域攻关上,发挥界别优势和人才优势,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要善于借用外脑的力量充实参政议政骨干队伍,加强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各种“智库”的沟通联系,通过各种研讨会、座谈会、论坛等构建、形成资源信息的共享联动机制,在“头脑风暴”中激发创造性新力量、新思路,提升参政议政质量。

(二) 关注治理过程民主监督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船大掉头难”,避免国家治理不出现重大偏差错误需要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设计中的监督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而且“监督要真监督,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忠言逆耳,我们要闻过则喜、坦然接受”^[8]。参政党民主监督作为具有政党高层次、组织性的政治监督,应通过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安排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的全过程。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视野开阔、参政议政经验丰富、联系渠道广通、政治表达能力强等诸多优势,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党派的自身所长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所需紧密结合,积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寓民主监督于参政议政、政治协商之中,就国家和地方治理进行务实监督,不仅监督公共政策的出台而且关注其执行过程,有效弥补政策疏漏,纠正政策偏差。可以对于某一专项问题、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整合八个民主党派的资源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及时监督其过程,反馈不足,查遗补缺,加大监督力度,提升监督的精准性、实效性。

(三) 提升决策质量政党协商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复杂性、系统性,使

得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注重以专业化、精细化的民主协商来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参政党汇集各领域、各行业的专家学者、精英人才,拥有各种知识、智慧的高密度、广覆盖。新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党协商日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充分采纳。参政党要在与执政党合作协商中体现政党价值功能、增强政党协商的质量效能,必须增强主动协商、主动作为的意识,准确把握大局所需,锚定重点领域,将参政党在教育、科技、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特长转化为政治优势,提升协商能力和建言质量。要聚焦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与资源的高效配置等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领域,在尽快形成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上深入考察调研,发挥联系高校、科研院所的资源专业优势,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严谨论证、建言献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助力共同富裕优化政党功能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为此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参政党成员构成主体——知识分子素有“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党功能,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要利用在中国政治体系之内的地位优势、资源优势 and 智力优势,为民众“鼓与呼”,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攸关领域,反映民众诉求,维护民众利益,促进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一) 政治参与畅通民众意志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9]。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既要加强顶层设计,也要坚持问计于

民,使公共政策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政党来自民众,联系民众,充当社会、民众与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要将民众的意愿诉求有序导入政治系统,使公共政策的出台建立在真实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认同、支持而得以顺利实施、见效。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在各级人大、政协、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任职,在中国政治体系之内拥有丰沛的资源,要进一步畅通作为党委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吸纳政治参与的政党功能,将所联系群众的意见诉求通过制度化渠道输入政治系统,将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社会政治力量有序纳入中国政治体系之内。在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党实践中,组织引导民众日益膨胀的政治参与需求,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治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多种形式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全过程,拓展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将人民意志融入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方针之中。

(二) 利益代表促进多元利益协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跟他们的利益有关。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政策措施确实基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所关涉领域范围群众具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阶层结构持续分化,利益群体多元复杂,不同阶层群体的意见诉求亟需输送进国家政治体系得到充分表达,并对国家治理的公共政策制定产生有效影响。在巩固和扩大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还需要通过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协商,进行超越不同阶层群体具体利益诉求之上的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才能达成利益的共识、利益关系的和谐。鉴此,参政党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地方的重要性事务上,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民众整体利益的大事、要事、难事上,要充分发挥利益代表功能,代表、反映所联系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对于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重大项目,可以展开

深入的调查研究论证、集思广益,运用参政党组织网络广泛汇聚各方意见建议,在协商合作中帮助执政党引导协调方方面面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与社会整体利益、民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社会多元利益差异、利益冲突得到有效整合。

(三) 社会整合提升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新型政党制度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民主党派的广泛参政有机结合,执政党和参政党紧密团结、民主协商,促进政治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凝聚高度政治共识,强有力地整合社会各阶层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要求参政党不仅代表、维护所联系阶层群体民众利益,而且要兼顾民众整体、长远、根本利益,辩证看待、协调这两方面在有些情境下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参政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之内而政治地位又较为超脱,更便于引导各阶层民众客观、理性地看待全面深化改革中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调整,帮助党委政府做好情绪疏导、利益协调、矛盾化解。为此,要围绕所在地域、行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发挥职能优势,将民众多样化、多元化的意愿诉求提炼、整合、输送到政治体系之内,通过人大、政协、“党派直通车”等政治渠道及时有效地反馈到党委政府的决策部门,切实促进公共决策建立在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更趋向社会公平正义。

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夯实组织基础

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0]。组织建设是参政党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参政党要广泛动员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群体围绕解决人民面临的实际民生问题,积极投身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在民主建设和民生改善二者的循

环递进中加强政党组织建设,夯实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 扎根基层民主实践

“基层是培育现代化内生力量的沃土,也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和实验田”^[1]。因此政党的社会根基在基层,新时代参政党尤其要注重基层组织建设,通过扎根基层来培育民主精神、锻炼民主素养和加强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充分调动民众的主体性。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从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到社会组织协商、基层协商的广泛、多层、深度发展,为参政党成员及其所联系阶层民众的民主实践开辟了更广阔空间、更畅通渠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有效”的目标指引下,要密切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引导他们有序的政治参与、合理的诉求表达。参政党有相当数量成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室直接联系基层,对基层各领域民众所愿所求的感知理解更为直观深刻,要充分关注民生热点、焦点,反映民众真实诉求,以议案、提案、调研报告、资政建议、社情民意信息等多种形式,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安全等各类民生问题建言献策,提升基层党委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合理性。民主党派作为知识型政党,其成员深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还能宣传引领协商文化,引导民众加深对协商民主所秉持的自由平等理念、协商规则、公共协商的合法性等的理解,培育促进社会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帮助完善基层协商民主体系、协商程序等,从而在全过程、全链条、全领域的民主实践中,提升政党民主效能。

(二) 致力基层社会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融共进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是党委政府与民主党派、民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要释放民众参与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活力,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整合基层各界的资源力量,打造多元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各民主党派渠道广通,与社会组织、民众联系广泛,要帮助党委政府构建、优化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利

益表达、关系协调、社会服务等政党职能有效转化为路径优势。民主党派具有完备的政党组织结构,党派成员下沉基层,扎根社会,可以发挥专业特长以及所在单位、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加强与基层群众的联系沟通,致力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例如,民革作为联系社会法制界的民主党派,有相当数量成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律师,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专业性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在土地拆迁征用、污染补偿纠纷、物业管理、劳动关系、环境保护等基层治理常见难点问题上,帮助基层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疏导化解矛盾纠纷。新时代知识分子大众化使得民主党派旗帜性人物比较稀缺,且多数成员个性鲜明,自主性、独立性大为增强,仅仅依靠个别领导和领军人物作用的发挥,很难再起到“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效应。因此,不仅要通过党派组织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而且要调动起普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投身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助力乡村振兴、承接社会服务中多渠道参与基层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激发基层党派组织活力。

(三) 健全党内民主机制

参政党与执政党同为多党合作的重要主体,相比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参政党内部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相关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极大地改善着参政党的外部政治生态,势必对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带来深刻影响,参政党成员在这方面也会抱有更高的要求 and 期待。应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参政党党内民主机制,与之形成内外呼应、良性互动。其一,党内组织建设应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调动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广大普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包括保证广大党派成员的民主权利,如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决策权等;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制度,使之形成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着力营造更为民主宽松和谐的内部氛围,以平等的身份、讨论的方式加强党派成员之间的感情沟通、思想交流,让成员在得到组织理解、尊重、支持的同时,增强党派组织凝聚力、

向心力。其二，健全代表人士评价推荐机制。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的推荐工作要有一套更加科学、民主、完备的评价推荐机制。参政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主体，其核心职能是参政议政，必须考虑推荐成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意愿，加强对其政治素质、社会责任等的考察，要以党外人士代表性的三个评价维度即“政治性、专业性、群众性”为主轴，制定科学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而不能仅仅依据其在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其三，完善参政议政民主机制。据学者调研发现，“还存在参政议政体制安排的制度化渠道少，基层党派成员履职锻炼的平台不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12]参政党的职能履行具有政党性、组织性，不仅要发挥个别代表性人物的作用，更要注重发挥政党的整体功能和组织的集体智慧，要通过科学民主的集体决策机制，组织全党共同参与、同谋大计，凝聚更广泛、更强大的智慧合力。

参考文献：

- [1][2][5][6][7]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16,64,,53,49,54.
- [3] 李海青. 使命型政党开启现代化新征程[N]. 学习时报，2020-12-14（2）.
-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
- [8] 赵连稳. 习近平的政协民主监督思想[J]. 理论视野，2016（11）22-29+55.
- [9][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外文出版社，2022:58，258.
- [11] 王立胜，李昊天. 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 毛泽东研究，2023（3）4-17.
- [12] 王江燕.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问题研究——基于制度参与主体的调研分析[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3）52-60.

【责任编辑：余伟】

试论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协商能力建设的价值与途径

——基于政治和谐视角

张韶华, 王伯然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政治协商和协商能力的内涵和构成元素不同,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中地位独特,作用日益凸显。然而,政治协商过程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从各自角度出发努力改正缺点和不足,围绕进一步加强协商能力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明确各自工作重点,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笃行实干,从而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生机盎然,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关键词: 民主党派; 协商能力建设; 价值途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46-06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别于其它民主政治的独有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都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给予了特别关注,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高尚的、文明的民主方式,它坚持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公开,采取的方式是对话、沟通、讨论、辩论。本文基于政治和谐的视角,特别把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等协商主体抽取出来,对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协商能力建设的价值与路径进行探索,以便顺利完成党委决策前、人大通过前、政府执行前及执行贯彻中与民主党派的充分、全面、真诚协商。

一、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国家

大政方针、事务在决策前和执行中的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点,政党间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民主党派作为协商的重要主体,作用不可忽视。

(一) 参政党与执政党政治目标相同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能够就国家大政方针、事务进行广泛而真诚的协商,是因为他们有着能够协商的坚实基础,就是说他们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执行过程中动机和目标一致,都以执政党和国家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为自身的政治纲领。在当前,无论是执政党和参政党都坚决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可以展开充分有效的协商,是由于他们有着共同协商的政治基础。

(二) 民主党派地位的明确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体现在中国共产

收稿日期: 2023-10-25

作者简介: 张韶华(1970.8-),男,汉,河北南皮人,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教授,主研方向: 统战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王伯然(1986.12-),男,汉,河北任丘人,河北艺术职业学院讲师,主研方向: 统战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紧密关系上,概括起来表现为这样几种具体的关系。在党际关系上表现为亲密友党;在政党政治上各民主党派以党为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政权实现上,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在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表现为合作协商;在功能发挥上,表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各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虽然民主党派以党为师,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它们之间不存在隶属、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时各自发挥自身优势,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民主党派则站位高端、视角独特。

(三) 民主党派自身具有极强的协商优势

对各民主党派的建立、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许多共同点,譬如它们建立的历史背景大致相同,这就是大都诞生于战争年代,可以说是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并对当时国民党顽固实行独裁统治、内战政策的彻底绝望中逐步发展、壮大的,各民主党派先后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联合,和共产党有着长期、稳固、成功的合作历史。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架构较为完备,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制度建设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民主党派成员构成上文化素质较高,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民主同盟18.6万成员中,高等教育界人士占25.08%,科学技术界人士占22.14%。九三学社10.4万人中,副高以上职称占56.1%,从事高教、科研、医卫、工程、技术等占社员总数的87.4%。加之在多年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所有这些都积淀成了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独特优势。

(四) 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为民主党派的协商提供了保障

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迈上新台阶的。新中国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进行拨乱反

正,在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同时,又进一步修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章程,重建了政治协商制度。尤其是,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1989年,中共中央对政治协商相关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成为开展政治协商工作的指南。1994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格外增加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2005年2月,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作了科学规范。2022年6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成为新时代政治协商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日趋成熟和完善的。

二、政治协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认识存在偏差,角色定位不准

1. 部分党政干部对多党合作认识不到位。少数干部对统战理论缺乏系统学习,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有的单位还存在对民主党派成员政治上不放心、工作上不支持、生活上不关心的“三不”现象。个别的甚至把民主党派看成异己力量,反对或不支持民主党派成员参与政治协商活动。

2. 少数民主党派成员对自身地位认识不清。对自己在政治协商过程所处的位置、肩上的使命、担任的角色等认识不清楚、不明确,定位不准。同时,对自己的主人翁意识不能有效强化,不能充分认识到“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1]有的党派成员认为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主导的,因此在政治协商中不认真、不负责,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据特别调查显示,当政府某项决议、决策、办法等不完全合理时,有约2.13%的党派成员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往往过多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不愿意发表个人意见、建议。一些党派成员在加入民主党派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加入民主党派的目的一是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二是为将来步入仕途寻找捷径。从目前参加民主党派成员结构变化的趋势看,民营企业家和党政

领导干部的家属、亲属上升比例为前两名。

（二）协商程序、内容不规范，主体作用发挥不足

1. 程序不够规范。近年来，政治协商一直强调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中央一级做得好，个别省、市相对较差。在少数省、市，名义上有协商，领导人有空就协商，想到了就协商，高兴了就协商等等问题不一而足。再有，有些地方的政协规程虽然对可以提议进行协商的人进行了规定，但没有具体可行的做法；协商提议经过多长时间、哪些程序、多少步骤成为正式协商议题没有明文规定；协商议题协商前多长时间，通过何种方式通报给协商团体及个人没有规定；还有对于如何确保协商的顺利进行和富有成效没有具体规定。甚至，什么情况通过表决，什么情况不能通过表决等，都没有明确具体规定。

2. 内容不够具体。在中央一级可以称为“大政方针”、“重要问题”，可是对于省、市一级，就需要有明确规定。以某某省、某某市重要经济问题为例，必须明确具体规定涉及多少人、多少钱、多长时间等才算是重要问题，必须进行协商。再如时间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之前”是一天、一个月还是一年，也要有明确具体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反复强调“要完善制度机制，……对协商的参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规定。”^[4]

3. 误区不同程度存在。在政治协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主导作用，各民主党派的重要参与作用不容忽视。民主党派“通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努力增进相互沟通和理解，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5]民主党派好的具有合理性、可操作性的提案最终都以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建议的形式出现，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在一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中间始终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即民主党派的协商权力是柔和委婉的，具有被动性；党和政府的协商权力是刚性坦直的，极具有主导性。

（三）制度落实问题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1. 民主党派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有关制度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

一是有些制度重形式、轻内容，执行中有随意性问题。二是民主党派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程度还比较有限，运作机制还有不规范的地方，致使个别地方民主党派参与公共决策的协商力度还取决于相应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三是一些有关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文件在程序和内容方面还缺乏具体的刚性规定。

2. 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还有局限

一是知情渠道问题。有些地方民主党派对党委、政府工作情况了解不全面，对重大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了解不及时；个别地方民主党派知情渠道和知情深度取决于党委、政府的作风和行动；有些政府机关的个别部门、单位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以及神秘主义的一些倾向，一些有价值的、有效性的信息，并不是由专门信息机构提供，而是来自于某些民主党派成员工作领域中获取或个人参政议政中的其他渠道。

二是发挥作用平台问题。目前党外干部实职安排有定向性现象，安排到科教文卫方面的多，经济建设方面的少。并且职数配置有限制性情况，往往把配备的最低职数变成最高限制。民主党派干部少，上台阶难度大，民主党派人士实职安排少，交流提拔不够，仅通过为数不多的党外实职干部直接参与决策显得身单力薄，效果不佳。

三是保障力度问题。目前民主党派缺少专职人员，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士都是所在单位骨干，工作繁忙，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深入开展调研，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

四是经费问题。民主党派开展调研工作的经费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对重大课题和中长期课题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一定程度上经费问题仍然是困扰民主党派开展调研工作的一大难题。

（四）高素质参政人才缺乏，协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1. 民主党派缺乏旗帜性的政治领袖。“旗帜性的政治领袖对外代表政党，对内率领全体党员，统一党员的观念和行动。”^[6]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民主党派原来的那种依靠旗帜性人物、依靠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优势存在不

足。同时,社会背景与经历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存在一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加入民主党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既缺少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经历和体会,也缺少加入党派的深思熟虑的思考过程”。^[7]

2. 民主党派人才高端、智力密集的优势受到挑战。“民主党派享有组织上的独立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与自由,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8]“民主党派受地方和部门利益的局限性较少,地位超脱,视角独特,……”。^[9]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共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进,一大批硕士、博士以及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高学历、高智能人才进入党和政府的决策层,从而构成了“专家型官员”队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政府也极为关注政策研究以及决策咨询的每一个环节,使每一环节都建立在反复研究论证的坚实基础之上。民主党派虽然由各领域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成员也大多集中在高等学校、医疗卫生和科研院所,在各级党委不断引进、充实决策高级人才的背景下,民主党派的高端人才、智力密集的优势正逐渐变得并不明显,导致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优势、政治协商优势有趋于下降的趋势,面临着影响政治协商的质量和水平挑战。

3. 民主党派后备人才不足。有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专职干部不能足额配备,班子成员业余化、兼职化现象突出。还存在个别党派干部越级提拔现象,由于缺乏正常的培养环节和锻炼平台,致使他们大段时间不能适应岗位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组织不时上演“提着帽子找人”的闹剧。甚至“个别地市的党派组织仅仅只有一个人——他既是主委又是秘书长,同时还是工作人员,……党派机关缺编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地方缺编比率达到三分之一”^[10]正是由于高素质参政人才匮乏,后备人才不足,民主党派的协商能力无法得到全面提高,整体水平不强。

三、切实加强民主党派协商能力建设的对策

(一) 执政党要切实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提高协商能力

1. 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

(1) 转变观念,树立党外人才也是党的人才的意识。“应当看到,党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仍然有少数人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历史贡献缺乏正确的认识,把民主党派视为异己力量,对加入党派的成员不再提拔使用或调离工作岗位等。”^[11]长期形成的“党内外有别”的观念,在不少领导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这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往往是重党内而轻党外,对党外人才的使用“慎之又慎”,不敢放开手脚。因此,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在人才问题上不能以身份地位划线,也不能以“党”划线。

(2) 放宽胸怀,把党外人才的培养纳入整体规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应将党外人才的培养纳入视野,列入计划,制定好规划,做好选拔、培养、考察、推荐、使用工作,使之由“机遇型”转向“机制型”。对各类人才都要一视同仁地提供服务、统一安排、平等开放,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支持他们创业、创新。

(3) 解放思想,加大党外人才的使用力度。据有关部门调查,2022年,全国333个市地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只有301名党外副市长(副专员);2861个县(市)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只有2481名党外副县长(市)长,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某些领导思想还不够解放,对于党外人才,特别是对民主党派新一代代表人士还存有疑虑甚至偏见。因此,执政党要逐步加大民主党派干部的培养选拔和安排任用力度,重点是做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安排、实职安排;要着力解决一部分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党外干部配备不齐不足问题;要在党外干部正职使用上有所突破。

2. 积极为民主党派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创造条件

一要进一步扩大知情权。进一步拓展民主党派工作和活动的空间,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对重点工程、重要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调研考察检查活动,努力创造知情的条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切实进行政务公开,召开有关会议,要视情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参加,要将有关信息及时发送给各民主党派,给他们的协商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让他们能及时了解政府及部门的行政决策与行政信息。要大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围绕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调研活动,做到热情接待,全力帮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可委托民主党派就某一课题进行调研,并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

二要进一步扩大参与权。要努力拓宽履行职能的渠道,坚持把党外干部的培养遴选纳入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大力加强党外后备干部的培养,通过挂职、下派、轮岗等行之有效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加大使用力度,进一步推进实职安排工作。科学选配更多的党外干部担任人大、政协机关专职领导干部,民主党派机关专职副主委可兼任同级政协副主席。

三要进一步扩大监督权。切实提高党内外对民主监督的认识,创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努力解决党内外存在的“不需监督”和“不敢监督”等错误认识。各民主党派要注意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原委,使监督有理有据,不断提高监督的质量和水平,提高现有民主监督形式的效果。要积极探索民主监督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强与党委、行政、司法、纪检、监察等机关以及新闻媒体的联系,努力在完善配套的监督体系中发挥应有作用。

3. 加强民主党的组织建设,为协商能力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首先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下,适度放宽各民主党派机关一定的选人、进人、用人权限。其次要加强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目前,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普遍存在“倒金字塔”特点,即越往上组织机构越科学、齐整、完备。而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是联系中央、省级和基层广大成员的坚强纽带,工作事无巨细、纷繁庞大。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党的市、区(县级)组织建设,特别是加强其领导班子建设,提高班子成员政治待遇,高配其主委、专职副主委。

(二) 民主党派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1. 要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的讲话中指出:“各民主党派要紧扣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用自身建设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

貌。”“要深化理论研究,认真总结参政党建设经验,把握参政党建设规律。”^[12]民主党派要真正做到从参政党使命担当出发,密切联系相应界别、阶层、群体,增强利益表达,体现代表的广泛性。在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时要克服明哲保身、凡事“拥护”的积弊,敢于、勇于、善于坚持正确意见,摆脱“怕”字困扰,坚持“敢”字当先,做到敢说真话、敢于批评,敢做诤友、敢于监督。努力摆脱“花瓶”和“拉拉队”论的束缚,摒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思想,真诚地辅助、帮助中国共产党执好政、掌好权。

2. 加强参政议政的制度建设

参政议政是参政党的第一职能,“提高参政能力作为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中心环节”。^[13]民主党派各级委员会要建立系统完备的参政议政的工作机制。从调研工作到提案工作再到信息工作等都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网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信息、数据分析、处理的专门机构;要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机制建设,使广大成员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政治站位成为自觉行动;切实加强参政议政人才储备库建设,把参政议政能力作为衡量、选拔、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各地如发生重大社会问题,要在追究党委、政府责任的同时,相应追究同级民主党派组织的责任。

3. 建立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要健全制度体系,及时将实践中好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14]当前,民主党派在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上要进一步强化各种制度建设。一是要着重加强干部培养和选拔任用制度建设。二是要加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制度建设。使党派成员关注的重大问题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制度保障。第二,重点加强对党派代表性人士和骨干的培养、选拔,建立数量充足、遴选余地大的多层次人才库,实行动态管理。第三,真正建立多层次的后备干部梯队,适时调整各级班子的年龄结构,保持合理的年龄梯次,循序渐进,不搞临时突击。第四,选优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中共组织部、统战部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的选人用人推荐意见,选拔任用民主党派成员普遍信服的、

成员和社会广泛认可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党派将协商工作开展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外文出版社,2022:259.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外文出版社,2018:291.
-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3:395.
- [4]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0/c_1125020851.htm,2019-9-20.
- [5] 李贵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03-3-16.
- [6]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1:59.
- [7] 刘延东同志谈2006年的工作思路和几项重点工作[J].中国统一战线,2006(1).
- [8] 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4:270.
-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4:273.
- [10]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注的20个理论问题[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93.
- [11] 郭思源.中国执政党监督体系的传承与创新[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13.
-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外文出版社,2022:267.
- [13] 张献生.多党合作与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J].中国统一战线,2005(4).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外文出版社,2022:267.

【责任编辑:余伟】

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 蕴涵和构筑路径

刘 丽

(佛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摘 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需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 在世界大变局中把握民族主权国家的演变逻辑, 以多种方式巩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时代意义; 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52-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 面向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需要全面推进民族团结,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014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2017 年, 我们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 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 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 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所有工作要向他聚焦。”^[2] 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就要牢牢把握住这个“纲”, 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内涵, 在科学应对世界变局中, 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 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

一、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 要从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寻求答案。浩瀚中国的历史, 是一部由中国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的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应了历史的规律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

收稿日期: 2023-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3ZDA007)

作者简介: 刘丽(1993-), 女, 汉, 广东梅州人, 哲学硕士, 研究方向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哲学, 佛山市社会主义学院(中共佛山市委党校)讲师。

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 历朝历代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建构国家，都不同程度面临民族问题和天下统一的问题。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天下无外”、“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层级政治体系。伴随着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发展，长时间民族间迁徙杂居，相互融合，创生出共同的政治舞台，不断将社会经济联为一体，语言也相互参合，最终形塑出今天的中华文化，形成联系紧密又不失各自特色的共同体，奠定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基本条件。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凝聚意识在中华儿女协力抵御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以中华民族指称中国各民族。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不少仁人志士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和践行。比如李大钊把“中华民族”作为融合中华各民族后的新民族，论述其共同的政治身份，契合民族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孙中山完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放弃“驱除鞑虏”的口号，倡行“五族共和”理念，“华夷之辩”的民族歧视观被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民族融合观所取代。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共产党坚强带领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范畴的民族话语，成为统摄全体中华儿女的标志性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凝聚奠定了强大的历史根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建中华民族，以建立完全独立的、不受国外压迫的民族主权国家实体。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要把全社会被压迫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联合起来，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4]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基本格局。经过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努力，我们实现了最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全部脱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到了坚实的体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十多年来，中华民族56个民族携手共进，胜利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持续向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体关系已经形成。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各民族在事实上已经结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提出并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的根本体现，是富有强大原创性和理论性的新时代中国民族话语。这一话语体系，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共同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大一统，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正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5]。

综观世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都离不开国家的推动和制度的支撑，而国家的追求也不能脱离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提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激发全体国民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同历史情感记忆，共同实践，认同持共同的价值规范和能动的维系意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图强而凝聚力量。

正因此，2019年10月，为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发展需要，在深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6] 这一论断指明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发展方向。

牢固树立国家统一意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是一切民族国家追求的目标。提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追求并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几千年来,国家统一的理念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早已经成为一股无形的凝聚力量和精神纽带。历朝历代,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谋求国家统一,在统一中谋求长治久安。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南北分治或多地分治的局面,但最终都以国家统一为根本结局,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往往也是国家统一而富强之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意识。2021年4月25日至27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时强调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7]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任何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在其国家建构过程中,实现多民族价值观念之间的同一性或共同性建设,推动一体化或同质化的价值体系与制度建设,例如官方语言的确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在价值观念层面整合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最大程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之联结为紧密的整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性质的价值信念,是共同体得以维系下去的重要前提,也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蕴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表达,它不是单指某一个民族的梦想,不是各民族各自梦想的简单叠加,而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的梦想。一盘散沙、缺乏统一的价值认知与共同体建构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的民族复兴的诉求的,而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民族国家之间的彼此博弈和力

量,“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8]这一过程既仰仗内部塑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受到外在环境持续变化的影响。

(一) 把握世界大变局中的民族主权国家逻辑

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意识是资本主义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结果,民主、法治、大工业和福利社会等均是这个历史进程不断演化的产物。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表明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格局由此确立。此后200多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战争与殖民、借助市场经济,在20世纪初叶确立起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国际政治体系。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长期占据着国际舞台的中心,主导着全球格局。“战争制造资本主义”^[9],有数据统计,美国建国240多年的历史,只有16年没打仗。查尔斯·蒂利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中,用欧洲中世纪以来的频繁战争解释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央财政制度的兴起。

21世纪以来,伴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治理问题的弊病日益暴露,过去由欧美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全球性国际政治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安全赤字成为摆在各民族国家之间共同的严峻挑战。

(二) 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蕴涵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8年就做出过前瞻性的论断:“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10]可以说,无论是世界经济体系,还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变革都深刻影响全球发展,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改变着人们原本的价值理念。尤其是以共同体意识去应对全球发展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恐怖主义等全

球性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共同体意识就难以寻求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单一的民族主权建构逻辑和演进历史不同，中国兼具现代民族国家和文明型国家的双重特征，不但具有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公共性质，而且因历史延续性而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即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靠穷兵黩武、不靠对外扩张，靠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是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与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相结合的文明复合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观点指出，“今日中国的主要面貌，包括社会关系和习俗、生活方式、优越感、国家观念和对统一的执着，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近代成为民族国家后的表现。表面上它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11]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还是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深刻地影响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显著变化。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之路，为全球经济繁荣发展、地区和平稳定注入强劲动力。

在2022年3月5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说，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14.4万亿，中国经济一年净增13万亿元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2]面对世界范围内反复延宕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抓住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历史机遇，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和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形成国际合力，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13]为世界变局引领正确的方向，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促进56个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起，凝聚成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创造美好未来，对于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和睦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3月5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我们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四共”共同体理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不可破。^[14]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路径

新时代客观物质条件不断提高，为民族间流动交往、文化频繁接触提供了便利，既深刻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在不断培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的族群文化相互接触的过程，并不必然导向文化间的适应、共同意识的增强。因为，每个民族都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观念，文化认同与共识性的生成既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国家制度主动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及文化同一性建设，创造包容的交往互动条件。

（一）把握“一体多元”的基本格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最为核心的就是要寻找中华民族的共同根系，在风俗制度、日常器用、思想文化上找寻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依据和轨迹，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15]。共同的根系是维系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不曾中断、各民族紧密相拥和谐共处的永恒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文化共性的“一体”与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多元”有机结合的共同体。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区分为“一体”和“多元”两个层次，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16]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又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多元一体”是对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关系特征的表达，它之所以能够被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是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的文化张力。

“多”一方面体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地理的三阶地貌自然地孕育不同民族的独特文

化意识,但在动荡的历史变迁中,人口流动、族际通婚等方式,逐渐形成了相互套嵌的居住格局和血缘交融多元格局。另一方面,体现在展现各民族特质的多样性的文化特征,使用不同的文化符号来表达各自的文化信仰。“一”则表现了各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创生的共有的价值意识。当代中国,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为载体的政治共同体之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聚合起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意识,原因在于其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取向和厚重的历史精髓。鉴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了“一体”和“多元”、共同性和差异性相互依存、相互构建的辩证逻辑,“一体”容纳“多元”,“多元”是“一体”生成发展的基础,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丰富的价值空间,没有民族多样性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表达。“多元”聚为“一体”,“一体”是“多元”的聚合目标,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及其整体的价值取向被统摄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之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交融互生的内在机理。同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我们也能收获引领“天下一家”的理念,启示我们更好地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 夯实物质基础

在“多”与“一”的辩证法中,寻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路径,不能从意识本身自发实现,必须先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减少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推进各民族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经过新时代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解决了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现在我们需要花费更大力气来带领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更为积极地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地处偏远的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乡村振兴国家发展战略,改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加快落后地区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局。通过民族文化交流搭建经济合作平台,形成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效应,引导各民族在“五个认同”中实现经济互惠互利,在经济发

展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保证各族人民在共同体的旗帜下走向共同富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铸牢需要能够共同平等地改善共同体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只有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个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才有坚实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果实能够公平地被各族人民所享有,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局面就越得以强化巩固;反之,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不具有公平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难以培育、铸牢,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难以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三) 夯实精神基础

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民族工作既要有物质力量的推动,精神力量也必不可少。

首先在政治意识领域,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以政党认同推进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昭示我们,没有各民族的普遍支持,我们不可能完成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过去的百年里,中国各民族成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和价值理念的高度认同,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认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得到高度统一。历史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推进民族地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因此构建国家认同需要加强对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完善,坚持以“国家繁荣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社会稳定发展”为核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意识。在平等参与和民主共治中激发各族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同时,也要警惕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与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引导各族人民自觉抵御极端、分裂思想和行径,树立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意识^[18],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在价值观建设方面,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

价值归属,处理好一元主导的中华文化与多元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铸牢,需要有一个价值灵魂来主导塑造,这就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尊重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创造,鼓励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大力推动文化融合,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在大力弘扬革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诠释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呈现激活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记忆,通过红色记忆促进政治认同。

最后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认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9]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0]。

同时,要尊重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创造,鼓励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大力推动文化融合,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干,实现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潮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接和超越,实现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层构筑。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 人民出版社, 2022: 39-40.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外文出版社, 2022: 243, 246.
- [3]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大学学报, 1989(4).

- [4] 宣讲家网 .<http://www.71.cn/2012/0423/613016.shtml> [EB/OL]. 2017-10-10.
-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731539077985873&wfr=spider&for=pc> [EB/OL]. 2023-8-31.
- [6]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9-10-24.
- [7]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 [N]. 人民日报, 2021-08-25.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外文出版社, 2022: 245.
- [9] (法) 布罗代尔, 顾良等译.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45.
- [1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7-26.
- [11] (英) 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 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332.
- [12] 新华网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3/05/c_1128440518.htm [EB/OL]. 2022-3-8.
- [13]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 [N]. 人民日报, 2021-7-6.
- [14] 王希恩. 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N]. 人民日报, 2022-03-28.
- [15]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9-28.
- [16]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大学学报, 1989(4).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 [18] 邹广文.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 [J]. 哲学研究, 2021(11).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外文出版社, 2022: 246.
- [20] 促进各民族象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2-07-16.

【责任编辑：温开照】

制定香港国安法与落实“爱国者治港”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的影响

曹琬茜, 覃辉银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州 515000;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 510641)

摘要: 香港回归祖国已有二十余载, 但国家认同教育一直未能在香港学校全面、有效地开展。再加上长期受到香港反对派歪曲“一国两制”、香港与内地之间关系的歪曲舆论误导, 部分香港青少年至今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未能完全建立起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出台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制度化落实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以及香港教育局对香港教育界乱象开展精准整治、拨乱反正, 并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推进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在香港有效开展, 帮助香港青少年构建起国家认同感。

关键词: 香港国安法; 爱国者治港; 香港青少年; 国家认同; 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58-06

香港回归祖国已有二十余载, “一国两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但仍然有部分香港青少年对“一国两制”存有误解与偏见, 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显得淡漠和脆弱, 对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表现出消极乃至抗拒的态度, 甚至有大批年轻学生参与到“占中运动”“修例风波”等极端的社会运动之中。香港青少年的政治取向之所以发生严重偏差, 其主要症结之一在于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香港教育界“重英轻中”、“重‘两制’轻‘一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而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则存在不积极、不坚定、不到位等重大缺陷, 以致香港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每况愈下, 其国民身份认同难以得到有效构建。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 正式在香港实施, 2021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 香港选举制度据此得以逐步完善、“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制度化落实以来, 香港社会由乱及治, 社会氛围明显好转, 政治生态重回正轨。同时,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全面落实亦推动了香港教育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助力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再出发。

一、香港国安法与“爱国者治港”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再出发保驾护航

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的发生, 把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加强国民教育问题推向了白热化。对此, 中央政府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以及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工作在香港地区全面开展, 同时, 亦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以及

收稿日期: 2024-02-27

作者简介: 曹琬茜(1989-), 汉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研究; 覃辉银(1969-), 土家族,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一) 香港国安法为做好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提供法律支撑

“对于一个疆域明确、主权完整、历史文化传统有相当共识的社会而言,‘国家认同’本不是一个问题”^[1],但对于曾经经历了156年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而言,回归祖国后如何重构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在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百余年中,港英政府一直对香港市民推行典型的殖民教育,即对英国文化、制度、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进行强制输入的“子民教育”以及回避政治、弱化国家意识、淡化民族观念的“疏离教育”,结果令香港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观念、社会文化和本土殖民文化怀有根深蒂固的执念。再加上回归后,香港反对派一连串的政治操弄以及对国民教育的政治化、妖魔化,导致国家认同教育无法在香港社会以及香港青少年群体中正常开展,甚至成为香港青少年当中不可触碰的“禁区”。因此,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能够在香港持续且有序地开展,亟需获得法律的支持。而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的正式实施正是为特区政府在香港地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以及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首先,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设立了四类罪行和相关处罚措施,设立了“驻港国安公署”,为在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屏障,为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在香港开展扫除了障碍。另外,香港国安法亦对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严正提出,“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2],即强调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特区政府应当积极履行指导、监管等作用,并在上述领域当中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同时,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3],即强调特区政府必须在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平台积极主动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此两项规定均为特区政府在香港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依据。

(二)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做好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提供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自2012年本土意识逐渐在香港社会出现,并被香港反对派利用且发展为极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主义”以来,反对政府、反对内地、“恋殖”等极端情绪迅速在香港青年群体当中蔓延,部分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持续下降,对于特区政府推行的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更是持排斥态度。同时,香港反对派通过在香港发动激进社会运动以妖魔化国民教育工作以及部分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上对推动国民教育工作等相关议案进行“拉布”,让合情合理的国家认同教育难以在香港顺利推动。为此,要在香港推动及做好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亟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生态。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4]2021年2月22日,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当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对“爱国者”提出了三大标准以及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相关原则。“爱国者治港”的概念被重新激活并制度化运用起来。随后,为了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立法会以及区议会选举制度相继完善,反中乱港分子被排除在香港的政权架构之外,香港地区治理亦越趋完善,香港政治生态重回正轨,香港社会由乱向治。可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开启了香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同时,亦为推动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生态。

二、制定香港国安法与落实“爱国者治港”背景下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取得的新进展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爱国者治港”的全面落实为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在香港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此背景之下,香港教育界得到全面整

治,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香港教育制度推行系列改革,进一步推进国家认同教育在香港青少年群体当中全方位、全领域开展,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取得的新进展。

(一) 整治: 香港教育界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香港国安法落地后,香港香港特区政府联同香港教育局全面贯彻落实该法律第九条:“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5],对香港教育界种种乱象进行全面整治,杜绝反中乱港势力以违法及暴力行径骑劫香港青少年思想,防止“港独”思潮在校园蔓延。经过一系列整治工作,香港教育界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中包括:

一是,失德及违法教师或辞职或被取消教师资格。过去,在香港教育系统当中存在着部分失德或违反专业操守、甚至是违法的教师,他们在课堂上使用歪曲历史、扭曲事实的“毒教材”,向学生宣扬“港独”思想,散播仇恨言论,美化及煽动暴力,甚至怂恿、带领学生参与违法暴力活动。“根据教育局于2022年6月提供的资料,由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教育局共接获502宗有关教师涉嫌专业失德的个案,当中有344宗与2019年社会动乱相关”^[6]。为全面落实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以及香港教育局高度关注教师失德及违法问题,并通过发遣责信、书面警告以及取消教师资格等措施作出处罚。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于2022年6月在立法会表示:“局方由2019年起至今年4月,已因应教师失德问题取消了27人的注册,并向69人发遣责信及134人发书面警告。”^[7]同时,在2021年7月,香港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发布《加强保障学童的措施:学校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的聘任》的通告,严格监督学校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的聘任情况,确保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符合教学资格及专业操守。自此,香港的教师队伍得到重新整治,教育团队得到全面净化,教学阵地得到有效守护。

二是,教育界最大“毒瘤”——“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正式解散。“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以下简称“教协”)成立于1973年,由香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共同组成,会员人数超过10万,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在香港教育界颇有影响力。但“教协”一直以来被反对派利用和把持,依仗成员人数众多,试图垄断香港教育话语权,甚至大肆操弄政治,宣扬“港独”,并有目的、有组织地为反中乱港恶行推波助澜。如2012年“教协”连同“港独”组织“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并煽动教师与学生罢课;2014年“占中运动”,“教协”多次煽动学生罢课,鼓吹学生参与非法集会,并编制美化“占中运动”的教材;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教协”再次鼓动学生罢课,煽动学生加入暴力冲突,更成立所谓“援助基金”并发起众筹援助“黄丝教师”,可谓恶行累累。“香港之病灶、教育之痛点,‘教协’难辞其咎。”^[8]在香港国安法的重锤出击之下,2021年7月31日,香港教育局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不再视其为教育专业团体。同年,8月10日,“教协”宣布解散。“教协”的解散固然是咎由自取,同时也迎来了香港教育实施刮骨疗毒、建立符合“一国两制”的新教育理念和新教育体制的历史契机。

三是,校园最大的“港独”温床——香港高校学生会得到有效清理。香港学生会是香港高校最大的学生组织,但亦是独立于大学之外的注册社会团体。自“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各大高校的学生会高度关注香港政治议题,亦主动加入至香港社会运动当中,包括极端社会运动,同时,有部分高校的学生会更是沦为了“港独”思潮在校园散播的温床,成为了香港乱局的急先锋。如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10所高校学生会煽动学生开展罢课行动;香港大学学生会在《苹果日报》刊登头版广告,抹黑香港国安法;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在校内举办黑暴展览;2020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干事会当选“内阁”——“朔夜”在参选时发表“港独”言论,抹黑香港国安法等。在香港国安法的立规明矩后,香港高校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学生会问题,并纷纷与学生会进行切割。其中,香港大学宣布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以及它现有在校内的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宣布解散;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停止代学生会收取会费;香港岭南大

学不再承认学生会地位等。香港高校坚守法治防线,与学生划清界限,务求使反中乱港势力与行为绝迹于香港校园。

(二) 改革: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香港教育界乱象得到有力整治后,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9],以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教育领域亦迎来了一系列的改革,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在香港有序开展。涉及国家认同教育工作的相关改革措施如下:

一是,实施通识科教育改革以培养青少年国民身份认同。香港通识科在2009年被列入高中必修课,2012年成为香港高考四大必考科目之一。过去,该课程出现了缺乏统一教材且教材无标准不送审,课程内容泛政治化,教师授课夹带“私货”等现象,以致通识科成为反中乱港势力的“播独”工具。为此,2021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香港通识科教育改革方案,将通识科科目名称更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原来六个单元缩减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继续维持必修必考。为推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要求学生以“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为主题赴内地进行考察,学习时数为10小时,以撰写考察报告代替考试。“新科目课程宗旨明确指出,旨在帮助学生加深了解社会、国家、人文世界和物质环境等复杂内涵,并能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加深对个人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身份的了解和认同。”^[10]通识科的改革不仅清除了一批“毒教材”,扭转过往课程存在大量偏颇政治元素、混淆是非、误导学生的乱象,使通识科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同时,还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国民意识,促使青少年全面且正确地认识国家及国情,准确理解“一国两制”。

二是,调整和制定相关教育方案、课程架构以构建青少年爱国爱港价值观。香港国安法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而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香港人的义务和责任,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需要从中小学开始构建。2021年2月,香港教育局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该课程框架覆盖初中至高中年龄,课程内容包括国家安全的概念及意义、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目的和原则、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与人权、自由、法治的关系等,务求在香港青少年群体当中构建起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同时,香港教育局亦公布了包括常识课、生活与社会科、中国历史科、地理课、经济科等15个科目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推进各学科与国家安全的不同范畴实现有机结合,务求让国家安全教育贯穿于各学科各领域之中。另外,2021年1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出函函,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提出“以中华文化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干,贯通各学科/课程范畴”^[11],“强调应从小加强学生的国家观念,协助学生从小正确认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及传统价值观、尊重国家象征和标志(包括国旗、国徽、国歌)、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建立国民身份认同,明了身为中国人,有共同保护国家、休戚与共的责任”^[12],以构建起香港青少年正确的爱国爱港价值观。

三是,完善教师培训与考核制度以从源头落实国家安全教育。香港教育局于2020年6月发出《落实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的建议》的通告,提出加强对新入职教师以及在职教师进行系统培训。该通告提到新入职教师必须于“首三年内完成30小时的涵盖‘教师专业身份’以及‘教师专业学’核心培训以及不少60小时的选修培训。”而在在职教师须于“每三年周期中,划出不少于30小时参与有关‘教师专业角色、价值观及操守’及‘本地、国家及国际教育议题’两大范畴的专业发展课程/活动,其中,每个范畴最少占6小时。”^[13]同时,香港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通告,明确了由2023至2024学年起聘任的教师,包括所有职级的教师,必须通过有关香港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的测试。教师培训与考核制度的逐渐完善,有利于帮助教师们正确理解宪法、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国家安全等,有利于教师们在课堂上向青少年传递正面的

价值观,帮助青少年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感。

四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以培育青少年的爱国情怀。自香港国安法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对香港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提出新方向新要求以来,香港教育局、香港各大学校以及社会团体均开展了形式丰富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以培育香港青少年的爱国情怀。此类学习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开展:第一是以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文化为主题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如香港教育局开展的“中华经典名句”推广活动;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开展的“青年穿越故宫之旅”以及“庆回归 我爱故宫”主题系列活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举办的“全港青少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等。通过举办一系列回顾中国历史、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厚植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增强香港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第二是以国情认知以及两地青少年互动为主题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如香港教育局举办的“公民科内地考察”活动;香港特区政府联同香港中联办等机构主办的“时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举办的“百万青年看祖国”活动等。通过为香港青少年提供赴内地交流、考察的机会,促进香港青少年对祖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深入了解,从而增强香港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感。

三、推进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在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打出香港国安法与“爱国者治港”的组合拳后,香港社会实现由乱及治,香港教育亦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得以再出发,并初见成效。为了更进一步推进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尽快实现香港青少年的人心回归,笔者提出若干思考:

(一) 完善国家认同教育课程体系,以建立起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国家认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执政党、政府、政策以及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二是基于语言文字、历史传

统、习俗规范等方面的文化认同;三是基于族群的归属感、与同胞的情感联系等方面的族群认同。”^[4]三者缺一不可。因此,为了让香港青少年能够全面了解祖国国情,全方位提升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笔者认为香港地区的国家认同教育课程体系应囊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认同等相关内容,并以不同形式向香港青少年输出,以建立起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同时,结合香港教育的实际情况,有梯度地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国家认同教育课程,实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构建起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认同。

(二) 创新国家认同教育工作载体,以促进国家认同教育工作全方位全领域开展

认同是情感或是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是一种心理状态,国家认同则是对国家产生归属感,自觉将自我归属于这一国家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而国家认同教育工作主要是树立起本国国民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构建起本国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认同。概而言之,国家认同教育工作是一项构建价值观的工作,是一项唤醒认知、构建情感的工作。因此,国家认同教育工作不能仅以单一的书本、课堂作为传播载体,更应不断挖掘符合青少年喜好、便于传播、富有感染力的崭新载体,以增强传播力、渲染力、解释力和引领力。例如以香港红色资源为载体,组织香港青少年参观新界抗日旧址,缅怀抗战先烈,向香港青少年讲述抗战历史故事、香港与内地同胞血浓于水的故事;以博物馆及展览馆为载体,开展各类历史、发展、文化等专题展览,向香港青少年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讲好“一国两制”成功的故事;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举办不同的体验和传承活动,向香港青少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以文体活动为载体,举办香港与内地青少年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等,向香港青少年讲好香港与内地同胞团结齐心、共同奋斗的故事。

(三) 深入挖掘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以打造湾区教育平台实现湾区教育资源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九大城市,每个城市各有历史各有特色,均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等

资源,笔者建议特区政府联同内地政府共同深入挖掘粤港澳大湾区各类资源,并将其进行分类、整合,继而转化为一系列教育资源,形成课程、教材等,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平台。湾区教育平台内的各项资源均能在湾区城市当中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让香港青少年能够从多方面、多维度感受湾区内地城市的历史、文化以及新发展新变化,逐渐打破香港青少年对内地、祖国的错误或陈旧的认知,推动香港青少年主动融入至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与内地青少年以及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 [1] 郭艳,徐博东.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迁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8(1):5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01/content_5523060.htm,2020-07.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01/content_5523060.htm,2020-07.
- [4]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EB/OL],http://big5.locpg.gov.cn/jsdt/2021-04/16/c_1211113328.htm,2021-04.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01/content_5523060.htm,2020-07.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2023年3月24日会议教师专业操守最新背景资料简介(立法会CB(4)189/2023(05)号文件)[EB/OL],<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230324cb4-189-5-c.pdf>,2023-03.
- [7] 大公文汇.失德教师辞职了事?教局:再入职须查惩处纪录[EB/OL],<https://www.tkww.hk/a/202206/08/AP62a027d5e4b0a469026fd1de.html>,2022-06.
- [8] 大公网.人民日报:香港“教协”这颗毒瘤必须铲除[EB/OL],<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text/2021/0731/615449.html>,2021-07.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01/content_5523060.htm,2020-07.
- [10] 环球网.香港通识教育首曝终极改革!港媒:六大单元或改为三个主题,涉及国情教育[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715982316749570&wfr=spider&for=pc>,2021-02.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教育局通函第101/2021号《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EB/OL],<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M/EDBCM21101S.pdf>,2021-11.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教育局通函第101/2021号《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EB/OL],<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M/EDBCM21101S.pdf>,2021-11.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教育局通告第6/2020号落实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的建议[EB/OL],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s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Attachment1_EDBC20006S.pdf,2020-06.
- [14] 曹琬茜.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构建研究——基于政府公共关系的视角[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11-12.

【责任编辑:陈童敏】

“两个大局”视域下海外统战工作的 机遇、挑战与对策

刘雨辰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 “两个大局”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提出的重大战略论断, 为海外统战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海外统战工作面临世界权力之变、规则之变、动能之变和开放之变的战略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大国竞争、地缘冲突、话语弱势以及认同危机的多重风险。统筹和服务“两个大局”, 海外统战工作应坚持习近平海外统战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人心和团结做文章, 发挥自身优势, 抓住战略机遇, 规避战略风险, 推进海外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

关键词: 两个大局; 海外统战; 战略机遇; 不确定风险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64-06

“两个大局”是十九大后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论断, 对新时代我国各项工作都具有极强的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 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 海外统战工作应遵循这一根本要求, 始终做到胸怀“两个大局”, 统筹“两个大局”, 服务“两个大局”,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一、科学判断海外统战工作在“两个大局”中的战略机遇

当前, 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 各种不确定性交织。一方面, 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继续深刻演化并交替影响、彼此共振, 形成了罕见的大国权力结构调整期、科技浪潮领衔更替期和全球发展体系变迁期“三期叠加”态势;^[2] 另一方面, 我

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战略机遇的内涵与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推进海外统战工作提供了积极动力。

从世界层面来看, 尽管大国竞争的矛盾和地缘政治冲突日益突出, 但总体和平的趋势没有变,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 我国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但内涵与条件都发生变化, 这为新时代海外统战的战略机遇注入了新内涵。一是权力格局之变的机遇, 国际权力转移加速, “东升西降”态势已经形成, 时间于我总体有利, 长期大势站在中国一边。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崛起和领导力的认同日益扩大, 在广大亚非拉国家, 海外统战工作出现长期向好的有利态势。二是国际规则之变的机遇, 当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成立的新国际组织涌现, 金砖组织、亚投行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组织话语权正在增大, 打破了美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规则与国际机制垄断, 规则竞争和制度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国际规则与机制变化为海外统战工作团结全球南方

收稿日期: 2024-02-15

基金项目: 2023 年山东省委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两个大局视域下海外统战工作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TZ2023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雨辰(1972-), 男, 山东兰陵人,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外交、海外统战研究。

国家和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良好契机。三是发展动力之变的机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关系的议程、体系与格局。动力之变为海外统战工作提供了技术赋能，有助于提升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和便利性。四是重新开放的机遇。世界新冠疫情总体已受到控制，各国入境管控政策逐渐放松，跨境流动重启开放，有序恢复交流交往，为人员往来和海外统战工作提供了便利。

从国家层面上看，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海外统战工作带来了战略新机遇。首先，党和国家对海外统战在内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3]“三个更加重要”明确了做好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的形势、意义与地位。其次，我综合国力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领导力和贡献认同大幅提升，海外统一战线较以往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拓展工作。再者，中央提出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党的二十大又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包括海外统战在内的各项工作充分发展提供了新蓝图。另外，新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公布实施，统战工作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实行多部门高度统一，构建了大统战格局，业务协同有利于促进海外统战工作能够汇集有效资源。最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受到国际广泛支持，加入国家日益增多，朋友圈不断扩大，截止2023年6月底，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达成近3000多个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4]使各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获得了沿线各国

的高度称赞与信任，为我海外统战工作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数字丝绸之路、文明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与海外统战的理念、精神相契合，成为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

从海外侨胞层面看，海外统战工作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其一，海外华侨华人家国情怀浓厚，对实现国家统一热情高涨，对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存在高度期待，并给予高度支持与配合。其二，在西方国家对华侨华人存在歧视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海外华裔科技人才回流加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广泛更有利的科技与人才支撑。其三，海外侨胞绝大多数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认可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承前启后，因时而宜，引领方向，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抓住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宝贵机遇，对海外统战工作进行积极配合，给予热情支持。

二、深刻认识海外统战工作在“两个大局”中的风险挑战

（一）外部环境层面

一是国际权力转移加快，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动，大国竞争烈度前所未有，海外统战工作面临结构性障碍。百年变局下，大国战略竞争加速演化，国际格局处于过渡转型阶段，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俄乌冲突僵持不下，美西方刻意制造新冷战氛围，炮制反俄制华情绪，对我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和意识形态战，筑起“小院高墙”，大搞“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供应链布局，大国政治出现对立化和阵营化势头，东西方冲突性、对抗性日渐增多，加剧了海外统战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海外统一战线在国外凝聚共识、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的工作更加繁重，我海外统战形势更加严峻。

二是不确定性危机偶发多发突发，侨胞利益维护充满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动荡与灾害交织，危机与冲突频发，国际环境充满不稳定性，对我海外侨胞和企业的利益造成潜在和现实威胁，增加了海外统战工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

测性。同时,分布在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200 多万海外侨胞和 2.5 万多个海外侨团侨社又强烈期待党和国家能够成为坚强后盾,^[5]在危机时刻保护他们免受侵害。海外侨胞利益的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任重道远。

三是美西方“以台制华”,岛内台独势力“挟洋谋独”,反独促统情势愈发严峻。为制衡中国发展,美国及其盟友对台海局势介入力度增大:反华政客打破限制,相继窜访台湾,对台当局释放错误政治信号;国会出台法律文件,利用立法途径为美台勾联提供正当性借口;提升向民进党当局军售规模和质量,企图把台湾打造成“豪猪之岛”,增大我统一难度;以“自由航行”之名,联合盟友派遣军舰军机过航台海,增加与台湾军事部门联合军事演习频次与密度,挑衅我主权和安全;鼓动台湾当局把高科技产业美国化,施压台湾企业对我芯片产业进行打压制裁;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炮制“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错误论调,企图为其干涉台湾张目。同时,台独当局无视主流民意,否定“九二共识”,大搞“去中国化”,“以美谋独”行径甚嚣尘上,敌视大陆善意安排,刻意为两岸和平发展制造人为障碍。另外,海外各类反华分裂组织内外勾联,故意滋事,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日益嚣张,危害不容忽视。新情势下,反独促统任务尤其艰巨,海外统战工作充满挑战。

四是国际话语斗争出现新态势,海外统战话语依然薄弱。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态势没有根本好转,一方面,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引发美西方战略焦虑,它们相继联手炒作疫情、香港、南海、新疆与西藏等问题,干涉我内政,大肆对我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污名化,呈现框架化体系化新特征:不断强化主体力量,拉帮结伙,实行集团化污名;生产过程愈发驾轻就熟,逐渐走向流水线作业;污名化由单一议题逐渐走向复合化;污名化的载体由文化产品升级为互联网平台,手段越发多样;污名化的内容、动机更为复杂、立体和多元。^[6]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挑衅我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丑化中国国际形象,对海外统战发展形成干扰。另一方面,我海外统战话语较为单一生硬,内容资源相对狭窄,缺乏可以抗衡的传播平台,加之话语传播受

到美西方国家政治法律的层层设限,难以向海外受众进行有效生产与传播,“挨骂”问题依然没有有效解决,给海外统战工作的主动开展与积极突围造成困难。

(二) 华侨华人层面

海外侨胞的多重认同对海外统战的认识存在矛盾心理,加速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内部分化,部分人员陷入新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华侨与祖籍国的时空关系被切割,传统文化实践的场域也发生了转换,导致自我归属的认知和意识结构呈现混杂化多元化,陷入新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新一代华人移民受到居住国政治社会法律环境的影响,华社侨团的代际更替过程缺乏对祖籍国的持续性文化认同教育,导致身份认同弱化与分化现象加重。

还要看到,海外侨胞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呈现高烈度、持久性、全面性和意识形态化,使海外统一战线面临严峻挑战与巨大压力。“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海外统战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泛滥,更加恶化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特别是在美国,两党恶斗、政治极化、缺乏包容的整体氛围对广大华侨华人等少数民族群尤其不利,美国政府动辄以国家安全名义对华裔科学家滥用政治审查、忠诚指控现象越来越多,对孔子学院打压限制力度前所未有,广大华侨华人、华社华媒与华资机构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受到一定冲击。

(三) 海外统战工作层面

受主客观因素限制,海外统战工作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不足:由于自身认识能力限制,海外统战工作与“两个大局”的对标缺乏系统规划,前瞻性不足,主动服务与超前服务不到位;受体制机制因素制约,职能部门束缚比较多,放不开手脚,加之海外侨情环境复杂多变,有畏难情绪,工作方法创新力度不够大,怕探索失败造成工作被动的担忧心理较重;经费不足,先进科技运用步伐较为滞后,海外统战的精准服务能力与现有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海外统战话语刚性过强,宣传色彩浓厚,情感话语偏弱,被接受度低,柔性统战话语生产与传播有待丰富拓宽;海外统战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尚不

能满足世情党情侨情形势发展需要，海外统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在路上。

三、扎实推进海外统战工作服务“两个大局”的对策建议

为更好服务“两个大局”，更好应对风险挑战，海外统战部门应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和角色观，抓住主要矛盾与核心任务，主动对标“两个大局”，担当职责使命，扎实做好争取人心与求得团结的工作。

第一，争取人心求得团结，海外统战工作要正确处理三组关系

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7]海外统战部门要坚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追求祖国统一的一致性，考虑到目标人群的多元化和思想理念的多样性，注意工作地域侨情的多样性，避免单一性和强制性，实现个性与共性融合，既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又充分包容各方面力量共同发展，不断壮大国际统一战线力量。

处理好战略机遇与战略风险的关系。抓住与利用机遇是化解风险挑战的最好良药，在应对未知的风险挑战时，提供发展机遇可以更好凝聚海外侨胞的人心。海外统战部门站在时代前沿，把握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国际体系权力转移、世界格局加速转换的战略机遇，把握国家重视海外统战工作、支持海外侨胞回国创业的政策机遇，把握我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应对世界变局、完善全球战略布局的外交机遇，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增长机遇，把握中资企业和人员加大步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发展壮大机遇，保持战略定力，精准识别风险，科学制定对策，以重点侨团侨领为目标，开展各层级公共外交，加强海外友好力量联谊，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谋求化解外部的风险挑战。

处理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关系。要清醒认识到，未来海外统战工作的外部环境将会在美西方的干扰下变得更加复杂艰难。对此，应坚持底线思维，

在外部势力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时，在面对“风高浪急”甚或“惊涛骇浪”时，坚决捍卫国家和广大侨胞利益。坚持极限思维，面对极限压力，必须坚强果敢，敢于迎难而上，在斗争中讲策略讲艺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敢于斗争的同时，还要善于斗争，提升斗争能力与灵活性。海外统战部门充分发挥海外统一战线联系广泛、润物无声的优势，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深入广泛开展人文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话语权，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和平发展形象，不断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致力营造于我有利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二，争取人心求得团结，要增强海外统战工作的五个鲜明特性

增强海外统战工作的政治引领性。坚持以汇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目标，把维护和服务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牢记“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提升政治站位，科学判断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切实增强对海外侨胞的思想引领。积极引领海外反独促统组织，坚决遏制各种分裂活动，推进国家和平统一，促进两岸和平发展。以中华文化学院、孔子学院、各类书院机构为载体，面向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开展中华文化研修，加强港澳同胞国情教育，强化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争取台胞民族认同，促进海外侨胞凝聚侨力。强化民族复兴目标引领，提高风险判断力，落实惠侨执行力，提升精准服务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侨胞爱国凝聚力，形成民族发展合力，着力提升海外侨胞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全面提高海外统战工作成效，为统筹应对“两个大局”做出侨务贡献。

增强海外统战理念的开放性。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海外统战工作理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夯实共同利益基础，鼓励庞大海外华侨华人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借侨之力，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依托侨团，推进“内外联动”，打造利益共同体；借助侨资，推动“两山转化”，

打造价值共同体；挖掘侨情，筑牢“一带一路”，打造发展共同体；发挥侨智，服务“两个大局”，打造行动共同体；借助侨媒，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文明互鉴，扩大团结联系的覆盖面，构建文明共同体。突破观念桎梏，涵养海外侨务资源，加强海外联谊会、欧美同学会、侨商会、“侨梦苑”等各类平台建设和发展，以侨为桥，广泛开展公共外交，加大中外交流密度，以相互交流展现中国开放自信形象、和平发展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

增强海外统战目标的中心性。以服务“两个大局”为中心，海外统战工作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聚焦发挥海外侨胞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才智优势、信息服务优势、社会关系优势和技术合作优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关注海外侨情发展，重视华媒、华社和华青动向，推动华文教育发展，加强侨青联络联谊，鼓励引导回国创业、参政议政和。团结广大侨社侨团，对海外侨团侨社进行类型化管理，给予资源倾斜配置，支持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协助解决其资金与技术困难，重点支持海外反独促统组织发展壮大，激发反独促统热情，抢占舆论主阵地。加大对海外侨胞住在国政治社会环境关注力度，科学评估海外侨务工作的风险点，突出前瞻性、苗头性、警示性和规律性研究；重视维护海外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等正当性权益；^[8]强化国家安全意识，严密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海外侨胞身份回国进行渗透，收集情报信息，危害我国家安全。

增强海外统战能力的韧性。优化海外统战机构职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完善涉侨法律制度体系，加快构建侨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海外统战治理绩效。进一步理顺大统战体制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构建侨务、外交、港澳台、外事与外联跨部门协调沟通机制，完善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侨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五侨”联席会议制度，协同处理涉侨事宜。完善海外统战布局，增设海外侨民服务机构，尝试在有条件的中资企业、机构设立统战工作室，强化统战意识，培训员工统战能力，力争统战全覆盖，更好保护我海外利益。增强海外统战话语生产与传播能力，以事

实、理性、透明为原则，广泛利用国际化社交媒体 tiktok 等平台，破解西方话语垄断，粉碎对我海外统战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企图；扩大中华文化学院数量，增强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促进海外统战话语生产的多样性，避免统战话语传播的僵硬性，推动中华文化和发展叙事走向世界。着力提升海外统战干部的战略决策和执行能力，有针对性地完善经济、文化、社会、法律、政治和外交等层面的知识结构，切实解决“本领恐慌”问题。树立风险防范意识，着力提升海外统战的风险研判能力，完善海外侨胞、留学生救助管理机制，更好提供领事保护，做好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着手准备“去风险化”预案。

增强海外统战手段的创新性。借助海外侨胞力量，以中华文化为内容，制作优秀文化产品，加快数字化转化与在地化传播，向各国阐释中华文明，讲清梦中华文明的内容体系、价值逻辑与世界意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大经费投入，加快技术赋能，提高海外统战手段的先进性，利用我在人工智能、5G、机器学习、大数据等领域的领先优势，推动海外统战数字化工程建设，有条件有步骤建设海外华人华侨人才数据库和侨团数据库，实施精准识别，促进才智回流，为海外统战工作提供便利性、精准性服务。借鉴他国移民管理经验，探索试行华裔卡或者华侨身份证制度，推进海外侨胞管理制度创新，便利人才流动。在涉侨服务上，推广“互联网+X”集成系统，构建跨部门协同工作模式，实现一网通办，提高办事效能，同时有序建设金融和技术“蓄水池”，实施暖侨工程，帮助侨胞解决困难，更好凝聚侨心，争取更大认同。

第三，争取人心求得团结，要坚持“三个导向”，推动海外统战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海外统战工作新格局

海外统战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多变。为适应世情、党情、国情和侨情变化，海外统战部门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探索构建海外统战发展的“五全模式”：即构建“全政府支持、全系统落实、全过程引导、全要素优化、全社会参与”新格局。“全政府支持”就是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对海外华侨华人都要关心、爱护和团结，主动把部

门工作与海外统战目标相结合,资源配置上重点倾斜,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大统战”的新格局。“全系统落实”就是海外统战系统包括侨务、侨联、侨团、侨社等各相关机构切实发挥主体责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把中央提出的海外统战任务完成好,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全过程引导”就是海外统战工作要注重过程管理,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归国过程的指导管理,在突发危机时,能够发挥“危机前预警、危机中保护、危机后保障”的角色作用,使服务不缺位,实现无缝衔接。“全要素优化”就是海外统战部门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对海外华侨华人联络联系的常态化,特别是在中国主要节庆、重要会议时要满足海外华侨华人信息需求、情感需求、地位需求、心理需求和荣誉需求等多重合理关照。

“全社会参与”就是指需要采取激励措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积极加入海外大统战体系,把争取人心求得团结的工作与中资机构、海外侨胞的流动相联结,企业走到哪里,统战就做到哪里;侨胞流向哪里,统战就做到哪里。总之,要努力扎根海外,经营关系网络,保持联系顺畅,发挥群策群力,形成协同共治的良性局面,逐步实现海外统战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结语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全局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前所未有地交织互动。海外统战工作与“两个大局”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为了争取人心,最大限度团结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海外统战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海外统战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发展和安全为主线,以服务“两个大局”为中心,“在置身变局中谋划全局,在立足全局中应对变局,在超越变局中赢得全局”,^[9]正确站位,强化担当,

改进管理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工作能力,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海外统战的开放性、韧性与创新性,着力防范化解重大政治安全风险,致力构建海外统战新格局,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海外统战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7.
- [2] 王文.论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源起、现状与未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38(04):33-42.
- [3]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OL].新华网,(2022-07-30)[2023-06-21].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7/30/c_1128877616.htm.
- [4] 邹多为.开拓共创未来的机遇之路[N/OL].新华网,(2023-10-12)[2023-10-17].http://www.news.cn/2023-10/12/c_1129913229.htm.
- [5] 纪丽娟.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达2.5万多个[N].人民政协报,2016-05-18(003).
- [6] 龚静阳.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06):129-146.
- [7]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001).
- [8] 巫秋玉.“大统战”格局下的海外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统战工作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73(04):51-55.
- [9] 王岩.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辩证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21,504(04):35-41.

【责任编辑:余伟】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叶慧坚

(金华市社会主义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民主与团结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是覆盖全部权力、全部党派、全部民族、全部层级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环环相扣、有序运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方位地提升了民主的品质, 是自觉的民主、为公的民主、做事的民主、负责的民主。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制度; 实践; 优势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70-06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了战略部署。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人民民主,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这是内在本质。这个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 就是全过程的民主, 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1], 凸显一个全面性。本文从制度、实践、品质等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并通过与西方民主的比较, 来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一、全覆盖的民主制度体系

在中国, 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下构建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这是一个全覆盖的制度体系, 重点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 制度规定层面: 三项“统一”立规

第一个层面是制度规定的层面, 可以概括为三项“统一”立规, 是对于制度的性质、范围和原则

的三项规定, 分别是人民民主专政、爱国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 分别对应三项“统一”。

1. 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国家的国体, 是国家根本性质的规定, 也是中国民主制度根本性质的规定。人民民主专政, 保障最广大人民实行民主, 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实现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说, 我们的专政也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 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民主性。我们的专政力量, 军队、警察等等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 坚决有力地捍卫人民民主、维护人民利益。对比西式民主,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家的民选政府被各种“颜色革命”或军事政变所推翻, 这就是缺乏有效的专政力量保护的不完整的虚弱的民主。而且在西方国家中, 其专政力量是缺乏人民性的, 自己本身就成为利益集团, 自然倾向于为资本服务来换取利益。

2. 爱国统一战线: 民主与团结的统一

爱国统一战线, 是中国的民主最大范围的规定, 并且实现民主与团结的统一。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收稿日期: 2024-02-29

作者简介: 叶慧坚 (1980-), 男, 浙江兰溪人, 金华市社会主义学院都市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具体来说，这个最大范围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中国的民主一定是要促进最大范围的团结的，要把所有的这些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拧成一股绳，把来自不同民族、宗教、群体等等的人们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一条强大的统一战线。只有促成团结的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利益、实现民主初心，也才是真实的民主。需要强调的是，民主并不是必然促进团结的，在西方的民主运作下，明显能看到相反的情况，党派纷争、族群撕裂、甚至性别矛盾都在加剧。

3. 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看，集中是民主的必要环节，民主必须是有集中的民主，才是完整的民主。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民主越广泛，越要有效地集中智慧和力量，以形成强大的办事能力，最终是办成大事为人民。中国能够凭借举国体制以极高的效率和质量建成各种超级工程、超大项目，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彰显。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民主和集中并不是天然统一的，西方民主就缺乏这种统一，并因此严重削弱其办事能力。比如美国至今建不起一公里真正的高铁，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二）制度实体的层面：四项制度立本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实体的层面，可概括为四项制度立本，即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和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分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且实现四个“全覆盖”。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覆盖全部权力的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政体，是政权组织形式。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的是覆盖全部权力的民主，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意味着在我们国家，人民主权是统一的、完整的。具体来说是，人民选出人民代表大会，

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这些机关对都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明确无疑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个权力结构是上下高低明确的，是理顺的，是统一的。

相比来说，西方民主虽然也强调主权在民，但它的人民主权实际上是被分割、被“掺沙”的，而不是统一、完整的。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结构中，总统和国会都是选民分别选出来的，说不清楚谁比谁更高，实际运行中经常谁也不服谁，互相掣肘、互相打架是常态，人民意志、人民主权实际上被分裂。还有，西方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普遍是任期终身制的，正常程序下谁也撤不了他们的职，实际上也就脱离了人民的监督，不对人民负责。这就是人民主权被掺了沙子。

2. 新型政党制度：覆盖全部党派的民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既不是一党专政，也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在野党。所以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新型政党制度实现的是覆盖全部党派的民主。在国家政权的运转中，共产党始终执掌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参加国家政权，所有党派都是同时“在线”的，没有被排除在外的。全部党派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同心圆、一条统一战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施政。这就是民主的全面性。

作为对比，西方政党制度是个轮转结构，胜选者上台执政，成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其他败选者就成为在野党，失去参加政权、参与国是的机会。西方的党派轮流执政，也可以理解为任何时间都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党派在台上，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在施政，其他群体的利益就被忽视，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片面性。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覆盖全部民族的民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和政策层面

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的是覆盖全部民族的民主。在中国,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且这种平等体现在生存和发展权的实质平等上,而不仅仅是所谓的机会平等。我们强调小康、富裕一个都不能少,包括每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比如一些少数民族人数非常少、甚至不到一万人,但并不因为人数少、票数少而被冷落,而是在党和政府的无条件帮助下实现整体脱贫奔小康。

作为对比,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少数民族能否享有民主只是一个机会问题,而不是必然的。一些少数民族因为人数少、声音小,就会在“政治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被冷落遗忘,失去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比如丹麦政府曾对格陵兰土著妇女暗中实施过大量的绝育手术,影响到近一半的育龄妇女,实质是种族灭绝行为。

4.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覆盖全部层级的民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的是覆盖全部层级的民主,即中国的民主是“顶天立地”的,上到中央,下到基层,不但国家大事要讲民主,邻里小事也要讲民主。基层治理中,我们努力的方向是,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的事群众定,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从线下“恳谈会”到线上“议事群”等等,体现治理的民主柔性。简单一句话说就是,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就商量着解决了。有商有量就是一种柔性。

作为对比,西方的基层治理,往往对居民进行刚性管制。比如美国的业委会事实上具有行政权,它们发布的社区公约书动辄数百页,草坪怎么修剪、窗帘什么颜色等等都有规定,违者轻则警告罚款,重则没收房产,因此酿成种种悲剧。这种基层治理,名义上是法治,实际上是法网密布、动辄得咎。

二、全链条的民主实践环节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

完整的参与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有序运行,贯穿民主实践的全过程,凸显了中国民主的全过程优势,可以称为“民主五环”。

(一) 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就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民主选举是首要环节,这是解决权力从哪里来,权力交给谁的问题。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的选举是真实的,不受金钱操控。因为一旦金钱操控选举,选举就会成为利益交易,通过选举获得的权力就会成为当选者及其所代表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中国,金钱操控选举、贿选是非法的,是要严厉打击、零容忍的,确保权为民所用。比如辽宁贿选案,有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有955人受查处。而在西方民主中,金钱操控选举则是必要的、合法的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资本能够有效地掌控权力。比如美国的大选就是金钱的较量,大选的花费从2000年的41亿美元,飙升到2020年的140亿美元。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看,中国的选举只是民主的开始,因为更关键的是接下来,当选的人民公仆还要为人民履职办事。中国的民主就是围绕为民办事展开的,而办事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要办成好事,就要善始善终,要有一个全过程的把握,相应的要有全过程的民主。但在西方民主中,选举往往被宣称为民主的大功告成,因为,西方民主的重在于利益集团通过民主的形式获得权力,获得权力后,他们就希望民主到此为止,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这个阶段当然不想再讲民主了。

(二) 民主协商

民主协商,就是人民在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同时,在重大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其真谛凸显于协商民主,这是中国民主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我们的全过

程人民民主是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选举民主重在授权和认证的程序，体现程序民主，而协商民主重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体现实质民主。这就是体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

中国的民主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投票表决往往是高票通过的，比如全国人大以 2879 票赞成、2 票反对、5 票弃权的票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投票表决之前已经有充分民主协商，表决主要就是对协商所达成的共识的合法化程序确认。这就是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统一。

作为对比，在西方民主中，由于缺乏充分的民主协商，很多表决往往是以微弱多数票强行通过。如美国众议院以 220:204 票决通过大麻合法化法案，以 224:206 票决通过性少数群体平权法案，都是有将近一半的反对票。这使将近一半人的意愿被违背，显然也是欠缺民主的。

（三）民主决策

决策就是作决定、出政策。民主的决策，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我们的民主决策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系统，包括决策启动、决策研究制定、决策草案公示、决策最终确定、决策后评估等步骤。每一步骤都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整个决策就能体现民主性、科学性。比如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六场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又在党内外多方面征求意见，特别是还开展了网上征求意见。这是民主决策的典型范例。

作为对比，西方的决策越来越失去民主性。比如去年美国最高法院的 9 位大法官以 5:4 的投票、1 票之差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反映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斗，其代价是美国一亿多妇女的堕胎权不再受到宪法保护。这样的决策当然完全没有民主性可言。

（四）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是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民主管理是一个很全面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参加选举、协商、决策、监督。之所以还要单谈民主管理，是突出中国的民主追求全过程、全覆盖、无遗漏，因为

民主管理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还有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民主管理。从办事的角度看，前面的环节重点是谈人民公仆为人民群众办事，这里讲的则侧重人民群众自己为自己办事。

比如在城乡社区民主管理方面，我们有越来越多成功的实践和探索。很多农村设立民主法治议事厅，村民通过在此议事，参与到村中事务的民主管理，解决了很多以前不容易解决的事情，包括基础设施的修建、邻里纠纷的化解。而且社会组织也参与进来，比如律师协会组织律师参与到一村一律师工作中去，为村里提供法律服务，也支持基层民主管理能力的提升。

作为对比，西方这方面的民主管理是很成问题的。还是从律师的角度看，美国有 130 万多律师，占人口的比例是中国的近 10 倍，行业收入是中国的 100 多倍。这就过度了，表明美国老百姓遇事情很难通过民主管理而自主解决，而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聘请大量律师帮忙打官司，由法官来作主。

（五）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以有效的监督保证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防止权力被滥用。前面的环节主要讲如何让权力被用好，这个环节主要讲如何防止权力被用坏，实现一个闭环。为此，中国构建起一套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监督体系，对权力的监督逐步延伸到每个领域、每个角落。

围绕公权力的行使就有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努力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督。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融合起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比如“江西工职院食品安全事件”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江西省成立了由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彻查。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这都说明，民主监督是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而且体制内外的监督是互动的，是形成强大合力的。

而在西方民主中，权力不是被监督，而首先是被资本所收买，为资本而滥用。比如美国俄亥俄州火车出轨导致氯乙烯泄露燃爆，造成巨大危害，但是肇事公司不停工，职能部门不作为，无人担责、受罚。这件事背后的故事则是，肇事公司即诺福克

南方公司常年花巨资游说政府部门、捐款国会议员，推动铁路安全监管不断放松。所以这是一种制度化、合法化的权力收买和滥用。可以说，西方民主并不是要解决权力滥用问题，而是必然要造成权力的滥用。

三、全方位的民主品质提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全方位地提升了民主的品质，与西方民主比较起来，亦更为显著。这里再从理论层面来对前述内容作一点总结和提炼，同样以中西对比的方式进行阐述。

（一）自觉的民主对比迷失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是自觉的民主。如果把民主比作一艘大船的话，中国的民主是由具有高度政治自觉的中国共产党领航掌舵的。这使整个民主制度运行和实践过程都保持对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追求，初心宗旨始终坚定，航线航向永不迷失。

西方的民主是迷失的民主。西方民主的大船，没有先进政党的领航掌舵，幻想构建一套完美的民主制度，各种政治力量在其中各逐其私、互相制衡，以为这样就能自动达到理想民主状态。而实际上，西方由此陷入制度迷信而丢弃了自觉追求，导致民主航程随波自流，民主航向日益迷失。

（二）为公的民主对比为私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是为公的民主。在中国，国家权力是人民公有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为一个整体，国家权力统一地属于整体的人民，为人民服务，即以国家力量来追求人民的整体利益。我们明确禁止权力与资本勾连，严防资本染指权力。

西方民主则是为私的民主。在它那里，国家权力实际上是资本私有的。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国家权力也被轮流用来为不同利益集团、为资本谋私利，本质上是国家权力的轮流私有制。权力制衡也实为权力的分食。

（三）做事的民主对比“作秀”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是做事的民主。在中国，民主最终落脚于为人民办好事、办成事。为了办成好事，就需要全过程的集思广益，全过程的齐心合力。同时

也要强调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强调政策延续性、稳定性，最终以造福人民来践行民主。

西方则是“作秀”的民主。西方的民主主要不是为了办事，而主要是作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的途径，以“作秀”赢取选票则是政客获取权力的最佳捷径。于是我们看到西方竞选日益变成了竞演，使民主看似特别声势浩大，实则是以民主幻象蒙蔽百姓，取其名而弃其实。

（四）负责的民主对比推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是负责的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既是统一的执政和参政团队，也是统一的负责主体，不能也不会推卸责任。所以，党和政府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对人民负责到底。这就是全过程负责，相应的有全过程监督。

西方则是推责的民主。政党轮流执政、权力多方分立，实际上往往没有一个真正的负责主体，党派之间、任期之间、机构之间、上下之间都可以互相甩锅卸责，人民则被来回踢皮球。名义上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可以毫不负责，甚至仗着“民选”的光环任意妄为。无人负责，也就无从监督。

总的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主体看，是最广大的人民；从客体看，人民拥有的是完整统一的国家权力，是广泛全面的民主权利；从过程看，人民全过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环节、各方面；从效果看，是增进了人民福祉，推动了国家发展；从比较看，它比西方民主更有优势。因此它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汇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248.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7.
- [3] 常雪梅.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统战“心语” [EB/OL].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people.cn/article/27033211>.

【责任编辑：陈童敏】

人民政协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制度安排

张海霞, 张 山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要: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但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织和民主形式, 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人民特色及全程特色, 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展现出独特优势,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在现代中国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 人民政协; 中国政治制度; 伟大创造; 高质量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75-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1]。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其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75 年实践证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政协发挥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重要作用, 构建了广泛参与、平等协商、民主决策和监督的民主政治机制,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指导下确立的人民政协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性、人民性、时代性

(一) 人民政协制度的民主性: 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人民民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 这为人民政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政治理论是在批判欧洲资产阶级民主, 指导世界工人运动和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形成的。他们深刻揭示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 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概念, 论证了无产阶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 在使用无产阶级民主概念的同时, 还使用了“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 2024-02-29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与人民政协研究”(GD23WTB0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重大项目“深化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研究”(GD23ZD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海霞(1987-), 女, 副高级职称,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政协理论; 张山(1969-), 男, 汉族, 广东阳江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政协理论。

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自己政党领导下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并且这种民主制度的成熟定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会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要探索各种形式。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人民的意志是民主的内容、民主的普遍、民主的本质,人民意志的表达和实现方式则是民主的形式、民主的特殊、民主本质的体现^[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4]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人民政协就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5]。75年前,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理论观点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紧密相结合,科学地创造了人民政协制度。在这一制度设计中,人民政协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团结广泛的力量实现民主的广泛性;坚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发挥制度优势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使人民当家作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坚持了发展协商民主使人民民主的形式更加多样。在人民政协制度的作用下,中国的民主政治得到很好发展,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有力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在中国扎下了深根、盛开了繁花、结出了硕果。

（二）人民政协制度的人民性：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观

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为人民政协牢固树立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民主特色提供了坚定的立场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8]，“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9]。而要实现人民当作主,要让人民“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0]。因此,人民是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人,发展普遍性的民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普遍原理,在人民政协制度的设计中作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特色安排:设立34个界别,团结凝聚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人民的代表性更加广泛;明确了政治协商职能,反映最广泛真实的民意,人民的利益诉求得到真实反映;开展民主监督,人民民主权利有保障等。实践中,人民政协彰显了人民政协的人民性。既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人民急难愁盼的民生大事广泛协商议政,又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全链条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彰显了人民政协鲜明的政治特色、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特色、坚持协商民主发展全过程民主的人民民主特色。

（三）人民政协制度的时代性：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民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奴隶主、封建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享有的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劳动者、工人和小农”并且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些彻底民主的理想和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3]。就此而言,

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民主形式,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人民政协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是民主形式的创新发展。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机制,人民政协承载着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使命。历经75年,人民政协坚守大团结、大联合初心,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发展贡献力量。通过推进协商民主、实施调查研究、汇聚社会共识和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人民政协丰富了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营造了优质民主政治环境。如今,人民政协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中落地生根,有力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真正当家作主。

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指导下人民政协展现了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一) 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凸显了政治合作性。人民政协作为多党派共商国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展现了协商性与合作性的广泛与平等,为各党派、各族各界表达意志和利益提供了有效途径。体现在:一是执政党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商国家大政方针,体现中国政党之间和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二是国家政权机关与各界协商国家重大问题,彰显政府与人民的政治合作关系;三是人民统一战线内部协调各种关系并处理问题,集中体现人民内部的政治合作。

展现了党派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中国的各党派特征是十分明确的,即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发挥参政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关系。人民政协作为落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推动各政党实现多党

合作。

展现了协商主体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政协的中坚力量,分布在社会各领域,与各界群众紧密相连,反映了人民政协协商主体的广泛性。设立34个界别,二千七百多名代表着各党派、各阶层、各族各界以及各社会团体,协商主体代表性明显。

体现了监督的权威性。尽管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监督形式,由于其独特的组成结构——包括不同党派、民族、阶层和人民团体,且政协委员多为各界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专业界别的委员多为本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使得其监督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专业水准,能够引起被监督者的高度重视,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仍具有权威性。

(二) 人民政协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实现民主的“智囊团”。人民政协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政治协商等形式,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多元的视角、专业的方向、前瞻的视野,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使得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人民政协实质上成为执政党民主决策的“智囊团”。

运行权力的“监督员”。人民政协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力量,能够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建议等方式,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情况监督,不仅有助于发现和纠正决策执行中的问题,推动决策的优化和完善,以保证决策真正为国谋利、为民造福。还能够增强党委和政府的透明度,形成监督约束力,预防公权力过度运行,提升公众对政治生活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发扬民主的“场所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组织各界代表在人民政协这个专门机构有序参与政治协商、协商议政,发挥着重要“场所地”的作用。在人民政协,有宽松和谐交流环境,有各方表达意见、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有平等交流、民主协商增进共识,展现着社会主义民主魅力与优势。

反映民意的“渠道管”。人民政协作为联系和沟通的组织,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核心纽带和“渠道管”。通过这一渠道,党委和政府可获取真实情况

和倾听不同声音,全面、准确地掌握决策信息。人民政协还能及时反馈利益诉求、困难及问题,推动党委和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保障各方权益和人民利益。

维护稳定的“稳压器”。人民政协作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能够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协调利益关系,引导社会情绪,化解矛盾冲突,消除发展障碍,增强推动力,形成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保障人民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

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推进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

(一) 固守圆心,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政治上同心同德。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固守圆心,就是要坚守政治立场,确保人民政协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要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拥护“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这不仅是对人民政协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全体政协委员的庄重承诺。

思想上同心同向。人民政协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坚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思想引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行动上同心同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民主监督,推动党和政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 聚焦中心任务,强化协商议政

落点以“准”,聚焦大局“不偏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聚焦民众关切,实施深入调研、科学建言、精准监督。深刻理解党的大政方针,做好“精准”执行、解读和宣传,凝聚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的思想共识,帮助化解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问题,使党的决策主张有力地贯彻落地,助推实现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共二十大的决策部署,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务实建议。

调研以“深”,协商议政“有理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14]。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深入调研对政协履职至关重要。政协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调研,为协商议政提供支持。增强调研的针对性,结合热点,了解真实情况,提供详实资料。提高调研实效性,深入剖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加强调研规范性建设,建立工作制度,确保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跟踪问“效”,成果转化“见成效”。政协工作要将协商议政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和服务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效果。人民政协要注重成果转化应用,确保成果落地生根,为国家和党的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要建立健全成果转化和信息共享机制,明确责任主体、转化流程和时间节点,做好与政府部门加强沟通联系。要加大跟踪问效力度,定期了解成果转化进展,及时解决问题。要强化社会监督作用,通过媒体宣传、公开通报等方式公开落实情况,鼓励各界人士参与监督,共同推动协商议政成果落地生效。

(三) 加强团结联谊,凝聚共识力量化解矛盾

渠道“畅通”聚民心。畅通委员联系群众渠道, 强化与群众的联系, 理解人民需求, 实现个体影响整体的效应。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 尊重其地位, 激发履职热情。要提供展示平台, 营造和谐氛围, 增强合力。要注重政协文化建设, 通过文化活动和理论研究, 增强委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推动政协文化创新发展, 激发履职热情和创造力。

服务“细实”暖人心。人民政协源于人民、服务人民, 秉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宗旨。时刻关注群众利益, 从群众角度出发, 将群众期望转化为工作清单, 确保工作贴近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帮扶机制。注重服务质量和实效, 建立考核机制, 确保工作围绕群众需求和利益展开。

交友“共情”筑同心。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团结各族各界人士, 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注重情感交流, 通过委员交往互动, 增进理解、建立互信, 形成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创新交友方式, 结合政协工作, 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友网络, 提升委员能力。发挥委员积极作用, 为联谊交友搭建平台、创造机会, 让各界人士感受到政协的温暖和关爱。

(四) 加强自身建设, 夯实履职基础

建强队伍强根基。必须加强人才培养, 壮大履职尽责的人才支撑“不放松”。政协委员与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双轨并进。一方面, 政协委员要按“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标准, 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 强化选拔、培训和管理, 努力构建“政治、业务、作风”三过硬的委员队伍。另一方面, 打造一支忠诚、廉洁、有为的政协干部队伍。通过培训、调研、交流等方式, 全面提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

优化机制强保障。完善内部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效能。要建立管理机制, 明确职责, 形成高效协同格局。加强信息化建设, 提升政协工作智能化水平, 提高效率。注重制度建设, 完善政协工作规章, 确保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建设品牌树形象。强化品牌建设, 以增强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树立人民政协民主政治好形象。强化宣传工作, 通过媒体和公开通报等途径展示政协工作成果和亮点, 以提升公众对政协的认知和认可。加强委员形象建设, 塑造委员良好形象,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挖掘政协文化内涵和价值, 推动文化创新, 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政协品牌。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 构建人民政协与民主政治理论体系, 为人民政协发展提供深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大部署 [J]. 中国政协, 2019, (18): 17-23.
- [2] 列宁. 列宁选集; 第2卷 [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82.
-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21-07-01)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01/content_5621847.htm.
- [4] 习近平: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14-09-21)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21/content_2753772.htm.
- [5][6][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6, 283, 275.
- [7]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3.
- [8][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4, 15.
- [10] 陈曙光. 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5): 10.
- [12][13] 列宁. 列宁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74, 290.
- [14] 习近平谈政协: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EB/OL] (2019-03-03)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rdjj/2019-03/03/c_1124186482.htm.

【责任编辑: 余伟】

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问题研究

——以凝聚共识为中心

刘大鹏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积极推进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既能彰显市县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和作用,又能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作出贡献。推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以凝聚共识为目的,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支撑,进一步探索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的创新路径。首先,以“共建”为前提,凝聚起协商主体相互支持的共识;其次,以“共治”为方向,凝聚起协商主体各尽所长的共识;最后,以“共享”为目标,凝聚起协商主体成果共享的共识。

关键词:市县政协协商;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共建共治共享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80-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利益调整、思想多元、矛盾凸显、诉求增强等问题长期存在于基层、困扰于基层。在此背景下,推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凝聚起协商主体之间相互支持、各尽所长、成果共享的共识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以“共建”为前提,凝聚起协商主体相互支持的共识

“共建”既是前提也是基础。就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而言,“共建”体现为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之间的相互支持。其一,基层协商需要市县政协协商必要的指导,市县政协协商可

以为基层协商提供更为成熟的制度和丰富的经验;其二,市县政协协商也有向基层下沉的需要,即基层协商可以为市县政协协商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和丰富的议题;其三,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可以在有效衔接中形成相互支持、相互贯通的实践优势。

(一)市县政协协商为基层协商提供更为成熟的制度和丰富的经验

首先,市县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组织,其在长期履职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协商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有着广阔的协商平台、成熟的协商机制、浓厚的协商氛围,具有经验丰富等优势。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既可以彰显市县政协协商的制度优势,还可以把市县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进一步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其次,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有利于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提升基层协商的质量,使基层政协更好地协助市县政协,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利于提高群众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

收稿日期: 2024-02-29

基金项目: 广东省档案局科研项目“新时代高校档案馆室文化育人实践路径研究”和广东省教育科研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大鹏(1978-),男,河北高碑店人,广东财经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高校行政管理、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

力、培育群众的协商精神，激发群众对“管好自己的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基层协商为市县政协协商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和丰富的议题

首先，新时代基层社区担当着“一线”使命、彰显出“一线”作为。相比于政协协商，基层社区离人民群众更近，处于国家治理的第一线和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的第一线。推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利于市县政协准确把握基层的突出问题，及时将基层群众中具有代表性、突发性的问题向上反馈，畅通参政议政渠道、拓展建言献策内容，促进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管理，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其次，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载体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例如：建立委员联络小组，组织联络小组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协商调研，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智慧、集中发力，重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真实反映群众的诉求和期盼。通过有效衔接载体的搭建推动市县政协更好协助基层治理，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服务国家大局和中心工作。

（三）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的实践优势

首先，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两大重要渠道，均需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理念和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社区中搭建完善协商平台和铺设畅通协商渠道，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实现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提升，更高效推进基层治理，体现出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的实践优势。其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制度优势，在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中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不仅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能的时代之问，更是一个具有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未来之问。积极推进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既能彰显市县政协专门协商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又能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作出贡献。

二、以“共治”为方向，凝聚起协商主体各发所长的共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变，需要一种多元参与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共治”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决策、共同负责，以达到共同的目标。在这种模式下，各个主体应该凝聚起协商主体各发所长的共识，以实现共同的利益。就协商而言，“共治”体现为不同协商主体间基于明确分工的协商合作治理方式。就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而言，“共治”体现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行动和过程，可以发挥不同协商主体在多层次协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以“共治”为方向，推动市县政协和基层协商的上下联动、内外互嵌，打通上下级协商的体制壁垒，实现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形成一个上下联动、内外互嵌的多层面、多维度复合过程，有效发挥不同协商主体在多层次协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可达到“1+1>2”的效果。

（一）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上下联动式”衔接

市县政协应当在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相衔接中主动发挥作用。基层协商相较于政协协商发展较为滞后，普遍存在协商意识弱、协商平台少、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市县政协相较于乡镇街道和乡村社区，在组织推动协商方面，既具有专事协商的制度优势，又具有联络各方面、同基层组织和基层群众联系密切的优势，这些优势决定了市县政协在推进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衔接、参与基层治理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对于应当主动发挥作用的市县政协来说，搭平台、建机制、凝共识应当是其在推动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衔接中的主要方法。

首先，通过“搭平台”打通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区隔，使得上下协商在虚拟空间中形成互动，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发，将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智慧和力量汇聚一堂。其次，通过“建机制”实现社会难题共商共解，一方面，针对上下

级协商主体均发现的涉及普遍性的问题,及时沉淀为提案线索和社情民意线索,从而成为提案工作、社情民意工作和专题性协商议政会议的源头活水,实现共性问题共同解决;另一方面,针对基层协商中发现的难点难题无力解决的,可以通过协商机制上升到市县政协协商,借助市县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实现个案难题的专题解决。最后,通过“凝共识”实现全局性谋划,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凝聚共识是市县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主动衔接的工作主旨,越是在基层,党政工作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同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越密切,越需要各方面共同商量,也就越需要做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增进团结的工作。

市县政协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定位是作为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这决定了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相衔接的工作主旨是双向发力,实现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之间的有机融合,形成社会治理的工作闭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优势和作用。通过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上下联动式”衔接,能够让市县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近政协,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寓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凝聚共识于基层协商之中,有效拓展政协履职空间,提高政协协商质量,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往深里走、往实处做。

(二) 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内外互嵌式”衔接

政协作为专门协商组织,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作为专门协商组织,人民政协不仅要搞好本渠道的协商活动,而且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努力深化关于协商民主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更深入更全面地加强与协商民主体系各个渠道的衔接配合,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内外互嵌式”衔接,共同完成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任务。实现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内外互嵌,必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要求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议事协商全过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参与协商,引导群众围绕党委、政府关心

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出谋划策,在协商中广纳民智、凝聚共识、科学决策。

建立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第一组长,政协主席担任组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等担任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政协副主席分片包干,充分体现了政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工作要求,同时领导小组可以把各其他相关协商主体,比如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人大代表、社区村(居)委等纳入为小组成员,实现各行各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与政协机关共同实现协商“共治”。又如,把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纳入党建工作考核,赋予工作以强劲的动力,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纳入党委工作的总体部署,成为党委政府工作的一个环节,党委政府对委员议事纪要签批落实意见,督促相关部门落实,从而有效解决了协商与决策的衔接,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开展。

通过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内外互嵌式”衔接,能够极大地凝聚协商主体各发所长的共识,能够调动各协商主体在党委的领导下,凝聚成为具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共同目标追求的政治共同体,切实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具体贯穿落实到加强教育引导、开展凝识活动、推进团结合作等各个方面。

(三) 推动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左右协同式”衔接

左右协同指组织内部同一层级的不同部门或团队之间的协作关系,强调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这种协同关系旨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就政协工作而言,左右协同就是不同区域同一级别的市县政协、同一区域内部的各个基层协商主体或同一协商主体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左右协同。通过左右协同的方式建立联动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可以实现市县政协和基层协商机构的协同发展,提高协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建立政协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资源共享机制,着力补强工作支撑短板。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

协商工作开门就是群众、出门就是基层，最大的优势是熟悉具体情况，最大的短板是缺乏宏观视野和专业支撑。通过政协协商主体的左右协同，能够加强工作对接、加强学习交流，建立一个政协“资源仓库”“人才智库”，实现政协协商资源的统筹使用。深化履职共推机制，着力汇聚服务大局合力，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要紧扣党政中心大局，“一盘棋”推进履职工作，就不同协商主体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实现“问题共议”“问题共答”，放大合力攻坚、优势叠加效应。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是政协工作的基本力量，左右协同要求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之间增强合作共事能力，针对各类问题，面对不同意见，善于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实现政协协商个体力量的协同汇聚。

三、以“共享”为目标，凝聚起协商主体成果共享的共识

共享是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要求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实现“共享”是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共同目标。只有凝聚共识才能让各方协商主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道路上携手共进。在社会有机体中，各方协商主体凝聚共识既是推动协商成果高质量落地转化、惠及人民的必要前提，又是促进协商主体充分吸收协商过程成果的必然要求，还是实现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良性双向互动的题中之义。

（一）促成协商落地转化，实现成果广泛共享

锚定“共享”目标，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中凝聚协商主体共享成果的共识，就是要用好“三张清单”、做好“三大转化”，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惠及人民、造福百姓。

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市县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既不是问题下放的挡箭牌，也不是矛盾上交的通行证，而是彼此间的搭把手、借个力、帮个场。各方协商主体要凝聚好协商成果落地共识，持续关注协商成果落实情况，用好成果落实的“三张清单”，让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三张清单”，

一是协商建议清单，让商量好的事情板上钉钉、落子无悔；二是责任落实清单，让商量好的事情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三是结果反馈清单，让商量好的事情有迹可循、臻于至善。

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推广具有普遍价值的宝贵经验是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全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的崭新实践是碰撞出民主协商新经验、新理念和新做法的活力源泉。各方协商主体要凝聚好协商成果转化意识，推进协商成果的“三大转化”，让普适性经验造福更多人民群众。“三大转化”，一是将协商成果中代表性强、参考性强的案例转化为专项调查报告，以供其他协商主体学习借鉴；二是将协商成果中事关人民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转化为相关提案议案，以供党和政府参考研究；三是将协商成果中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意见建议转化为社情民意信息，以供人民政协协商议事。

（二）突出主体有效衔接，实现成果多层共享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自领域中具有独有的协商优势。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中凝聚协商主体共享成果的共识，就是要让各方主体在衔接成果共享中吸收好养分经验，明确好自身定位，发挥好自身优势。

界别联系是政协协商的鲜明特色，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解决基层问题的强大助力。政协界别专业优势的充分发挥是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中的一大协商成果。在市县政协与基层的有效衔接中，促进政协各参加单位、党政有关部门、界别和委员等资源的科学梳理和全面整合，推动市县政协协商体系更加科学化、务实化、现代化，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在市县政协与基层的有效衔接中，发挥好政协委员应有作用，健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在基层协商中展现委员担当，服务基层群众。

深入群众是基层协商的独特优势，是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支持协商讨论的重要渠道。基层深入群众优势的充分发挥是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中的又一协商成果。在基层与市县政协的有效

衔接中,促使基层优化协商主体结构和协商工作流程,让基层协商充分体现平等协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开展有效沟通。基层协商中发现的更广泛普遍的共性问题,可以通过与市县政协的有效衔接将社情民意及时准确地上报给党和政府。

(三) 推动机制良性互动,实现成果长效共享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中凝聚协商主体共享成果的共识,就必须将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转化为协商治理体系和协商治理能力,延长成果共享保鲜期。

高效的协商治理体系,是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在机制层面上良性互动的成果。用制度体系固定实践成果,是党在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形成协商治理体系是实现成果长效共享的必然要求。市县政协和基层组织都要承担起共建立体协商治理体系的责任。在协商实践中,既要做到上下贯通,确立上下级协商主体之间的指导反馈细则;又要做到左右融通,确立平级协商主体之间的协同分工细则;还要做到内外联通,确立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通互助细则。

出色的协商治理能力,是市县政协与基层组织的衔接在效能层面上良性互动的成果。出色的协商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协商治理体系的效能;提高协商治理能力也是实现成果长效共享的必然要求。市县政协委员在参与到基层协商的实践过程中提升建言献策水平、提案质量和社情民意信息价值,增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本领。基层工作人员在与市县政协的对接中提升说理说服水平、情绪疏导能力和领域专业水准,增强增信释疑、矛盾化解和凝聚共识本领。在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中,锻炼出一支水平高超、本领过硬的协商工作队伍。

四、结语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是促进协商民

主全面发展的必要举措。以凝聚共识为有效衔接的目的既是人民政协在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的主动担当,也是基层组织提升自身协商效能的前提要求。

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托,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必须凝聚“三大共识”。一是必须凝聚协商主体相互支持共识,使协商主体在有效衔接中协同共建;二是必须凝聚协商主体各尽所长共识,使协商主体在有效衔接中融汇共治;三是必须凝聚协商主体成果共享共识,使协商主体在有效衔接中互促共享。在凝聚共识的引领下,走出一条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高效能社会治理相互促进的协商民主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6.
- [2] 叶本乾,桂智鹏.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研究[J].党政研究,2023(05).
- [3] 何永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衔接的法治路径[J].学术界,2022(12).
- [4] 赵秀玲.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新动向及其瞻望[J].求是学刊,2022,49(04).
- [5] 姜延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逻辑必然和实践旨趣[J].学术探索,2021(11).
- [6] 钱牧.政协协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专门性、示范性和引领性[J].社会主义研究,2022(03).
- [7] 王芳.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21(03).
- [8] 黄小军,吴莹.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实践创新[N].光明日报,2021-05-08.
- [9] 张国畅.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探索研究[EB/OL].<https://www.rmzxb.com.cn/c/2021-09-22/2957625.shtml>.
- [10] 谈火生.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N].人民政协报,2022-11-09.

【责任编辑:秦院院】

“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挑战与对策

王小萍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多边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之路，也是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之道。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在提升凝聚力、缩小文化差异、塑造国家形象、繁荣世界文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促进作用。针对一些误解、误读、误宣等，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文化强国，彰显中华文化感召力；要适应国际需求，精选传播内容，增强中华文化吸引力；要注重文化差异，消除误解偏见，提升中华文化融合力；要借鉴推广经验，优化传播途径，扩大中华文化辐射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4)02-0085-06

2023 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10 年前的 2013 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同沿线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繁荣，共创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1]在报告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可见，要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因此，探寻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古丝绸之路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9 月、10 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

国家时，先后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同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强调，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于 2014 年通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于 2015 年发布，“一带一路”建设随之紧锣密鼓地展开。2016 年 11 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 年 10 月，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一带一路”耕耘将近十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推动，于 2016 年、2018 年、2021 年先后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方向。“一带一路”是世界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理念变为实践，从蓝图变为现实，惠及全世界，造福全人类，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与沿线国的合作共识持续增强，合作共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扩大，已扩容至 1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朋友圈越来越大；人文交流与合作

收稿日期：2023-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职业院校教指委课题“粤港澳大湾区营商语言景观的多模态翻译研究”(WYJZW-2021-2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小萍（1964-），女，湖南永州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应用语言学。

持续增强,建立了 10 余个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品牌;货物贸易额不断扩大,截至 2022 年 8 月底,货物贸易额累计约 12 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一直紧密结合,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引、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作为一带一路的动源与引擎,文化势必要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支点作用。^[2]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3]然而,“一带一路”跨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涵盖 55 种官方语言,融合华夏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大洋洲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是国际化、多语、多元文化语境。这种跨语言、跨文化语境往往凸显各种文化差异、文化碰撞、文化保护主义等。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4]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中华文化不断得到认同,这种认同形成强大的助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前行。

二、“一带一路”助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主要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一带一路”,旨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世界共同繁荣,是造福全球的“发展带”、惠及世界的“幸福路”,经过近十年的共商共建共享,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建构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重要实践平台,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第二,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发展的内在力量。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与文化内在机制的发

展和创新息息相关,^[5]在“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和跨文化交往中,内在机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沿线国的认同,这种认同必将形成民众乃至中华民族团结、内聚、向心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的不断增强,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聚集更广的国际力量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共同创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携手实现共同繁荣。第三,有助于缩小文化差异。虽然“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和地区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和特点,但中华文化开放、务实、兼容、多元,不断推动其走向“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6]通过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易于不断缩小或消除文化差异,形成包容多样、互鉴共荣、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体。第四,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7]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纷纷将其作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和深层动力。^[8]中华文化能否获得世界的认同,直接影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塑造,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大国形象的重塑,进而不断形成亲和力、辐射力和融合力,反过来又助推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普遍认同感和接受度。最后,有利于繁荣世界文化。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9]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能够促使国际社会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更好地感知当代中国,能够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三、“一带一路”助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崇尚“和”“合”、

兼容并包、创新传承、历久弥新，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尊重认同，乃至学习借鉴。但也一直受到少数国家别有用心之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污蔑攻击、诋毁抵制，特别是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这种“反认同”倾向不时死灰复燃甚至博取眼球，蒙骗世人，值得警惕。为此，助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主要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中华“大一统”文化被误解。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质和独特性是主张“大一统”，这是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是历代统治者的“天命所归”，是普通百姓的民心所向。这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和亲团结、疆域拓展巩固、分久必合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取向。“大一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特性紧密相关。在古代非和平年代，这种文化必然而合理地促进了我国疆域的巩固。然而，境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政客，诋毁“大一统”文化，炮制“中国威胁论”，并以其作为对付中国的舆论工具。在近几年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大格局下，这种错误误解构和歪曲宣传，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产生不少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谬误传导叠加，使一些原本不甚了解中华文化的年轻人，产生一些误解。

第二，中华商业文化被误宣。悠久的商业文化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存在和出现多个“盛世”朝代的血脉经络与经济动因。尽管中国古代总体上重农轻商，但也有不少朝代的商业繁荣，比如，唐朝、宋代的商业活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等。中国商业文化非常明显的品质是“和气生财”，独特的现象是重人际关系，这与西方社会重信用守合同有较大区别。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少地方的商人走出国门，形成多个“商帮”，如潮汕商人、广府商人、客家商人、苏州商人、温州商人、泉州商人，等等。其共同的商业文化特质就是，吃苦耐劳、爱拼取赢、利义并举，敢于出海经商、异国创业，善于制作物美价廉的商品，等等。这样的商业文化，有利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满足异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本来值得大力推崇，值得借鉴学

习，但个别“一带一路”国家，因为领土争议问题，故意诋毁中国商业文化，杜撰中国商人蚕食本地厂商的生意，煽动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发起抵制中国商品的行动，等等。

第三，中国宗教文化被误导。宗教是精神信仰，也是人际交往的精神纽带，还是商业合作的桥梁。中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五大宗教，宗教文化厚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既有多样性又有包容性，既有本土属性，又有外来特色，形成了中外结合的多元一体结构。中国各宗教间和谐相处，没有发生西方宗教史上那种长期残酷的宗教战争。由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只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宗教，这与“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的全民信教不同。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国家及怀有偏见的人士，总是拿中国宗教信仰说事，不仅攻击中国宗教信仰不自由，而且企图利用宗教挑起我国各民族间的冲突分裂，妄图“西化”、“分化”中国。在对待宗教极端势力的处置态度上持双重标准，对“一带一路”重要支点——新疆、西藏的宗教信仰说三道四，颠倒黑白。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宗教特别是利用基督教和天主教对华进行渗透，妄图使中国“福音化”，甚至鼓吹只有信仰基督教才是兄弟。当然，也应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不少国家，特别是东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东欧等，对我国宗教文化没有明显的“反认同”倾向。

第四，中华政治文化被误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既充满智慧和谋略，又存在腐朽和糟粕。当时的政治文化与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宗法家族式社会结构、儒家学说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权力结构和阶层结构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凸显超稳定性和封闭性、民本思想与修身内省意识、家长观念和皇权至上等政治价值导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也具有双重意义。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还存在着官本位思想、官场潜规则、等级制度森严、官场腐败等消极落后因素，这些顽症和颓废广受诟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动行政体制和公务员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重塑当代中国政治

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开展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虎拍蝇”,正风肃纪,大大改善了政治生态,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更加清朗,更加透明公正。这些做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同,不少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借鉴。然而,国际反华势力一直抓住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文化中消极落后的一面不放,从政治文化角度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企图推销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将中国政治文化渲染得一无是处。近年来,他们又以腐败案例为素材,胡编乱造,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误导国际社会。与此同时,这些人却对西方社会借民主之名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使这些国家深陷灾难的事实于不顾,对这种“侵略性政治文化”集体失语,并显示出一种天然的默许和认同。因此,如何看待这种选择性认同,需要正义的人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伸张正义。

四、“一带一路”助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文化强国,彰显文化感召力。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但是面对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霸权以及“西强我弱”的不平衡现状,中华文化难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发挥其应有的感召力。因此,改变不平衡现状,加强文化顶层设计,构建文化强国刻不容缓。文化顶层设计是在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就是从国家层面上就文化发展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和战略性设计,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化。^[10]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成文化强国作为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随着文化顶层设计、文化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华文化的自身魅力得到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率得到稳步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得到不断增强,这些是构成中华文化感召力的动力源泉,成为中华文化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强有力支撑。

其次,适应国际需求,精选传播内容,增强文化吸引力。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推动其远播世界,应针对国际文化需求,在精选传播内容上坚持以下原则。一要坚持差别化原则,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选择中华文化展开交流和传播。比如,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中欧、东欧等不同国家,应根据其国民对中华文化不同兴趣点来挑选文化内容,有的可以侧重商业文化,有的可以侧重宗教文化,有的可以侧重体育文化和古典艺术等。二要坚持精细化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区分开来,把中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区分开来,把中国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区分开来,把精华与糟粕区分开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文化与十八大以前的政治文化区分开来,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反映中华文化的本来面貌。三要坚持分众化原则。要注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阅读习惯、文化需求等,对不同年龄段民众在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情况进行调查,再根据媒体受众分布情况,挑选中华文化的不同内容,并以其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中华文化中的正能量,消除误解,增加理解,推进其认同。

再次,注重文化差异,消除误解偏见,提升文化融合力。“一带一路”沿线沿岸不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诞生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的发祥地,也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聚集地。不同的语言符号、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往往导致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大、文化碰撞多,在经济、文化交往和合作中,各种偏见、误解、误读、误导、误判难以避免。因此,增强中华文化的融合力,一是通过跨文化活动和培训等,普及多元文化知识,阐释异质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差异意识,强化对文化差异的感知和敏感性,树立求同存异、多元共存、和谐交融的文化差异观。二是对于因文化碰撞造成的误解和误读,要通过主动介绍或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文化信息等及时化解;对于因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误判或矛盾,要通过官方的文化宣传和交流等不断消除。三是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

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1] 四是通过文化走出去、引进来、发展文化产业等进行多元文化的广泛深入合作和交流，发挥中华文化的主导作用，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提升中华文化的融合力。

最后，借鉴推广经验，优化传播途径，扩大文化辐射力。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中国多年处于“文化逆差”状态，西方文化长期雄霸全球文化市场，究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采用的文化推广手段。因此，扩大中华文化辐射力，一方面要向世界各国学习文化借鉴和文化推广经验，以受众为本，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提供集需求性、多样性、个性化于一体的文化大餐。另一方面，优化文化传播途径。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报纸、图书、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向“一带一路”受众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与商贸活动相结合，传递商品中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信息。通过举办文化周、文化年、文化节，等等，全面、真实地呈现既古老又现代、既灿烂又多彩的中华文化，使国际受众在亲眼目睹、真切感受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文化中心、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等，积极把握语言文化传播的主动权，大力推广汉语教学和学习，不断促进汉语在全球的逐渐普及。通过这些途径，中华文化将对当今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对世界各国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亲和力，乃至在全人类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2]

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凸显。面对新困境、新挑战、新机遇，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2] 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播力，努力提升沿线沿途各国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以满足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赢需求。

参考文献：

- [1][12]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8,9,29,41,56,57.
- [2] 郑士鹏. 一带一路建设中外文化交流机制的构建 [J]. 学术交流, 2015(12):113.
- [3] 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9.
- [4] 习近平.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515/c1002-29274975.html>.
- [5] 田旭明. 文化强国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升华——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视角下的分析 [J]. 理论导刊, 2012(4):77.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4,16.
- [7] 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N]. 人民日报，2014-01-01.
- [8] 李国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J]. 思想理论研究理论，2014(10):40.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
- [10] 王一木. 中国文化顶层设计的基本内涵和路径选择 [J]. 江西社会科学，2012(2):187.
- [12] 肖永明，张天杰.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视域中的对外文化传播 [J]. 现代传播，2010(5):7.

【责任编辑：温开照】

“道”之所向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

雷东亚

(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 “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人类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指向历代中国人所向往的大同社会, 马克思主义之道追求的是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 两者相结合必然构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本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马克思主义之道、两者双向奔赴且互相成就、“道”之所向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阐述“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必然性、有机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结合; “道”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090-06

文化之道在于以文化人, 而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是立足中国这片土地, 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中国之问的过程, 也是传承中国精神、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的过程。

一、中华文化之道 —— 一种文明的特征与使命

一个民族的文化由这个民族的人民在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 同时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繁衍和发展。文化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变迁而演进, 它由人创造, 又反过来去化人, 循环往复, 不断发展, 这就是文化之道。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产生了各种思想文化, 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也是

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和核心理念

一种文化基因之所以影响深远, 跟这种文化的根本特征分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 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鲜明品格, 造就了影响深远的开放包容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结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征, 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

收稿日期: 2024-01-02

作者简介: 雷东亚 (1989-), 女, 河南周口人, 法学硕士, 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

神；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2]。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包容性品格也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能够扎根中国奠定了必要的“基因”基础。

许倬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里面提到：“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与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的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3]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天人合一，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高度契合。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4]。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和应有之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

然而，传统的未必完全适用于现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7]。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要完成使命，就必须与时俱进，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二、马克思主义之道——一种方法论的诞生与继承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继承者们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代表

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是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及清政府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深度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8]。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但是它却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一种先进理论。作为当时众多“主义”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经诞生就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务实的态度，促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十分之谨慎。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真正改变国人命运的理论。彼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件可以真正转化成战斗力的思想武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十分鲜明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科学性更是为其实践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被物质力量所摧毁。然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0]。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掌握，并不断地使之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智慧的光芒，同时也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共产党人用这些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建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奔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优秀继承者。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峥嵘岁月中，实现了三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其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要义，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拜人民群众为师”、“为人民服务”等经典语句^[11]，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中深刻的民本理念。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党内不少人对苏俄模式照搬照抄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在于农村、在于农民，从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这是建立在实际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中国化延伸。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探索。这段时期为了适应实践要求，逐渐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在面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发展思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延续了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譬如管子提出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经济发展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同时也蕴含着中国古代“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人才选拔培养理念。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其核心仍是以人为本。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积极回应时代之问，切实解决人民之需，总结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在世界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的今天，面对人类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12]。这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也是习近平天下观的核心表达，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眼光、自觉的辩证思维和广博的天下情怀，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论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习近平同志身体力行，带领中国共产党遵循天道，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胸怀天下，关心整体人类的利益和发展，自然可以“得道者多助”^[13]。

三、双向奔赴——相互契合才能互相成就

综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基因的契合性和价值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与中华传统文化所讲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所讲的都是探寻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从而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需求，不断传承、丰富和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14]。

革命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5]革命文化在国家和民族存亡关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引导作用，也正在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吸收国内外文化的有益成果，反映人民群众的时代需求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应对时代变化，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提炼而出，同时又很好地指导社会实践的优秀文化。由于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际成果。

（二）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片东方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自身的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及根本的人民立场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能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创新实践，在证明马克思主义行的同时，更加印证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扎根中国大地的一种创新实践，是一个过程，需要持续推进。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更加契合现代中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好破解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课题的关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民族复兴过程中诸多阻力，我们需要向古老的中华文明要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亦需要向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之根脉要营养。同时，要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和纽带，比其它任何一种力量都更适合承担这样的使命和任务。

（三）双向奔赴进而互相成就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实际，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源泉，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自身。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其诞生的初衷不是为了创造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坚决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教条化，当作现成的公式去任意套用，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为了保持活力，马克思主义这颗种子播撒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就需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尤其是这其中的精华部分。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对其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沉淀了精华，也粘带着糟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帮助其实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赶上时代步伐。

四、道之所向 —— 驶向大同社会和理想生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和马克思主义之道皆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即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一种更加理想的美好生活状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指向历代中国人最理想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6]历代中国人所向往的大同社会是一种理想和谐的社会状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体现了中国人以“天下体系”描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秩序想象与“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观。其起源于荀子所谓的“群体合作”，是民胞物与的天下大同；是康有为所展望的“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和”的思想和大同社会的理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

治国理政的内政外交之中。“和平、和睦、和谐、和合”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文化智慧。和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殷殷期望，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关切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17]立足现代社会，习近平同志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建设和而不同、和美与共的人类理想社会，也即是历代中国人所向往的大同社会。

（二）马克思主义之道关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即在于其发现并遵守这一规律。从这个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有道统的。而道是相通的。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这其中单个的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解决的是不同的时代问题，但其核心要义一脉相承。而这一“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

董振华在《问道马克思》中提出：“任何一个政治理论体系都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是其价值，也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这决定着其本质和灵魂；另一个是其逻辑，也就是它如何论证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决定着其特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它的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价值和逻辑共同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党人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18]马克思主义之道指向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19]。

（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第二个结合”道之所向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20]道无色无味，不可感触，却揭示着人类社会运行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主义只是一

种空想；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而科学论证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时候，中国古代先哲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也就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结合、相互成就，必将造就一个新的有机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契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立足中国大地，必将成就中华现代文明。中华现代文明将是一种更符合“大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大道”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自由发展的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守望相助、和美与共的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R]. 新华社, 2023(6).
- [3]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精神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7]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R]. 新华社, 2023(6).
- [8] 见魏源《海国图志》，意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用以抵抗其侵略。
- [9]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12]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3] 见先秦《孟子》, 表达施行“仁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14] 李冉, 刘翔宇. 建设文化强国[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2.
- [1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6] 见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 表达的是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状态.
-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8] 董振华. 问道马克思[M]. 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1.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0] 见老子《道德经》, 对“道”的一种描述, 意指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永不停息, 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

【责任编辑: 秦院院】

三山国王文化的渊源与流播研究

林腾华

(揭阳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揭阳 522031)

摘要:“三山国王”是粤东民众及其海外华侨的共同信仰,其信仰历经不同朝代的官方认可甚至推动,影响播及广东、福建、广西和港澳地区,明清时期随着粤东移民的足迹迁播至台湾和东南亚一带。20 世纪以来,三山国王崇拜已被台湾信众视为两岸同根同源的象征,成为东南亚华侨族群文化认同的标志。当前,对三山国王文化的渊源与流播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三山国王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其文化统战作用尔足珍贵。

关键词:潮汕地区;三山国王文化;渊源;流播;统战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6(2024)02-0096-06

“三山国王”是粤东民众及其海外华侨的共同信仰。从三山国王崇拜的发生及其流播区域来看,它最初起源于潮汕地区,盛于潮汕地区,并逐渐扩展到周邻的客家地区。据元朝翰林编修官刘希孟撰写的《潮州路明祝^①三山国王庙记》(简称《明祝庙记》)所载,三山国王“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受封于宋”^[1],迄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位于广东揭西河婆的三山祖庙,是海内外 6000 多座三山国王庙的鼻祖,是世界各地三山国王庙的“根”,其信众遍布海内外。近年来,台湾和东南亚信众到三山祖庙朝拜的热情很高,批次和人数逐年增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寻根谒祖活动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和祖籍认同属性。三山国王文化不仅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是广东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统战文化资源。从文化统战的角度加强三山国王文化研究,对于促进海内外同胞大融合,乃至推进大陆与台湾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意义重大。本文拟围绕三山国王文化的渊源与流播进行研究。

一、三山国王文化的渊源

(一) 关于三山祖庙

三山祖庙位于广东省揭西县城河婆镇西约 2 公

里的玉峰山(俗称大庙山)下,又名“三山国王庙”、“霖田祖庙”,当地人惯称“大庙”。三山,是指距揭西县城河婆东面 10 公里的巾山(现称金山,海拔 627 米)、城南 3 公里的明山(现称银山,海拔 483 米)、城北 15 公里的独山(海拔 789 米)。三山祖庙是粤东地区最古老的神庙,它既是全世界所有三山国王庙的始祖庙,也是三山国王文化的发祥地。

三山祖庙,隋唐时的庙宇无可查考。相传宋代善士刘崇德、刘崇盛、刘崇义兄弟三人,修建祖庙于玉峰东麓之下,即在今庙之右偏后处,规模较小,坐西向东,背靠玉峰。根据《明祝庙记》所载,三山神“受命于天,分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庙食于此地”^[2]。

到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河婆枫宸乡(现河婆镇溪东管区)人、福建古田知县刘昆兰告老还乡,捐施巨资,对三山祖庙作较大规模的重建、扩建。除了把庙宇扩大为三开间三进深的规模外,还把庙址向山下偏南移动一点,方向则改为坐北向南,庙门正对明山主峰。此庙延至 20 世纪 50 年代在风雨中坍塌,历经 270 多年。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为弘扬中华文化,保存地方名胜古迹,发展旅游事业和促进海内外同

胞的联系,揭西县着手进行修复三山祖庙。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投入资金300多万元,按清代的格局和规模重建,千年古庙得以重光。2007年6月,“三山国王祖庙祭典”被广东省政府批准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正在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 关于三山国王的由来

三山国王历史悠久,其渊源出自“三山神”说。据《明祝庙记》,记载:

“潮州路^②三山之神之祀,历代不忒。盖以有功于国、宏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休。

潮于汉为揭阳郡,后以郡名而名邑焉。邑之西,百里有独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乱石激湍。东潮西惠,以一石为界。渡水为明山,西接于梅州,州以为镇。越二十里为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其英灵之所钟,不生异人,则为明神,理固有之。

世传当隋时,失其甲子,于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于巾山之石穴。自称昆季,受命于天,分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庙食于此地。有古枫树,降神之日,上生莲花,绀碧色,大者盈尺,咸以为异。乡民陈姓者,昼见三人乘马而来,招己为从,忽不见。未几,陈遂与神俱化。众尤异之,乃周爰咨谋,即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枫,后有石穴,昭其异也。水旱疾疫,有祷必应。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陈为将军,赫声灌灵日以著。人遂共尊为化王,以为界石之神”^[3]。

这三段庙记首先载述了“三山”距离明朝揭阳县治所在地榕城的方位、距离和自然环境,指出其地名为“霖田”,接着记述了“三山神”肇迹的年代和日期,即民间传说隋朝某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三位神人从巾山的石穴里飘逸而出,自称是兄弟,受命于天,分别镇守这三座山,显灵于玉峰山的界石,在这个地方建庙,接受民众的奉祀。另据《揭阳县志》记载:“明祝庙在霖田都,祀巾明独三山之神。隋时三神出现,有祷必应,因立祠。”可见,三山国王的肇迹是以“三山神”出现的。

《明祝庙记》又载:“宋艺祖开基,刘鋹拒命,王师南讨。潮守侍监王某赴愬于神,天果雷电以风,鋹兵败北,南海以平。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

观金甲神人,挥戈驰马突阵,师遂大捷,刘继元以降。凯旋之夕,见于城上云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诏封明山为清化威德报国王,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独山为惠威弘应丰国王。赐庙额曰‘明祝’,敕本部增广庙宇,岁时合祭。明道中,复加封‘广灵’二字。则神大有功于国也,尚矣!”^[4]

这段庙记表明由于“三山神”屡屡扶宋护国,“神大有功于国”而被宋太宗诏封:“明山为清化威德报国王,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独山为惠威弘应丰国王。”从此,“三山神”由于受封而统称“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庙又称“明祝庙”。至宋仁宗明道年间,复加封“广灵”二字。至此,“三山国王”经皇封,提升为国家神。

二、三山国王信仰的影响和流播

(一) 三山国王信仰在国内的影响和流播

1. 三山国王信仰对潮汕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潮汕三山国王信仰起源于“三山神”崇拜,它以“护国庇民”、“国泰民安”为要旨,其助唐扶宋、“水旱疾疫,有祷必应”等传奇事迹和灵显效应在潮汕民众中广为传颂。三山国王已成为潮汕民间最普遍崇祀的神祇。旧时若亲人逝世,子孙要挂孝进庙向王爷烧香禀告,以注销户口(死人须禀告后才能扛上山埋葬)。现在潮汕民众仍保留每月初一、十五进庙烧香的习俗。家有添丁、结婚、寿诞,也都到王爷庙祭拜。新船下海,也捧香灰入船供拜。做生意谋发展常会到国王庙许愿祈求保佑。特别要强调的是,潮汕春节期间的“三山国王游神活动”,已成为增添节日喜庆气氛和传承潮汕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载体。从三山国王信仰对潮汕地区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崇拜形式上看,主要表现为广大信众逢年过节都要到遍布各村的三山国王庙去祭祀,春节期间积极参加游神活动等习俗,还有自愿捐资修(或建)神庙、捐添油钱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三山国王的崇敬之情。总之,三山国王崇拜已深深融入潮汕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2. 三山国王信仰在国内的流播。

潮汕“三山神”由于地方士绅的尊祀和地方官

员的拜祭,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早在 1300 多年前,唐朝名将陈元光(初唐诗人,被后人尊为“开漳圣王”)带兵打仗途经三山祖庙时,亲自前往祭拜并写下《祀潮州三山神题壁》诗三首;中唐文豪韩愈为潮州民众免于“淫雨害稼”而亲撰《祭界石神文》,并派属下官员以“少牢之祭”前往祭奠,从而使“三山神”一跃成为全潮汕最大的社神。到了宋代又经过几代皇帝诏封为“三山国王”和赐“明祝庙”,并敕令本部“增广庙宇,岁时合祭”,所以,在唐、宋两代三山神崇拜已在整个潮汕地区广泛流播。到了元代,已经发展潮州府当时所辖三邑(海阳、潮阳、揭阳三县)和梅县、惠州二个地区,各处都有三山国王神庙了。至明清两代,三山国王信仰可以说是发展鼎盛,官方史籍如《永乐大典》,地方志书如《潮州府志》、《韩江见闻录》、《揭阳县志》、《嘉应州志》、《丰顺县志》等,均有介绍三山国王信仰的篇幅。从不同时期三山国王庙的分布和建设情况,我们可以大略了解三山国王信仰的流播状况。在潮汕地区,除三山祖庙外,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三山国王庙为数不少:潮州市饶平县大埕镇埕南村的鸿埕大庙,始建于宋,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南澳岛后江象山三山国王庙,始创于南宋德祐年间,至今已有七百四十八年历史(现庙为 2002 年重建);澄海银砂古庙,始建于明,有 600 多年历史(现庙为 1996 年重建);汕头市潮阳区棉城蛇脐古庙,始建于明,有 500 多年历史;澄海樟木山海雄镇庙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 年),至今已有 447 年历史;达濠王爷宫,始建于明,清乾隆五十年改建三山亭(2009 年末重修);达濠青篮田心宫,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 年),1987 年重修;揭阳市蓝田白塔镇(原属揭东县)的玉塔古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已有 251 年历史,其保存的石雕、木雕、嵌瓷很多,工艺极高,极具文物保护价值。这些不同时期修建的三山国王庙及其保存的珍贵历史文物,为我们窥见三山国王信仰在潮汕地区的流播和影响提供了重要考证,同时也展示了不同时期潮汕建筑的艺术和风格。近代以来,三山国王庙在潮汕地区历经兴废,总体上是在波折中发展,至今已星罗棋布,甚为密集,基本上是一村(社)一庙。例如,我们从汕尾

市三山国王庙的现状即可见一斑。昔日的海陆丰,有 4000 多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至少有两个社,每社基本上都有一个王爷宫,那么就有近万个王爷宫了。但进入近代,由于经济的萎缩、崩溃,或政治的干预、军事的破坏,王爷宫的数量也随之骤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王爷宫被拆除。改革开放后,海陆丰地区不少王爷宫才又悄悄得以修建、复建或与其他神庙合并扩建,现在的数量已不下数千,总数虽不及原来之一半,但庙内的建设、装饰,以及器用、摆设,则比以前更富丽堂皇。现在,三山国王信仰不但在潮州、汕头、揭阳三市盛行,还播及广东省的梅县、大埔、兴宁、丰顺、陆丰、海丰、汕尾、惠东、东莞、佛山、台山及福建省东山县、广西省昭平县等地,其庙宇在上述各市、县都有仿建。

(二) 三山国王信仰在台湾地区和海外的流播

1. 三山国王信仰传入台湾已有 447 年的历史,已成为仅次于妈祖崇拜的台湾民间信仰。

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人热衷三山国王崇拜呢?原来台湾同胞中有相当一部分先民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广东潮汕地区毗邻台湾南部,海上距离大约只有 200 海里。明清时期,不少潮汕人为了谋生冒险渡海移民来到台湾岛拓荒,当时岛上土地贫瘠、瘴气疟疾盛行,还有严重的外族入侵之祸,为避凶求吉,化危为安,将各自故乡“护国庇民”的三山国王神明“请”到台湾。在台湾最早建成的三山国王庙,是坐落于彰化县溪湖镇的荷婆仑霖肇宫,根据《荷婆仑霖肇宫沿革志》记载,霖肇宫是在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 年),由广东省揭阳县三山国王信众马义雄、周榆森两人恭“请”故乡霖田祖庙的“敕封三山国王”香火来到台湾,第二年,在当地多数信众的倡议下建起了神庙奉祀,并以故乡之名,正式命名他们垦居的所在地为“荷婆仑”(“荷婆”与“河婆”谐音,“仑”是小山岗之意),“霖肇宫”也寓霖田祖庙来台肇迹之意。另据《台湾通史》记载:

“台南府三山国王在镇北坊,雍正七年(1729 年),知县杨元玺、游击(即台湾镇标左营游击)林梦熊率潮州商民建,祀潮州中山(应为巾山)、明山、独山之神。三山址在揭阳县界;云林县三山

国王庙在县治南隅，粤籍九庄合建；在新竹县竹北一堡树杞林庄，嘉庆十五年，开垦粤人建，同治九年修。此外尚有数处，均为粤人所祀”^[5]。

上面文献资料中所提及的台南三山国王庙，是一座在台湾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潮州传统建筑风格最显著的神庙，大殿主祀三位三山国王神像，左侧殿供祀广受渔民信仰的海神天后圣母像，右侧殿供祀韩文公韩愈像，庙中存有盛端明所撰《三山明贶庙记》，又由于这座庙宇是由潮州人集资兴建的，因此常作为联系乡谊、交流经商信息的场所，所以又称为潮州会馆。从三山国王香火在台湾的流播过程和历史看，在清朝乾隆时代建立的三山国王庙占绝大多数，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中部的高雄、彰化、屏东、嘉义、云林等县，而北部宜兰、新竹二地的三山国王庙则绝大多数建于道光之后，形成这种流播格局主要是由清代粤东人移居台湾的线路和历史过程所决定的。台湾现有奉祀三山国王或奉作主神的庙宇410多座，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148座，信众达700多万人，还成立了“三山国王宫庙联合会”。

2. 明清以来，三山国王信仰迅速向东南亚流播。

随着潮汕移民足迹所及，三山国王漂洋过海，远播海外。如今，凡是有三山国王庙的地方，就有潮人那里聚居。他们离乡背井，远离祖居地，赤手空拳到东南亚一带谋生，历尽艰辛，吉凶未卜，总是期望得到神明的庇佑。因此，他们远渡重洋的同时，常常会恭请三山神像或灵符、香火同船随行，到定居地后再想办法设坛建庙，诚心奉祀，代代相传并向外扩播。单就马来西亚各州府，即有吉隆坡的蕉赖三山国王庙及吡叻、美里、古晋、怡保、柔佛、雪兰莪等州和双溪古月、士乃、金宝、增江北区等地的三山国王宫庙十多座^[6]（据张肯堂先生编《吡叻拱桥河婆同乡会特刊》749页）。据调查，三山国王信仰跟随着潮汕先民海外移民的线路，除了主要播及香港、澳门、台湾和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之外，还远播欧美、中东、澳洲等世界各地。台湾是海外三山国王庙和信众最多的地区。

三、三山国王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神同源、人同根”。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两岸民间传播、弘扬三山国王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共同研究包括三山国王祭典在内的三山国王文化。1988年台湾同胞最早前来祭拜三山祖庙的“进香团”，一行几十人，开始时不明路线，从福建省福州的三山，一路寻到北京，回头才找到潮汕，最后到了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亲眼看到了屹立于河婆东、南、北面的巾山、明山、独山，又踏进了香火不息的三山国王祖庙。面对三山国王像，他们实现了寻根问祖的心愿，真如多年在外的游子见到了娘亲一样地兴奋和亲热。他们将香火迎回台湾后，其他“进香团”便接踵而至，络绎不绝。自1989年到1992年3年间就有56个团近4000人前来进香。

1994年揭西三山祖庙访问团第一次应邀赴台访问，引发了1995年台湾三山国王庙纷纷组团前来大陆祖庙回访进香热潮，团次达88个和3234人（不包括独立组团的团数和人数）。为了更好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增进友谊，揭阳市三山祖庙管委会接受台湾省云林县大埤乡太和街三山国王庙联谊会的盛情邀请，于1999年4月，由揭阳市、揭西县有关领导及三山祖庙管委会组成的访问团一行14人，护送三尊三山国王神像赴台会香。台湾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有两万多人参加文化交流，全台湾有95座三山国王庙代表共一万多人前来“会香”，对祖庙的三山国王神像进行朝拜。在台期间，台湾省三山国王庙联谊会陈添财会长、云林县长和8个乡镇长参加了庆典活动。庆典期间曾出现同一天同时放映10场电影、上演8台布袋木偶戏、一台古装戏、一台现代歌舞的场面。当地台胞喜出望外地说：“这是70多年来最热闹的一次。”这次应邀访台，进一步推动了两岸三山国王文化的交流。仅2006年，台湾及海外就有25个团体前来观光交流或寻根问祖。经常大型组团回大陆三山祖庙进香朝拜的不仅有来自台湾高雄市的，还有大量团队来自云林、彰化等县（市），每次组团规模均多达三百至四百人。2009年10月，广东省统战部组织带领三山国王祖庙会香祈福交流团一行77人赴台访问，参加“朝圣大典”绕境会香等一系列的三山国王文化交流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两

岸三山国王文化活动迈进了交流合作的新阶段。

台湾信众最近一次组团前来大陆三山祖庙会香朝拜的是 2023 年 9 月 18 日,领队的是台湾中国币明独三山国王协会总会长刘瑞德,参加会香交流团成员共有 400 多人。30 多年来,广东省揭阳市和揭西县三山祖庙管委会已接待台湾“三山国王庙”谒祖寻根会香团 700 多团次,以旅游身份前来三山祖庙寻根朝拜的台湾及海外香客更是难计其数。如今,三山国王祖庙已获国台办批准设立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四、三山国王信仰的文化认同与统战价值

在当代社会,三山国王文化作为起源于潮汕地区的一种特色信仰文化,已经播及东南亚、欧、美、澳等有关地区和国家,成为海内外信众尤其是台湾海峡两岸同胞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深入思考并探究它的文化认同功能和文化价值,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三山国王信仰这一独特文化的统战作用,助力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一) 三山国王信仰具有显著的文化认同功能

三山国王信仰已成为海外潮人族群的文化标志,其文化认同功能突显。随着潮汕移民的足迹,三山国王“香火”传遍海内外。首先,三山国王“香火”在台湾的流播尤为普遍。自明、清及至民国,粤东搬迁到台湾的移民为数不少。他们垦植荒地、构筑水利,开辟田园,在辛苦创业的同时,带去了故乡的神明三山国王的“香灰符”作为精神支柱,战胜种种自然灾害,逐步站稳脚跟,成家立业。在这个过程中,在台粤籍移民特别注重团结奋斗、相互帮助和共同发展。几百年来,遍布台湾各市、县的三山国王宫庙已达 410 多座(其中已注册的有 260 多座),它们已成为粤民渡海垦荒、团结互助、定居发展的历史印记。可以说“凡有三山国王庙的地方,必定是粤东人聚居之地”。在台湾岛内现在仍有很多粤籍移民集居的乡镇或者村落,比如高雄市的新竹县、苗栗郡、潮城镇等地,都建有三山国王庙,并以是否信仰三山国王形成特色文化圈,发挥着区别于其他府属文化的分界作用,成为在台粤民族群

的文化标志。

其次,三山国王“香火”远播东南亚诸国。明、清时期,粤东先民“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三山国王随着飘洋过海传到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特别是马来西亚,在首都吉隆坡南郊的蕉赖区等华侨聚居地均建有三山国王庙,从其建造和分布情况分析,不难看出三山国王信仰在马来西亚传播之广,影响之深。随着时间的推移,远渡重洋的侨民特别思念故乡和亲人。侨民们一方面不断向故乡的亲人寄钱寄物,另一方面“敬祖爱宗”之心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遍布东南亚的三山国王庙,便成为广大侨胞祈神降福和寄托对故国眷恋的神圣地方,有的则以三山国王庙为驻所成立了海外华侨联络会,以共叙乡情、互相帮助和共商报效家乡事宜等等。可见,三山国王文化以其独特的祭祀仪式和充满活力的游神文化活动及深入群众生活,已经在广大信众中形成了特定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它作为潮汕传统特色文化的承载,世代代接续传承,辅以广泛的祖籍认同、地缘认同为基础,具有显著的文化认同功能。

(二) 三山国王信仰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统战作用

三山国王信众寻根问祖活动有利于强化文化认同,促进两岸同心。三山祖庙寻根和朝圣活动彰显了两岸同源同根的历史事实。在台湾,以前因各种人为因素外加海峡阻碍,三山国王信众想到大陆为三山国王香火寻根探源,谒祖会香,均须历经曲折的过程甚至各种阻碍,才能实现探源会香的心愿,可见台湾三山国王信众对祖籍认同的文化心理十分强烈。1984 年,当原乡揭阳市揭西县组织修复三山国王祖庙时,台湾广大三山国王信众慷慨捐资援助,金额巨大(从重修碑记上刻录的捐款信众名字和数额可以看出来),这足见台湾信众对三山祖庙的崇敬之情和对故乡信仰的认同与支持。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三山国王信众踊跃前来大陆三山祖庙进香谒祖,大陆原乡揭西县三山国王祖庙理事会受邀访问台湾,海峡两岸三山国王文化交流活动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台湾地区三山国王庙寻根问祖组团前来瞻仰进香已超 700 团次,并呈持续增长趋势,突显了三山国王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三山国王祖庙在台湾已被当作研究移民史的佐证，成为祖籍的象征和寻根问祖的寄托。

结语

三山国王信仰已成为强化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潮汕地区作为三山国王文化的发源地和著名侨乡，应该充分借助海外三山国王信众寻根会香的这种文化认同活动，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弘扬包括有潮汕战舞之称的潮汕英歌文化、狮舞文化、潮剧和潮州民间鼓乐巡游文化等内容丰富多彩的潮汕文化、侨乡文化，着力营造和强化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信众文化认同的同根情境，吸引更多的台胞和海外侨胞参与三山国王信仰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既能感受到心灵依托和祖籍身份认同，又能唤起他们的乡土情怀和爱国情愫，以利于在潜移默化中助力推进两岸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 ① “明赐”：神明的赐与。赐，ku à ng, 赐与。
- ② “潮州路”：元代在大的州府设路。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潮州为潮州路总管府，隶属广东道，潮州路下辖“潮州三阳”，即海阳、潮阳、揭阳。

参考文献：

- [1][2][3][4] 刘希孟. 潮州路明赐三山国王庙记 [M].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中华书局，1986:18-19.
- [5] 陈元光. 祀潮州三山神题壁. 陈元光〈龙湖集〉校注与研究 [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0:54-56.
- [6] 张肯堂. 毗叻拱桥河婆同乡会特刊 [J]. 746.

【责任编辑：温开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红色文化教育创新路径探析

林细莲, 蔡泽填, 郭卫琳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25)

摘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文化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不仅是赓续红色基因,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传承、凝聚共识、立德树人等方面开创新局面。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 红色文化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应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价值旨归、实践逻辑为指引; 以深化政治认同, 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基础; 坚持“两个结合”方法论, 建设文化事业新高度; 发挥制度和技术的两股力量, 响亮回答时代教育课题。以此实现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红色文化教育;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自信; 人民立场;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0102-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 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1]。建党一百多年来, 红色文化伴生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中。红色文化教育以传承红色基因为目的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本质要求、价值旨归、实践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文化传承、凝聚共识、立德树人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2]。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 红色文化教育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当前, 教育界对于推进红色文化教育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是内容创新, 包括“多维表达”^[3]“话语创新”^[4]等; 二是传播渠道现代化建设, 如“阅读行为的体系构建”^[5]“IP 塑造”^[6]等; 三是教育模式和方法变革, 如构建“大中小一体化”^[7]教育体系等。上述研究推进了红色文化教育的纵深发展, 但是“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叙事”^[8], 在不同的时段

有不同的叙事内涵、方式、要求等。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要传承好红色文化, 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价值旨归、实践逻辑等方面探索红色文化教育的新发展, 才能使其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红色文化教育

红色文化教育是“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 以红色革命文化为资源和内容载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之时代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9]。红色文化教育一直积极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同时, 中国式现代化对红色文化教育而言, 包含双重语义: 一是红色文化教育的现代化问题; 二是红色文化教育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此外, 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要求、价值旨归、实践逻辑上不断指引红色

收稿日期: 2024-03-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红色基因信息库建设与大学生红色教育生活化机制研究”(21JDSZ32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细莲(1977-), 女, 汉族, 广东揭阳人,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蔡泽填, 男,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水生动物医学 231 级学生; 郭卫琳, 女,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动物医学 2021 级学生。

文化教育的创新性发展，并赋予红色文化教育新的内涵及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红色文化教育不断发展的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的、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10]。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中国特色，呈现于本质要求、价值旨归、实践逻辑之中，这三者成为红色文化教育不断发展的基石。

首先，从本质要求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规定。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1]。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和发展观等，包含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面探索中，并且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方案，通过“两个结合”不断凝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新时代传播、弘扬和创新红色文化需要反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成果，全面准确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内容、新话语、新精神。

其次，从价值旨归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红色教育的政治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12]，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价值方向、价值标准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话语而展开进行叙事，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红色文化一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文化教育始终围绕“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至上”等教育话语，传递党和国家的立场、初心和使命，“人民”是红色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作为表达党和国家革命意志和传播革命精神的教育板块，红色文化

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坚定政治立场，把握住中华民族主流叙事方向，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方能体现时代价值。

再次，从实践逻辑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夯实了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根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积蓄中华现代文明的时代力量，无论物质维度或是精神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都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符合社会生产运动的规律，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孕育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在国内外广受欢迎，这为红色文化不断拓展了话语空间。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红色文化教育在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同时得以创新性发展。一方面通过教育实践传播红色文化叙事话语，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根基；另一方面又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深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红色叙事，汲取时代精华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红色文化教育的新内涵和新要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域中，红色文化教育具有新的内涵和要求，即聚焦党和人民的需要，以文化传承为载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观和意识形态，培养民族复兴所需之时代新人。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红色文化教育不止是赓续红色基因的需要，更有文化传承、凝聚共识、立德树人等方面的要求。

首先，建设红色文化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由先进文化创造和熔铸的文明新形态，被赋予了丰富的全球意义和强劲的文化超越性”^[13]，文化的超越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超越性不止是对他者文化的超越，更是内生性的自我超越。而红色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孕育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14]，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磅礴的精神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需要文化力量的不断加持以应对各种挑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红色文化教育，既要讲好老故事，遵循赓续红色精神的主基调，同时也要建设好红色

文化的新形态,促进红色文化发挥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力量。

其次,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大团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障。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进行融合、转化和创新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商量”等思想奠定了其浓厚的民族团结与进步的文化底色。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红色文化教育应充分发挥文化凝聚的功能,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统一思想,以文化认同推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以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民族大团结和大进步的局面。

再次,推进红色文化教育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中,教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红色文化具有文化的共性,包含物态层、制度层、行为层、心态层等四种文化形态。红色文化教育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教育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物态文化层体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从制度文化层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行为文化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从心态文化层面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是应有之义。这要求红色文化教育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挖掘教育内容素材,建设教育内容体系,推进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以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作为教育传播载体,不断提升教育话语的理论力和说服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达到新高度。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红色文化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大局中既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需要厘清红色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促进其更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红色文化教育的机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意味着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15],这是党和国家主动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党和国家历史主动的精神为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是国家战略性的政策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软实力,对于红色文化资源,将其定位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性资源”^[16]。在当前,“红色资源赋能产业发展、以红色基因培育乡村人才、以红色文化涵养乡风文明,实现了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17]。由此,中央及地方出台众多的文件引导和支持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8年中央军委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等,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更进一步强化了红色文化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

二是红色文化学习教育氛围浓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弘扬革命精神和文化自信的政策话语号召之下,红色文化教育“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呈现出一种相对活跃的状态”^[18]。红色文化教育实践丰富多彩,各地革命老区、博物馆、纪念馆、故居旧址、遗址等都得到大力开发成为红色文化现场教学或实地考察教育基地,“研学旅”融合的教育方式受到热捧。另外,国家推行“大中小学红色文化一体化”“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大中小学教育中“课程思政”的重要元素。还有,各类红色文化教育主题活动,如知识竞赛、诗歌朗诵、红色电影也成为广大师生、各级部门增进红色文化认知、赓续革命精神的重要活动。总之,全国上下呈现浓厚的红色文化教育学习活动氛围。

三是红色文化教育资源谱系化发展。随着红色文化资源的逐步开发利用和创新,红色文化的教育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步形成中国红色精神谱系。目前,全国各地形成了大约四十多种红色精神谱系,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红船精神等等。不同

的红色精神谱系蕴含不同的精神特质，例如井冈山精神代表“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红色精神。红色精神的谱系化有助于明确红色文化教育的主题、教育方法和载体的选择。此外，在科技赋能的加持下，红色文化教育以真实史料为基础，以点带面，将同一主题的红色文化内容聚合或串联起来，形成了不同主题的教育内容，如弘扬爱国主义主题的教育内容、弘扬革命精神主题的教育内容等等。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红色文化教育的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化、时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红色文化教育在新时代中要发挥好时代价值需要把握时代诉求，直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要积极应对数字化、智能化、传播渠道多元化等现代化技术所带来的挑战。

一是在红色文化教育中未能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主体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9]。在文化自信的战略话语要求下，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性发展必然要先建设其文化主体性。但在当前轰轰烈烈的“课程思政”或“思政课程”实践中，红色文化虽然作为重要的“课程思政”题材，但在融入和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红色文化在思政场景化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始终被误读，其价值一直被遮蔽”^[20]的情况，这说明在教育实践中未能体现红色文化的主体地位，也无法充分彰显红色文化的主体价值。

二是红色文化教育问题意识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和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问题导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解决时代三个重大课题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展示了其合理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为红色文化教育实践提供方法论。由此，红色文化教育应树立问题导向的教育观，才能助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但是，在红色文化教育实践中还存在“没有做到红色案例、教育目标、现实问题的完美融合”^[21]的现象，这显示了红色文化教育缺乏问题导向，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是红色文化教育全要素未得到全面发展。现

代化强国，必定是教育强国，这需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22]，这是教育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其中体现了要实现教育全要素现代化实践要求。红色文化教育的现代化是教育强国的重要体现，同样需要实现其全要素现代化。但是，当前红色文化教育还存在“纵向贯通不畅、横向联动乏力、内容简单机械重复、教学方式单一化与同质化等问题”^[23]，这表明了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存在教育要素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红色文化教育创造教育新生态。也即，红色文化教育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价值旨归、实践逻辑为指引，在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立德树人等方面开辟新局面。

（一）明特色：深化政治认同，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走自己的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2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红色文化教育以传播红色叙事、红色基因而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觉悟，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红色文化教育需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于政治认同之中。

一是坚定政治立场，精准把握红色文化教育的战略需求。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为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要求并指明了方向。在红色文化教育实践中，精准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本质要求”“重大原则”“重大关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内涵、要求深入人心；结合社会热点要点，做好党和国家的政策解读、阐释和宣传工作；以“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五个认同”“六个必须坚持”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要求锤炼人民群众的意志品格、提升道德素质、培育法治观念、强化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新局面。

二是坚定人民立场,赓续人民的伟大精神。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红色文化教育必须以人民为话语中心,构建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以问题导向反映时代人民的诉求和变化,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弘扬时代人物的典型形象,提炼时代人物精神,将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者、建设者、见证者参与到红色文化教育活动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教育的主体意识。

（二）固本源：坚持“两个结合”方法论，建设文化事业新高度

“以中国式现代化‘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话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本质,这决定其必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源动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国红色文化自身的延续”^[25]。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新高度是红色文化教育文化使命,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因此,红色文化教育通过教育内容的再生产、谱系化,教育话语的创造与转换,都是红色文化教育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建设红色文化传承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们继续保持“敢于斗争”的精神,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是解决大党特有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举。红色文化中特有的革命精神是新形势下继续开展斗争、不断夺取胜利的动力源。进入新时期,以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进一步建设谱系化革命精神,不断挖掘红色资源的精神特质,对红色精神进行时代化的话语创新与创造;加强红色文化实践教育,将红色文化内生自觉的品质转化为人民群众斗争自觉的精神,促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自觉和实践自觉,以此建设红色文化传承新高度。

其次,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

等理论融合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利济苍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摈弃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不合理因素,将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成为红色文化话语现代化转型的内涵指向。当今,文化软实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动力作用。在“两个结合”方法论的指导下,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话语、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内涵、展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成果等举措应成为红色文化教育话语建设的抓手,以此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守正与创新并举的科学态度。

（三）强基础：发挥制度和技术的两股力量，响亮回答时代教育课题

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要求红色文化教育必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制度对教育全要素系统、整体、协同运作发挥了显著的内源性^[26]作用。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中,“意识形态斗争的技术属性”^[27]不断增强,教育技术成为教育一股重要外源性力量。教育制度和现代化教育技术共同构建了左右红色文化教育实效性的两股力量,深刻影响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因此,红色文化教育要培育时代人才,必须重视教育制度和技术的两股力量。

其一,加强教育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红色文化教育机制。红色文化教育现代化是涵盖“概念、内容、实施、评价的完整系统”的整体现代化,涉及多部门、多环节、多方面的内容,这需要不断强化红色文化教育制度建设,以制度保障防范红色文化教育的木桶效应。因此,建立健全系统化的指导、监督和评价机制,建设红色文化教育的联动机制、协同机制与实践机制,通过机制建设保障红色文化教育实践的科学、高效。此外,还要从制度建设上确保红色文化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

其二,发挥现代化技术的意识形态建设作用。教育技术运用于红色文化教育之中可利用其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功能,同时提升教育实效性。可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化技术加速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的采集与处理、转化与创新、展示和传播;还可以利用设计技术、生产技术创新与开发红色文化教育产品,例如红色文化演出作品、主题产品等;还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式、交互式的红色

文化教育实践等，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涵养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思想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2] 习近平.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2-08-19(1).
- [3] 耿化敏, 吴娇. 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红色基因：历史之脉、科学内涵与传承路径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3, 43(10): 104-112+207-208.
- [4] 郑苗, 刘向阳, 张家靖. 新时代高校提升红色文化教育话语说服力的思考和探析 [J]. 高教探索, 2022, No. 230(06): 124-128.
- [5] 黄思华, 刘玉博. 高校图书馆助力“红色文化”阅读行为的体系构建 [J]. 新世纪图书馆, 2023, (10): 29-35.
- [6] 杜小峥. 河南红色文化 IP 塑造和传播力提升研究 [J]. 新闻爱好者, 2023, (10): 92-94.
- [7] 孙银光. 红色文化教育的逻辑层次及大中小学教育一体化实践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07): 130-137.
- [8] 项久雨.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J]. 教学与研究, 2023(10): 22-30.
- [9] 孔晓晓. 红色革命文化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策略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3 (04): 26-32.
- [10] 王骏, 李晓光.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鲜明特征及其世界意义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12): 13-19.
- [1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23-24.
- [12] 高继文, 吕彦瑶.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6(04): 5-11+127.
- [13] 谭可可.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主题出版的文化超越性与分众化对外传播探析 [J]. 中国编辑, 2023, (10): 54-58.
- [14] 管仕廷.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意蕴 [J]. 理论视野, 2024, (01): 49-54.
- [15] 陈东晓, 毛瑞鹏, 王玉柱. 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J]. 国际展望, 2024, 16(01): 1-19. 157.
- [16] 邵明华, 杨甜甜. 场景赋能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多维路径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0(06): 95-104.
- [17] 黄建红. “红三角”内源式发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衡山案例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 (03): 125-141.
- [18] 张志强. 中国红色文化精神特质及教育传承机制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 30(10): 106-115.
- [1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 [20] 黄乐. 场景化传播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程探索 [J]. 传媒, 2024(01): 82-84.
- [21] 刘燕, 李楠. 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02): 89-95.
-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N]. 人民日报, 2019-02-24(1).
- [23] 闪茜菁. 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 (01): 139-143.
- [2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190.
- [25] 高锦花, 叶晓波. 游走在文化与历史间：重新认识中国红色文化 [J]. 红色文化学刊, 2023(01): 21-27. 109.
- [26] 王建梁, 武炎吉.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研究——以印度、巴西、南非为中心的考察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03): 215-224.
- [27] 阎国华, 韩硕. 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01): 29-38.

【责任编辑：秦院院】

实现潮州礼俗“双创”的现实条件与路径初探

陈驰欣

(中共潮州市委党校, 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 当前, 围绕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潮州礼俗作为潮州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高速发展中, 更加彰显其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实现它的“双创”, 有助于潮州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从学理层面梳理它的历史渊源和嬗变, 了解当下它的传承发展状况和现实条件, 是清楚其从何而来、引领它往何处走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厘清潮州礼俗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才能更好解析潮州礼俗背后所反映的潮人心理、潮人精神, 以及体现出来的行为习惯、审美倾向和思维方式, 为潮州礼俗的“双创”提供理论依据。在“双创”过程中, 要对潮州礼俗原有的内容和内涵进行筛选, 提炼出符合国家政策、现代社会发展的意涵, 发挥潮州礼俗活态化的优势, 使其产生辐射效用, 推动潮州文化和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 潮州礼俗;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形态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4)02-0108-05

对于潮州文化, 许多学者认为, 潮州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 主要受本土原住民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南洋移民文化的三重影响。潮州文化在抽象概念层面, 可理解为全世界潮人在足迹所涉范围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此种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潮州后进一步得到挖掘和涵泳。其中, 礼俗是潮州文化的具象化表达, 体现了潮州文化的地域特色和精神内涵。当前, 围绕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潮州礼俗作为潮州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高速发展中, 更加彰显其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推进礼俗实现它的“双创”, 有助于潮州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潮州礼俗概况

(一) 脉起中原

大一统国家和大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离不开对

于“礼”的重视。“礼”所倡导的“修齐治平”“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 对于集体意识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具有深远意义。而自宋代以来, 中华文化开始突破“礼不下庶人”的束缚, 上层社会的“礼”和基层社会的“俗”得到进一步交融, 在此过程中,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潮州乡土社会, 其独特的文化体系初具雏形。潮州礼俗的大框架体现儒家的“礼”。比如“时年八节”, 指的就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节、除夕这八个节日。这些节日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节日。再比如“出花园”, 则与中原地区的冠礼和笄礼宣扬的文化意旨异曲同工。施孤(潮人盂兰胜会), 属于潮汕地区的中元节。潮州的礼俗中, 既有体现国家层面的“礼”的部分, 又有“俗”的部分。这里的“俗”, 是潮人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口头和行为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 在礼俗仪式的文化表达层面, 保留着许多个性化的表达。即使在快节奏的当下, 大部分潮人家庭都还保留着

收稿日期: 2024-03-12

基金项目: 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一般项目《建设世界潮人精神家园视域下推动潮州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驰欣(1990-), 女, 广东潮州人, 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教师, 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潮州文化。

初一十五“拜老爷”的习惯，也因这一文化习惯，许多潮人熟谙农历，传承着中国现行的传统历法。又如“出花园”中的“咬鸡头”“穿红木屐”，“施孤”中的“抢孤仪式”，都是潮州礼俗所特有的。潮州礼俗彰显的是地域文化和而不同的属性，但归根结底，中华文化仍是它的底色和基调。

（二）弘达四海

潮州的礼俗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代代赓续，得益于以祠堂文化、信仰文化等为主流的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稳固。传统乡土社会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的同时，也凝聚了同一村庄的人心，形成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在潮州范围内，不同村落同一礼俗，所呈现的面貌也不尽相同。如“营老爷”（俗称“劳热”）这一礼俗仪式与节庆活动相融合的潮州文化特色项目，充分展现了十里八乡不同的文化实践体征。抛老爷、转老爷、抢老爷……不同的“营老爷”形式，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对于进一步树牢人们对于所在生活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着柔性牵引的向心力。同一宗族和村落在代际的轮替中，礼俗已成为当地人们的文化图腾，潮汕地区也不例外。随着潮人远渡重洋，祠堂文化、信仰文化被带到居住地，并在当地落地生根。现如今，海外潮人社区仍保留着许多潮州礼俗。时年八节还是重要的节日，潮人社团的新春团拜活动在整个农历正月开展得如火如荼，义山等为海外潮人祭祖提供了同一场所。而“出花园”仪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已由潮汕本土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由社团组织的集体活动。“施孤”虽在潮汕地区日渐式微，但在近代的香港地区，盂兰胜会组织遍布每个社区，潮人盂兰胜会（中元节）更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潮州礼俗，在当地历经时间淬炼，在海外得到活化，成为潮人共同的文化印迹，滋养着全球逾千万潮籍人士，有着牢固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三）情礼兼具

“乡情浓厚”四个字，是潮州文化气质和个性的生动概括。潮州文化的“情”，往往与“礼”相伴相生。“礼”可以说是“理”的体现，反映的是规范化的秩序。“情”是感性的，对应“礼”的理性，展现礼俗的活力和包容性。从“礼”的层面，一方面，

构建人生的仪式感和秩序感。礼俗仪式可以让人们从内心重视人生而为人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人生。如“出花园”中的“跳胶掠”，主角从晾晒用的竹箕上跨过，预示着他已经迈出受家庭长辈庇护的“花园”，走向独立自立的人生新阶段。通过婚丧嫁娶、“出花园”成人礼、开笔礼等过渡仪式，给潮人的各个人生阶段锚定注脚，从文化层面培养潮人的秩序感，推动法理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各式各样的礼俗，也挑动着人们一成不变、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营老爷”的轮番上演，让喜庆的春节再添一把火，人们从私人空间走向乡间旷野，与周围的邻居和乡里人互动，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增进情感，在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文化进程中保有温情。

二、礼俗“双创”的优势

（一）包罗文化众项

潮州的礼俗仪式，很好地保留了中原地区的大部分传统礼俗，并结合本土特色，得到系统发展。如“婴儿出生”一项，就包括三朝礼、满月礼、百日礼、周岁礼等。潮州传统婚俗，也严格遵守“六礼”。其中的“问名”在潮州俗称“合八字”；“纳吉”为“掣定”；“请期”为“择日”等。“营老爷”一词更是保留了颜师古《汉书注》和彥域《文选薛注》的古义。在潮汕地区的农村，乃至海外的潮人聚集地，“营老爷”文化都得到很好的传承，并演变出大同小异的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潮州的绝大多数非遗项目，依托礼俗生存和发展，如礼俗仪式的供桌，体现了潮州木雕的精湛工艺；拱桌所用的桌围，不少是潮绣作品。“营老爷”过程中的打击乐器，少不了潮州大锣鼓和潮州音乐。而潮剧更是潮州大部分节庆活动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礼俗仪式举办的场所，多为祠堂和寺庙。这些建筑中有不少潮州木雕、潮州嵌瓷的精品。剥落了这些文化场景，潮州的不少非遗项目，都不可避免地丧失其主要生存土壤。礼俗浸润了潮汕地区千百年来文化发展的底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接下来也应通过“双创”，让其发扬光大。

（二）蕴藏丰厚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背后具有一定的文化导向,但这种导向,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化张力,给予人们一定的想象空间。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屹立不倒,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and 作用愈来愈显著,离不开它照临四方的文化格局。潮州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支脉,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至今的礼俗,正因多向性的文化内涵,没有随着社会的流变而销声匿迹。潮汕地区作为一个多神崇拜的社会,信奉的神明不少来自具体的历史人物,如位于笔架山麓韩文公祠的主角韩愈;纪念张巡、许远的乔林双忠庙等。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有其流芳百世的闪光点,均为忠义之士。在古代,将他们作为神明进行祭拜。在传统正向价值观受到物欲冲击的当代,可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而其他的礼俗仪式,都在“俗”中体现着“礼”的哲学,开笔礼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婚礼是希望夫妻能够白头偕老;直系长辈逝世须守孝三年(现已缩短为一年),则提醒人们要敬老爱老,尊重生命,慎终追远;“出花园”里面的“咬鸡头”等仪式,寄托家长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日后成为社会栋梁之材的美好期许;施孤(七月半)的文化内涵在于慈善救济,博爱众生。通过神明及历史人物的人性光辉弧度,以及仪式中的价值指向,可以窥见潮州文化崇忠重教、敬老济困的轮廓。

(三) 遍布本土海外

习近平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习近平总书记对“根”“魂”“梦”三者关系的阐述,指明了当前汇聚海内外中华人磅礴伟力的关键所在,强调了文化对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作用。潮州礼俗,不仅在潮汕本土,在海外潮人聚集地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在海外拥有5千万的潮籍人士。基于潮汕地区的移民史和人口分布格局,“世界潮人精神家园”的打造,离不开潮州文化的滋养熏陶。在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港澳台地区的有些地方比潮汕本土更富“潮味”。“潮味”的重要聚点,就在于礼俗的鲜活延续。

三、潮州礼俗“双创”的路径

(一) 注重田野调研

潮州礼俗在不同区域都有细微差别。如果大而化之地将他们扁平化,易出现模糊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富有地域特色的个性被同质化,势必将影响潮州文化的深度和厚度,不利于潮州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对于潮州的礼俗,宜发挥潮人的精细理念、精品意识,系统化、专题化细研深耕,从三个维度深化田野调研。其一,对于同一礼俗,从时间轴上尽可能地恢复反映其演变历程的历史记忆,只有脉络完整,传承才有依据,并在时间演变中去把准礼俗的传承规律。其二,对于潮汕本土不同区域的同一礼俗,可通过口述历史以及梳理史料、碑刻等方式,探寻它们的同与异,在整体的文化主干中去丰富其旁枝。其三,与海外华人联动,对于海外潮人群体礼俗的发展和演变进行研究,追根溯源,找寻它在本土的印迹,完善整套文化体系。虽说潮州的礼俗是动态的,但基础性研究的深入可以弄清它们形成的原因和背后的意蕴,避免落入单调、千篇一律的窠臼。

(二) 提炼核心意涵

传统礼俗在当代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尊下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1]以新的礼俗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理人与自然、与家庭、与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文化底色,又令礼俗文化与时俱进。在此过程中,要关注礼俗的核心意涵。礼俗存在的意义之一,在于通过秩序和固定时间的固定活动,培养参与者的仪式感。定期出现的节日,相对完整的仪式,在一次又一次、年复一年的程式化行为中,将神圣感赋予参与者。仪式感和神圣感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长期培养后,就会成为惯性。例如,“出花园”仪式对青少年长大成人的启示,清明节对于寻根忆祖的重视,“营老爷”对于感恩和祈福的表达,“施孤”对于乐施好善的引导。在此方面,香港率先做出了有益的实践探索。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为更好保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人盂兰胜会（中元节）”，自2015年起举办了六届盂兰文化节。为摆脱中元“鬼节”阴森恐怖的迷信色彩，转而强调“目莲救母”的故事，提取其中孝道的元素，把“孝”和“慈”作为该活动的核心符号，以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盂兰文化节首创的“抢孤竞赛”，是盂兰文化节的品牌活动。筹办组织者在谋划设置该竞赛的规则时，不忘体现潮州文化的韵味，如参赛者比赛时要佩戴象征“过番文化”的“水布”和竹帽，比赛时掉落这两件物品要扣分，比赛时用来抛掷的米包也是用黄色的布料制成，一面印“米”字，一面印“福”字，布袋里面装的是食用大米，承装米包的工具是潮人举办仪式时经常用到的春盛。在潮汕本土近年来举办的开笔礼，也不断强化其教育色彩。孩子们通过“开笔礼”仪式，知晓读书的重要性，明白知识对于人生的正面作用。综上所述，提炼核心意涵，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强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礼俗哲学进行结合，服务社会的良性建设和发展。

（三）提升大众认同

传承的要素在人。大众的了解、认同、参与、投入，是礼俗顺利转型的关键。“出花园”，在东南亚地区，透过当地潮籍组织的力量，举办了多场集体“出花园”活动，并存在联合举办的情况。相关活动历年参与人数最高时近400人，实现由人内传播，发展到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具备一定的社会传播力。香港地区的“盂兰文化节”中“抢孤竞赛”，将盂兰胜会的抢孤仪式转化为竞技体育赛事，吸引高校中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参与，2019年将赛事的邀请对象拓展到大湾区。近年来，潮州文旅市场火爆，疫情后更引来井喷式的发展。潮州的礼俗应借此机会，把“营老爷”等转化为具体的文化IP，学习浙江缙云“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等模式，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宣传重点，融合潮州各项非遗，让潮人自己的“劳热”，拓展为吸引游客到潮汕地区旅游消费的品牌活动，扩大活动的边际效应。节假日是培养大众行为习惯的有效方式之一，如四川凉山西昌的火把节已成为当地人的公众假期。我们的畲族招兵节等，亦可考虑效仿，在带动消费旅游的同时，帮助传统节庆活动更好获

得大众认同，实现文化的传承和赓续。

（四）推动产业融合

任何文化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紧密，传承和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文化产业在当下，应探寻与农业、服务业、科技、生态等的多样化融合。传统的潮州礼俗中大量使用牲畜家禽和粮品糕点作为祭品，带动农业中的养殖业、畜牧业和种植业。仪式过程中潮剧、潮州音乐、铁枝木偶、潮州大锣鼓、英歌舞等表演，带动手工业的发展。现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潮州礼俗作为依托乡村土壤出现的文化形式，在乡村的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通过“营老爷”“食桌”等潮州礼俗，留住乡村的精气神，激活乡村的各项生产和消费。潮州礼俗拥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仪式、节庆活动能够充分联动文创、研学、民宿、沉浸式体验、亲子互动、健康养老等多元文旅业态。由此可见，打造潮州礼俗活动“爆款”是实现潮州礼俗与旅游业融合的高效路径。在这其中，潮州筵席礼俗作为体现潮州美食的文化内涵的重要形式之一，展现潮州美食文化的多层次，凸显潮州美食文化的涵义。据此，我们可以联合潮汕本土多市轮流举办“潮人美食节”，把多年来在潮汕本土和海外举办的美食节资源统筹起来，将潮州筵席礼俗元素植入游客的文化记忆中，推动餐饮业的发展，助力潮州文化进一步繁荣。

四、结语

当前，潮州文化引起全国的关注，潮州文化的系统研究更彰显其适时性和必要性。潮州礼俗渗透在潮人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是潮州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载体。因此，对于潮州礼俗的整体把握和细节梳理，可起到正本溯源、活化转型潮州礼俗的重要作用。潮州礼俗应在精准把握深微肌理和恰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常态化融合生活，推动产业发展，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文化形态。

注释：

①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本文中简称“双创”。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张士闪.礼俗互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整合[M].山东:齐鲁书社,2019.

[2] 郑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沉思录[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

[3] 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4] 黄挺.中国与重洋[M].北京:三联书店,2017.

[5] 杨锡铭.海外潮人史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6] 黄挺.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7] 林伦伦.“潮人文化”与“潮人”的身份认同[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1).

[8] 陈海忠.人口迁移、区域环境与文化特质——论潮汕文化特质的历史性[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4).

[9] 陈友义.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研究[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

[10] 林俊聪.潮汕庙堂[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秦院院】